

浙江革命史料特辑

(三)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D653

浙江革命史料

特 辑

(三)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0年8月

目 录

沙文求烈士传略	史 永 (1)
汪子望烈士事略	潘念之 (10)
董子兴同志狱中日记	戚秀媛供稿 (14)
裘古怀烈士遗书二封	(22)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	
——记“四·一二”以后的宁波	周闪耀 (24)
奉化暴动	陈修良 (29)
记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龙 跃 (32)
浙南岗头村革命简史	曾成文 (41)
忆林夫兼记浙南往事	连 珍 (45)
我在江南、浙江工作接触到的	
陈毅同志	何克希 (54)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涉外事件	顾春林 (66)
定海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简述	陈子方等 (77)
东方小学	周丕振 (97)

抗日战争在余上（中）……………张 光（109）

一九四〇年嵊县党组织情况及

“六·三”斗争 ……………杨源时（127）

过河不忘搭桥人

——回忆上虞爱国民主人士

杜婉容女士二、三事……………金乃坚（147）

余上特派员制的建立及其他 ……寿静涛（152）

我在海上工委一段回忆 ……………洪舒江（156）

为炊事员祝寿 ……………楼春阳（164）

四明青山埋忠骨

——忆黄 明烈士……………张 明（170）

强攻泰顺城 巧歼增援敌 ……………蔡存辉（187）

从鸡鸣社到金肖报

——解放战争时期路西地区

敌后宣传工作回忆 ……………杨 光（193）

沙文求烈士传略

史 永



沙文求烈士遗像

沙文求同志，浙江省鄞县大咸乡沙村（今属塘溪公社）人，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一一年入本村小学读书，当时家境已经破落，生活不好，曾停学两年，在乡从事农业劳动。一九一九年因其兄已有薪入，得以复学。曾于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国语师范补习学校等校就读。一九二五年春进入我党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转上海复旦大学物理

系，是年冬，在宁波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初，受党派回故乡组织农民运动。同年秋，赴广州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任该校共青团书记。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后，继续进行地下斗争。广州起义时，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总队长，旋改任赤卫队队长，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八月被捕，牺牲于广州，时年二十四岁。

(一)

文求同志少年时代，勤奋好学，喜看历史书籍和古典小说，景仰民间英雄任侠行为，又见乡间恶霸横行，欺凌弱小，他非常愤恨，逐渐孕育出一种刚强果敢，见义勇为纯朴的农民性格。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文求同志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亲眼见到贫苦农民终年劳动果实都交给了地主，而自己却过着悲惨的生活；同时他联想到国势日衰，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侮辱，他将这一切都记在心头，立志发奋求学，为国效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除了致力于功课之外，还抽出余暇，练习拳击和阅览兵家之书，并与有志气的青年，结为知己。他也想过：要想振兴中国，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个志同道合、团结一致的团体，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自从“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勃兴，各种外文书籍，不断地在中国翻译和出版，文求同志在效实中学期间，看了不少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籍。他向往着革命成功后的苏联，时常希望有机会到苏联去学习，他曾几次找关系想到苏联去而没有成功。

当时，宁波效实中学是当地最保守的学校，文求同志在新思想的感染下，积极起来反对该校当局的封建的教育方针和各种不合理的措施。他认为这个学校就是“孔家店”，但是他在那时还仅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在行动上更多地属于自发行为。如某次曾因反对一个不学无术、贻误学业的理化教师，而掀起罢课的风潮。他领导二年级的学生全体离校，并在外借住自修，要求将这位教师解聘，不达目的决不回校上课。文求同志是

这次风潮的发动者，学校已决定将他开除学籍，但由于二年级同学行动一致和校董之间的矛盾，结果以调换教员而取得胜利。一九二三年上海大学开办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开办的一所大学，瞿秋白同志又是社会系主任。文求同志在上海国语师范补习学校补习了一个时期之后，于一九二五年考入了上海大学就读于社会系。在这个学校里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全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激起了全国性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枪杀我国工人顾正红开始的伟大的“五卅”运动，文求同志参加了当时有名的上海南京路的游行示威，在英帝国主义者屠杀的枪声之下，文求同志随着工人、学生的队伍边游行边喊反帝爱国的口号，以后积极地投入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革命浪潮中去。他参加了游行后，兴奋地写信给他的弟弟说：“我在游行喊口号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群众的革命爱国热情实在令人太兴奋了。”另一方面，他也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者疯狂地开枪扫射游行群众，并逮捕工人和学生，事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布满了上海，一切呈现战时状态，在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相互勾结下，上海大学也被查封了，还下令通缉瞿秋白等同志。学校被查封后，为了保卫学校，文求同志和部份同学依然勇敢地留在学校里，坚持斗争和准备作其他新的活动。后来帝国主义者派出海军陆战队进占学校，并驱逐留校的学生，这时文求同志才离开了被陆战队占领的学校。通过“五卅”运动的斗争，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行，大大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觉悟；同时，认识了我国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他在宁波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

一九二五年以来,大革命的风潮磅礴全国。一九二六年初,文求同志接受了党的指示,回到自己故乡去进行农民运动。当时,江浙一带的商人、地主、豪绅等的反动势力相当雄厚。文求同志回到故乡后,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排除一切困难,大力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并先把村里的一些贫农秘密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核心力量,进行秘密活动。初时,有些农民长期受着封建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还未深切体会到农会是自己的组织,不敢立刻加入农会。到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参加农会的仅有十儿人。为了使农民们相信农会的确是贫苦农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文求同志找寻一切机会进行工作。一天,村里有个农民误砍了界边别人的树木,恶霸沙听涛乘机敲诈勒索,这位农民没有钱,不能遂其所欲,沙听涛即勾结山地主,把这个农民捆绑起来,硬说他是个盗窃犯,声言要送官府处理,妄图压倒农民的活动。文求同志针对这一事件,领导农民进行反霸斗争,这次斗争孤立了恶霸沙听涛的势力,沙听涛数月不敢出门。农会的威信从此大大提高了。文求同志乘机公开吸收会员,农民明白了组织农会的意义后,纷纷加入农会,会员人数立即激增。农民的势力壮大了,便正式公布成立沙村农民协会。

沙村农会成立后,沙村和邻村的土豪、劣绅、地主把它看作眼中钉,便造谣污蔑,胡说农会是“坏人”、“懒汉”的组织,将来政府必然会来解散逮捕。一些觉悟尚未提高的农民,听了种种威胁和谣言又犹豫起来了。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文求同志召

集了会员共同商议，号召并亲自同农民会员一起从事义务劳动，修理道路与公共水利，组织贫困农民在公山上砍柴，以提高收入等等。又在村里办起一所农民业余夜校，帮助农民进行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一时村里游手好闲和赌博等现象消失了，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农会的组织，也提高了农会的威信。

与此同时，乡间发生了饥荒，米珠薪桂。距离沙村二公里的圪头街（是当地一个重要的集市）的米商，唯利是图，不顾贫苦人民的死活，规定米市不设零售（一斗以下不售），贫苦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农会为了解决农民们的生活问题，立刻在沙村召开农会会员大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由文求同志率领众人，各人带备一升数合的米款，赶往米市。农会会员有计划地插入采米的群众中去，逼使米商作一升数合的零售。由于农会这一措施，适合广大贫苦人民的要求，在群众公愤下，米商只得依照农会提出的条件，撤销了唯利是图的规定，实行零售。沙村农会斗争的胜利，使远近各村的贫苦农民都感到加入农会的好处，纷纷要求组织农会和加入农会。

同年五月，乡中又发生菸酒税征收额外强征的事件（该地农民的习惯，普通农民都酿少量的米酒），在文求同志领导下，农会为了维护贫苦人民的利益，发动农会会员起来与征收员作不调和的斗争，到处贴标语，作宣传，使征收员以后再也不敢来沙村收税了。附近各村农民也藉此得以免征额外的酒税。

由于文求同志能根据党宁波地委发展农民运动的方针，处处为农民的利益着想，又经过反霸、反奸商等一系列的斗争，农民协会在沙村既是群众组织又是唯一的政治力量。在此基础上，文求同志先后吸收了五、六个贫农入党，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他担

任了这个支部的书记。一九二六年七月，文求同志调离沙村，这时农会的会员已增至八、九十人，沙村农会的威信也散播到周围各个农村里。一九二六年秋起，这里的农会工作改由沙文汉同志继续领导，后来与浙江省有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卓兰芳同志在奉化松岙所组织的农民协会南北相连，在象山港沿岸的奉化、鄞县地区成为农民运动的根据地，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连续进行武装斗争。

（三）

文求同志离开故乡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党和团号召各地青年前往广东支援。文求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从上海赶往广州，并考入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哲学系，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那时，文求同志马列主义的政治水平已经相当成熟，如他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写给他的大哥沙孟海同志的信中说：“中国革命的局势已经一变而转入新时代”，指出国民党将叛变革命，它们“是要消灭孙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要拉着中国社会到封建政治——军事独裁底路上去”，并指出今后中国革命将“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三大势力共同建设农工的民主制度底新时代”。（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五辑《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第七——八页）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卖国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党受到重大的损失，幸存者都转入了地下。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奋不顾身地工作着，

忘记了疲劳和危险。当时他的哥哥鉴于形势险恶，屡屡劝他回上海。他接信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来信叫我不要做太危险的事情，我想你不必这样说，对于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你是很有损失，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不果断。……你对于诸弟，尤其对于我应该是促其入险，鼓其前进，姑无论你自己能否临阵，但须知你的弟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临阵而胜，非我之胜，亦你之胜。你是督促临阵者，我是临阵者，事实应该如此，你切不要染溺爱之气，而表示中馁之状态。”（见上引《选辑》第一四页）。由此可见，文求同志在革命困难时期，革命的意志是坚强的，不愧为无产阶级英勇的战士，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

文求同志对革命前途也充满着信心，虽然大革命的成果被反动派所篡夺了，但他认为“由于这里（指广东）的农村运动已有很长的历史，乡间的革命势力已有很好的基础，如同湖南、湖北一样”（见上引《选辑》第十一页），已经看到农村根据地的曙光了，所以他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见上引第十四页）。即革命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这些信念鼓舞着文求同志更英勇地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九月，文求同志的行踪已为敌人所发觉，国民党警察侦察到党的交通机关，警察潜伏在交通机关里等候他回来。当文求同志走向交通机关时，一个邻家的老婆婆知道情况有点不妙，叫他避开不要进去，可惜他对广州方言听不懂，仍若无其事地进入屋子里去，结果被捕。由于文求同志自少练得一手拳艺，把拉住他的一个警察打倒，立即跑进中山大学（在惠爱路）并从后门逃走，警察起来追问站在门口的老太婆：“那人逃到那里去

了？”这位老婆婆故意指向另一条路，文求同志得以脱险。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清晨，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红旗布满了广州，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文求同志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和少年先锋队总队长，领导少先队员维持市内秩序，开展宣传活动并参加肃反工作。当时中山大学的反革命分子和广州法院的法官，就是他带领着这班少年先锋队同志前往逮捕的。

广州起义的第三天，由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互相勾结进行镇压，广州起义失败了。那时文求同志已担任赤卫队的队长，他率领赤卫队员与敌人展开浴血苦战，但因寡不敌众，后路被切断，他同几个同志冲出重围，机警地走入一所马车房子里躲过了敌人的追击。十二月十八日他向其兄报平安的信中说：“此次广州经过共党之乱（他在信中照国民党报纸的口气称广州起义），牺牲真是不小，……被杀戮者据报上所记，单属共党本身已逾二千人之多。古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则谁为之天？谁为之地？是固有人在也！我想为之天、为之地者，不特对于此次惨劫无动于心，且将更进而为天之日、地之地以照临斯民耳！……昨晚七、八时，出街闲步，街上已少人迹。朔风夜至，卷沙扬尘，当空怒号。疑为已死者呼冤叹伤，而动未死者之怀也”。（见上引《选辑》第十八页）

起义失败后，组织上通知各人自找隐蔽，他与若干同志潜往香港，到港才几天，文求同志接到组织上的信，派他担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经过起义失败后的广州，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残酷和党内情况的复杂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何况文求同志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几次暴露，非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是不敢受命的。这时文求同志的决心可以从他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给他的兄弟沙文汉同志的信中看出来。他以勉励的口气表达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体会，即一、要有“雄大的胆量”，即革命的英雄气魄；二、光有胆量还不能干革命工作，“应更求技术之精良，贯彻和增进原有的胆量”，即要研究在起义失败后的条件下的对敌斗争的策略；三、“更要求知识之充实”，还应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到手。他认为有此三项，就能把革命工作做好。他告诫沙文汉同志说：这是根据“这里最近有些事情，使我不能不对你说的”，即从他在起义失败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见上引《选辑》第二〇页）。由于这封信是邮寄的，他不得不用“胆量”、“技术”、“知识”等名词笼统地表达出来，向沙文汉同志叙述自己在“生平的悲愤，责任的严重和事情的艰难”中的一些体会，并叫沙文汉同志“切不要把我的话平淡看过”（见同上引文）。

由于敌人不断地侦察和搜捕，不幸的日子终于降临了。一九二八年八月，沙孟海同志从上海邮汇几十元钱给他，款寄给“广州大新街元锡巷十四号”，不久邮局将款退回，注明“此屋已查封”，没人收款。经沙文汉同志通过党组织询问，一星期后党中央派同志回答：“沙文求同志已在广州被捕牺牲”。当时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加上“共匪”的罪名，报道沙文求同志牺牲的消息。

一九六三年五月写

一九八〇年二月校

汪子望烈士事略

潘念之

先烈汪子望原名懋钧，浙江龙游人，生于一九〇〇年间。初在龙游造纸厂工作，一九二二年到宁波，任鄞县云龙碶小学教员。一九二三年浙江进步教育家、国民党左派人士经子渊（亨颐）任浙江第四中学（设在宁波）校长，烈士受聘任该校初中部语文教师兼教务员。一九二五年经子渊去职，烈士离宁波到汉口，任宁波旅汉公学教员。

汪子望烈士幼年受的是封建教育，经五四运动，思想上、政治上转变很大，参加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军阀、官僚、绅士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抨击甚力。继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正道。但他亦因此而受到顽固派的威胁、打击，几次失业，流转各地。

一九二三年初，汪子望烈士在宁波加入当时的进步青年组织“雪花社”，这年年底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当时宁波党的刊物《火曜》的编辑人之一，对该刊的撰稿及出版工作，尽力很多。

一九二四年冬，全国掀起“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宁波响应这个号召，除了发行宣传特刊，向各方面展开活动以外，并于这年十二月廿五日（圣诞节）举行全市示威大会和游行，在各教

会学校学生间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烈火，进行了很大的斗争。因愤于帝国主义的强暴压力，圣模女子中学及其他学校的许多教师、学生退出了学校。宁波党为支持这部分反帝师生的斗争和学习，一九二五年初创办了宁波启明女子中学。这个学校就是后来宁波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和基地。当时汪子望烈士积极参加了反基督教运动及创办启明女中的工作，并在启明女中创办初期，义务任课。

国家主义者当时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敌人，他们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就是针对和企图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宁波国家主义派李瑄卿、陈杏荪、陈叔谅等人，披着爱国的伪装、欺骗群众，混入党领导的“五卅运动”，企图夺取宁波的这一运动的领导权。当时的第四中学初中部主任就是李瑄卿，李和他的几个亲信在同学间散布反共言论，曾经起了一些作用。烈士联络进步同学，对李瑄卿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揭发曾琦、李璜等的“醒狮派”和李瑄卿的所谓“新国家主义”的骗人谬论和反动实质，阐明共产主义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真义，工作颇为艰苦。但经过一场斗争，第四中学的绝大多数学生，认识提高了，看清了国家主义派爱国是假，勾结反动势力图谋私利是实。于是宁波五卅反帝运动的群众，都接受了共产党的口号和主张。有一次，参加游行的第四中学学生陈洪正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李瑄卿听了跑过去对他说：“你喊打倒帝国主义，老百姓听不懂，还是喊打倒列强的好。”陈洪回答说：“我要喊得老百姓都懂，都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李瑄卿企图夺取五卅运动领导权，篡改运动性质的阴谋，终于失败了。

汪子望烈士在群众运动中既坚持党的路线和纲领，其语言、文章又极生动活泼而富于感情，是党的一个好宣传员。

汪子望烈士在一九二五年夏间到汉口以后，仍积极参加党的各项工作。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党的工作大大展开了，烈士投身于工会组织及教育工作，特别在汉阳兵工厂内费尽了他的心力。但他在社会上仍保持宁波旅汉公学教员的身份，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一九二七年七月，国民党内的无耻政客汪精卫、孙科等人终于撕破“左派”的假面具，与蒋介石合流反共，凶恶地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党的部分同志转移到外地去搞武装斗争，留在武汉的同志则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汪子望烈士因极少暴露，奉上级组织决定，留汉口负责党的一部分工作。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的机关屡被破坏，不少同志牺牲了，尤其是在“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的一九二八年“春节暴动”后，党损失很大，于是烈士担负起更艰巨的工作。他以其原任职的宁波旅汉公学为联络地点，集合同志，恢复武汉地区的党组织，重新开始工作。后因被叛徒出卖，烈士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反动派逮捕了。同时被捕的有旅汉公学教工三人。在狱中，他勉励同志们坚持斗争，绝不屈服，同时要以公开职业和社会关系掩护自己，不要招认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组织关系，求能出狱，继续为党工作。但烈士本人因被叛徒指证，并有其他被破坏机关的文件牵连，自知不能免，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这一机关的唯一负责人，而被判死刑。四月五日早晨，汪子望烈士慷慨就义。同时牺牲的还有许伯平烈士。此外被捕的庞来清同志及工友一人则以烈士的掩蔽，在后得以释放出狱。

汪子望烈士未结婚，在汉口无亲属，被害后其遗体由旅汉公

学同事为之收殓，寄棺于汉口四明会馆。次年，当时上虞春晖中学教师，过去宁波“雪花社”旧友王任叔、毛路真、张孟闻，设法将烈士灵柩从汉口运至驿亭，葬于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校后的山麓。请旧时浙江第四中学校长，当日春晖中学校董经子渊先生为之题词曰“呜呼汪子望君之墓”，刻石立于墓表。

董子兴同志狱中日记

戚秀媛供稿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的中共奉化县委书记是董子兴，于同年旧历十二月底就义。他的遗体由王任叔同志安放入棺时，发现衣袋内有此日记。原件被王任叔同志拿去。后来我们是从一本名为《白露》的刊物上又发现这篇日记的。一九四九年，这本刊物被北京收集烈士文物单位征集去之前，由我女董剑雄将这篇日记抄录下来。

其中F县即奉化县，N埠是宁波，C县是绍兴县。日期是旧历。

董子兴同志狱中日记

十月十八日

今天我可说是正式入狱了。

前几天，我是在路上，从F县被捕这一天算起，到现在已有九天了。其间在F县营部里关了二天，N埠的剿匪指挥司令部里关了三天，C县监里关了一天，算来在路上是三天。然而我觉得，这一期间，都可说是在路上，正如一个未入世界里来的母胎里的小孩。

这里，真是一个世界，我要开始我的生活了。

最奇怪的，他们素不认识的，见了我都拍着手欢迎我。他们高喊着：“哦！哈！我们的同志又多了一个！”

接着，他们都走来和我握手，问我怎么样捕来，为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些问题无回答的必要，笑笑谢绝了他们。

“还不是一样！我们的同志啊！哦哈！”大家又笑着散了。

在我是感到万分快乐了，这里真是个新世界，不同于旧世界了。

我当然是旧世界过来的人，当我第一次入狱——这是六月前的事了，被警察厅以危害治安罪捉去的时候，关在监狱里，是如何受着囚犯们的欺侮啊！

“你有没见面礼？”他们见了我就这么的问。凶极了。他们一点没有笑容。

我不懂，默立着。

“那么就请你睡在那儿”。

我循着指头看过去，却原来是尿桶的所在。我当初有点不愿，然而他们却用强暴的手段使我俯从了。但，他们偏不许我脚抵着尿桶睡，一定要我头放在尿桶一边，——我又俯从了。

第二天，他们又要我扫地，又要我任役使……从此我知道在这世界里，阶级是分得很显明的。“龙头”，差不多就是这个世界的君主，什么人都要小心服侍他。

然而这里不如此，欢迎、握手、问好，充满了欢乐的空气。

十月十九日

因为知道我是××，一位姓陈的朋友来看我。

他是一个和善的青年，近视眼，长圆脸，中段身材。我问他曾经做过什么事，他说：曾经当过党部里的秘书。被捕的原因，却是拥护某一家的政府，现在二家和好了，似乎他应该释放了。然而他终于没有希望。

“阔人们闹意见，尽可以分家，尽可以和家（解）。”姓陈的朋友说：“不幸的是我们，却作了牺牲——虽则我还不曾死。”

我觉得陈君无怨嗟的必要。

十月二十日

昨天，倦乏了，睡了半天。

今天我才知道这里生活的法式。

这里的所谓教育事业的校长先生是一位魁梧的张君。他的眼睛有点近视，深深地凹进，颇有点欧化了。谈话的时候，另有一种吸人的力量，尤其是谈及政治的时候，每个字象斩钉截铁的吐出。他越谈越起劲，白沫就从口角吐出。然而，他舍弃了他的政谈，叙述他的历史时，他又温和起来，象一只阳光下伏着的猫，懒洋洋的被爱情所麻醉。

十一月一日

从此我知道我们这个世界的好处。我们不愁食，不愁衣，平等地生活着，平等地招呼着。

金钱制度是该废去了吧！在这个世界以外，我也曾教过几年书，但总没有象在这里教书一样的尽心。说句好听的话，以前我的教书是为生活，自己的生活、妻子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现在

的教书是没有什么目的了，只觉得能把我所知道的尽量的教出去，使别人领解了，便是一种难言的快乐。象这样的世界，还不值得快乐吗？虽则是梦想，我总希望这个世界扩大开去，永久的存在下去！

（失却了日期——抄者注）

有赐赠来的时候，永没有一个人当作私有物。分给已成了这世界里人们的习惯吧，就是爱情也无偏私的了。我们常见张校长的爱人来看望张校长。现在，居然和我们也很好了。她知道我们中谁最寂寞，她写信来安慰谁，她真是我们的天使。

今天碧姍姐有信来，我复她一封信说：“请不必忧，我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几年来，怀抱着一腔热心去找求人的生活，于今竟得到了，这里没有假笑，没有伪啼，每一句话，都是从肺腑里说出，既没有利害关系，就也没有凌辱陷害的阴谋，大家只是熙熙的生活下去，在各自研究学术，人类的幸福是要从我们这里做出出发点了。”

今天又来了一个同志，面部象岩石一样苍老，两颊没有一丝肉，两眼深陷有一寸深。当他眼睛盯住某一事物时，某一个事物似乎立即被缩小了，他和张校长认识，他是姓赵的。

这里最可怜的是一位麻疯病的艺术家。今天，他提出去讯问了。他对我们说：“不必讳言，我是革命党人，我在刑庭上这样招认了。实在的，我入革命党就是那位刑庭长介绍的，他那时在×校教书，我就是他的学生。他讯问我时，到底心里不知怎样，我倒为了他难受，但也只有他可当作这刑庭的庭长，因为他大半知道我们革命党人的名字，讯问的时候就不会冤枉。”

艺术家说了后淡然的一笑，态度非常安闲。接着姓赵的朋友说：“那么也正惟有他将来可以兼作反省院院长——因为他早已反省过来了。”

十一月七日

“借一种宗教的教条去杀人，似乎每一个人知道是野蛮，以一种主义去杀人也不能算文明。”——记于陈君枪决之后。

一种思想就是一把宝刀，在于运用的手段如何。但总以不碰着人头为是。

真了解这一种思想的人，一定能把这宝刀运用得很好，惟有莽夫既不懂思想也乱用宝刀。——于是人类的历史将会有有一个时期停滞起来。因为继续旧时代的青年杀尽了。

如其某一个人真是某一种思想的典型人物了，如封建思想的典型人物之类。于是，我们为想去除障碍起见，我们不得不取一种断然的手段。啊！我又记起陈君的话。

“闹人们闹意见，尽可以分家，尽可以和家（解），不幸的我们却作了牺牲——虽则我还不曾死。”然而，已经死了。

十一月十日

这似乎又是请君入瓮的故事，象艺术家所述的，这外边的世界人们太可笑了。

（这里有一大块血渍，血已经黑了，字迹也模糊了，隐约看去，似乎他在赞颂某一个世界。——抄者注）

今天我们组织了一个“报社”，赵君作了主笔。他能做很好的革命诗，使人读了禁不住兴奋起来。

我们每个人约好，每天要做一首诗。同时，每人要讲些恋史，可惜我讲不出什么来。

十一月十三日

昨天在“公报”上掲載了一首诗。——我们的“公报”是一张相互传阅的纸张。——这首诗是姓石的同志做的，他的话，好象在警告我一样。

不要做幻梦，
安乐的生活，不是我们所过的；
世界以外的人们，
正哭着、喊着、饿着，
他们的脸象黄腊，
他们的身体象麻骨。
他们举起了锄头，他们放下了锄头，
一锄，一折腰，一叹息；
他们举起了铁锤，他们放下了铁锤，
一击，一挥臂，一声哭；
他们为魔鬼们种稻麦，
他们为魔鬼们造房屋。
他们的儿子们赤着脚，
他们的妻子们披着发，
也没有屋住，
也没有饭吃。
这岂也是上帝的造化，
该让魔鬼们去活？

该让魔鬼们去活，
谁是魔鬼们的护法？
我们要摩着掌出去！
我们要挥着手出去！
拿锄头的站拢来！
拿铁锤的站拢来！
挥起了锄头，挥起了铁锤，
看我们演一出武装剧。

十一月十八日

我总觉得自己还是士大夫气太重的人。——石君的诗，竟给予我们新的刺激。

今天和石君招呼了，而且细谈一通。

他的名字叫作怀民，他是一个矮小精干的人，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艺术家出去了。一种不测的预感在各人心头荡漾。——他是不再返到我们的世界里来了。

“一个世界的安乐是不能独存的，世界以外的世界就会来侵略你，所以我们的理想是地上的。”石君以凶险的眼光，瞪着来提麻疯病尚未痊愈的艺术家的士兵，一面对着我：“所以我们现在应有走出这个世界以外去的勇气。——我现在要组织敢死队，冲出到世界以外去。未死以前，这样的活着，是怠工；既死以后，不能再有所贡献，是尽责。我不能忍耐了，劳工们的喊声在我身边震荡，我不能忍耐了！”

十二月××

我竟将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无以对死者。

我决不愿再写什么东西了！在这一册的日记上，我没有事业留给世人，我写这些无聊的东西有什么用？

十二月十一日

我一再的自咒着，不要再写什么了，而我还是写着，这该诅咒的灵魂！！

昨天，我被讯过了，我承认我是革命党人，而且我是F县负责的革命党人。

最使我痛心的，是F县革命党全部的工作给我“破坏”了，因为什么证据、名单都被搜去了！

碧姍姐有信来，使我想到过往的一切了：我的年青的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女儿，我的没有了儿子的父亲，我的十二、三岁的妹妹，我的后母……甚至于我又想起了我已经死去的祖母，已经死去的第一个妻子……不信，我竟成了这样伤……

（伤字底下就没有字，想象过去，大概他预知他要被执行枪决了，写到伤字，就是提他的兵士到了……——抄者注。）

裘古怀烈士遗书两封

编者按：第二期革命史料特辑，我们曾发表大革命时期裘古怀烈士的传略。最近，宁波市政协文史组征得裘古怀烈士两封遗书，一封是给党组织的，另一封是给他的爱人汪瑞飞的。现全文刊登于后。

（一）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亲爱的同志们：

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国民党匪徒正在秘密疯狂地屠杀着我们的同志。被判重刑和无期徒刑的同志，差不多全被迫害了！几分钟以后，我也会遭到同样被迫害的命运。

伟大的党！亲爱的同志们！我非常感激你们。由于党给我的教育，使我认识了这社会的黑暗，使我认识了革命，使我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现在在这最后的一刹那，我向伟大的党和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补做已经来不及了。在监狱里，看到每一个同志在就义时都没有任何一点害怕，他们差不多都是像去完成工作一样跨出牢笼的。他们没有玷辱过我们伟大的、光荣的党。现在我还未死，我要说出我心中最后的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要百倍地扩大工农红

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要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争取胜利吧！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

袁古怀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

桂芬：

今天我就要被万恶的国民党迫害了！请你不要悲痛。你要勇敢些。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将来一定会有人替我报仇！我死后，希望你不要太封建，你应当重建你的家庭，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正派人。（虽然我不愿意说这句话，但现在我想我应该说出来。）如果你还纪念我的话，希望以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叫他“念怀”。

桂芬！你晓得现在我是多么地想念你啊！

请你代我向一切亲戚、朋友们致意。

古怀

八月二十七日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

——记“四·一二”以后的宁波

周 闪 耀

一九二七年二月，当北洋军阀退出宁波后，蒋介石派了亲信王俊来做“浙东（宁台温）防守司令”。国民党右派秉承蒋介石的意志，蓄意发动反革命政变。

四月初，国民党右派勾结若干反动资本家和一批流氓，火烧我党领导下的总工会。王俊下令全市戒严。那时党还是幼年时代，警惕性不够高，因民国日报社长左派人士庄禹梅被王俊扣押，竟派了共产党员杨眉山、王鯤等，到王俊的司令部去质问。他们当场也被王俊扣留。四月十一日，宁波时事公报登出消息，国民党右派以“捣乱”及“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罪名，把四十多个党、团员和左派人士“清除出国民党（以前国共合作，共产党员有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要职的），其中有杨眉山、王鯤、竺青旦、柴水湘、冯咏雪、庄禹梅、忻太僧、周闪耀等。六月二十三日，刽子手杨虎、陈群来到宁波，马上成立所谓“清党委员会”，开始实行大屠杀。自六月二十六日起，接连三天，就杀害了六个革命同志。第一天，杀了杨眉山、王鯤；第二天，杀了甘汉光、胡焦琴；第三天，杀了陈良年、吴德元。在这以后，党组织

针对这一特殊形势，采取了两条应变紧急措施：一、迅速动员所有党团员，用各种可能办法，隐蔽起来。提出了“站住了脚就是胜利”的口号。二、动员已经暴露身份，被反动派视为“要犯”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或赴外地躲避。这些人中，有竺青旦、李宪仲、顾我以及奉化的蒋昌林等。

在四月初，自杨眉山、王鲲被扣留以后，中国共产党宁波地委决定发动全市罢工、罢市、罢课，以对抗王俊的反动行为，并决定在宁波城内小教场举行群众示威运动。当时沙文威（即史永）担任组织学生队伍的工作。各校学生于四月十一日晚上在后乐园（即今中山公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行动计划。十二日，学生们都踊跃地到小教场去开大会。当学生队伍到达时，反动派新任的公安局长吴万钧正在向警察大队训话。学生、店员以及教育界的一些队伍，边呼口号边冲，并将台上的公安局长推下来，警察因此匆忙撤退。当群众正在高呼口号等候工人队伍到达之际，反动派军队开进来了。起初，说是来维持秩序的，正当群众在向军队做宣传工作时，军号吹起来了，反动军队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四围又有小队士兵上了刺刀冲进来。当场死工人一人（熊双福，宁波铁路工人，铁路工会的纠察队员），伤二人，被捕多人。大会因此不能开成。

这一事件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罢工、罢市、罢课迅速发展开来，声势浩大。王俊起初假意派蒋坚忍出来和工会谈判。谈判之间，知道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王俊也就拒绝谈判，并进行搜捕，实行血腥镇压。

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但经党采取了紧急措施，也得以保存许多党团员，其中就有卓兰芳、

卓恺泽、沙文汉等几十人。卓兰芳于一九三〇年在杭州被捕，就义于陆军监狱。卓恺泽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受命去武汉任团中央特派员兼湖北省委书记，四月十九日下午去武昌开会被捕，二十六日晨牺牲，当时实足年龄仅二十二岁。

一九二七年九月间，党又派沙文汉到宁波来，着手恢复组织。从九月起，除了在宁波市内英烈街柴家设立联络站外，又不断地在江东土地弄、南门王家墩、冷静街范家祠堂和北大路等几处建立据点。有几个据点，党还派了专人负责抄印文件和出版《红旗》刊。但因事变后剩下党员已经不多，要继续开展活动感到困难。因此，党提出必须把所有团员也动员结集起来，作为党的助手。所以，在那年十月间，党又从省里派了原省团委书记卓恺泽来宁波工作。

当时我是以一个团员身份由党派往鄞南石路头三池小学协助党工作的。十月底，我到柴家去接洽工作时，恰巧卓恺泽同志刚从杭州来宁波。我们是同乡，又是高等小学先后同学，一见面就认识。两人都感到特别高兴。当时卓恺泽同志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是来宁波恢复团组织 and 开展活动的，你是团员，要赶紧把所知道的团员找拢来，为继续革命贡献力量。过了几天，他来到三池小学，向党员钱宗正了解鄞南一带党团员情况。那天上午，他还和我们两人一起去附近康懋小学，找到沙天波和另一位同志，我们五个人，就坐在一起开会。那天正是星期天，学校里的教师都回家去了，学生也没有，可以尽情畅谈。卓恺泽同志分析了形势后，强调革命需要武装力量，要用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我们还在他的指挥下，一起唱起少年先锋队歌：“走上前去，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

几天以后，我和钱宗正一起去柴家，又遇到卓恺泽同志。我们把所能想得到的团员姓名告诉他，如袁人魁、汪文元等。卓说：“要赶紧去动员他们来。”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回答说：“只要能够找到他们，总要动员他们来。”卓恺泽同志又说：“找到后，要请他们也回忆，还有哪些团员。这样，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的人。”在当时，是多么需要集结力量啊！

当我们快离开时，卓恺泽同志要沙文汉同志拿出一张宣传画来。这张画里，画的是一个牢狱的铁窗，从铁窗里伸出一只拿着红色旗帜的手，画上方写着一句激动心情的口号：“援助被难同志！”沙文汉同志和卓恺泽同志都对我们说：当前党的活动处在低潮之中，有成千上万的同志在敌人的铁窗中受难。由于遭受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袭击，党在经济上也极度困难。为了要继续革命，要救济被难同志，所以号召党团员设法开展捐献工作。不仅有力量的同志要出钱，凡是大革命时期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也可以动员他们帮助。我听了后，毫不迟疑地掏出身边仅有的几毛钱作了捐献。

从这次以后，我和卓恺泽同志就没有再见过面。过了几月，据沙文汉同志说：卓恺泽同志被党派往武汉去担任华中局的团委工作了。可是，不久恶耗传来，又听到他在武汉牺牲的消息，使我万分悲痛。

卓恺泽同志是一个十分勇敢坚强的青年。他于一九二三年就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和北方局区委委员，编辑过《中国青年》。他用“砍石”笔名在《中国青年》上写了许多文章。他的牺牲，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

在白色恐怖魔影笼罩之下，要开展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在三池小学内，除了我和钱宗正外，十一月间，党又派来了一个姓杨的同志，专门负责抄写文件和内部刊物。他是外地人，不会讲宁波话，白天总是躲在寝室里，晚上抄文件。他抄好后，由钱宗正和我印刷。第二天，杨带着印好的文件到鄞县各处去分发。这样一直工作到一九二八年春季。由于特务沿途搜查，党为了防止意外，就改用化学水印刷。印好的文件，表面看来仍是白纸，用碘酒蘸着才会显出字来。这样又搞了二、三个月，由于宁波有些同志被捕，有些机关被破获，党决定把三池小学据点暂时撤消，杨也调走了。六月间，我去上海艺术大学念书，就离开了宁波。

奉 化 暴 动

陈 修 良

“五·卅”运动以后，我们党就重视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沙文汉同志（那时他已入党一年）在宁波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就到他的故乡鄞县邻近奉化县的一个村庄——沙村，去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要求减租减息。当时奉化中义区的党的负责人是卓兰芳烈士，沙文汉当时负责大咸乡的农民运动。这两个地区后来合并为党的鄞奉区委，卓兰芳为区委书记，沙文汉为组织委员。他们布置了一次反苛捐杂税运动，打跑了奉化县的知事，一时农民运动威声大振，农民协会普遍地建立起来。农民领袖中有赵国忠、卓阿惠等，小学教员沙天波也参加了农民运动。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浙江军官夏超部队响应北伐军，在杭州一带起义，不幸失败，对革命运动的影响很不利。一时间浙江的地主、土豪劣绅纷纷出动，他们在农村中搞武装，反对农民协会，一度使鄞奉地区农民运动受到打击。不过那时因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很好，农民运动还是继续发展。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前，宁波的反革命屠杀还没有开始，鄞奉地区组织了六、七千农民，沙文汉指挥盐民打掉盐警公所，打了镇压盐民的税官，这场斗争发动了农民、渔民一起参加，斗争声势非常浩大。沙文汉还带领了农民打掉寺院庙宇的菩萨，没收了

和尚、尼姑的土地、财产，为奉化暴动作好了初步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国民党首先在宁波“清党”，宁波地委不顾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主观地布置了组织农民武装，实行暴动，夺取城市。当时革命形势已趋于不利的地位，农村里没有什么党的组织，国民党军队联合起地主豪绅的武装力量，反革命势力相对地说相当强大。反动派摧毁了农民协会，逮捕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在敌人疯狂的搜捕之下，沙文汉潜往上海，国民党政府就下令通缉，沙村的老家被当地的土豪劣绅派人抄家与抢劫，还捕了沙文汉的五弟沙季同。后来只好举家逃难，迁居上海。

当时党对革命形势估计，认为革命仍然在高潮中，因此浙江省委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间仍派卓兰芳与沙文汉二人回到鄞奉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暴动。沙文汉担负宁波东乡的农民工作，但不久又调到鄞奉区委去整理农民协会工作，组织奉化暴动。浙江省委接着又调沙文汉去做鄞奉区中心县委书记，给他的主要任务是：一、负责整理农民协会；二、准备武装暴动，占领奉化或宁波城市，这个区就是暴动的中心。要求首先发动暴动，然后各地闻风而起，占领浙江。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暴动准备，省委还派了卓兰芳同志代表省委进行指导。在敌人的严密包围中，他们努力了四个多月后，终于组织了一千多个农民，收拾了十来支长短枪，几十支土枪。当然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但省委仍然布置了在旧历年关举行奉化暴动的计划。敌人在农民起义之前，已有风闻，他们集中了军队力量，向中心地区进攻，因此暴动计划无法实现，卓兰芳同志只好撤离。沙文汉则被围山上，经过几天之后，无法支持，也只好在黑夜中撤出封锁线，从象山港

飘流海上，由一个渔民陪同，离开了鄞奉地区。在这次暴动失败后，农民舒国方同志在夜袭中被捕牺牲，有许多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多遭捕去，例如沙天波。

奉化暴动是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一次典型的盲动主义暴动，时间是一九二八年一月间。

沙文汉后来到了上海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间，他到苏联去参加国际青年反帝大同盟的会议，他见到了瞿秋白同志，那时秋白同志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很关心地问沙文汉同志关于奉化暴动的事情，沙文汉把奉化暴动如何失败的情节汇报以后，秋白同志很难过地说：“这是一次典型的盲动主义暴动，我们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那一次谈话，我也在旁边听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到我们革命的先辈，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从不文过饰非的。沙文汉在抗日时期所写的自传中回忆这段往事说：“错误是明显的，我们过高的估计了当时群众的条件和浙江革命形势，在这个地区和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我们只应组织农民和游击战争，而不应组织大规模的暴动。”

奉化暴动是我党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结果，以失败告终。但这次暴动给鄞奉地区的影响很大，对后来开展游击战争有启发作用。在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史中，写下了英勇斗争的一页。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记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龙 跃

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中有一支部队叫红军挺进师，它在浙江及浙闽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这个部队原来是方志敏同志的红军第十军，一九三三年二月从赣东北苏区调到中央苏区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十一军，当年十月改编为红七军团。这个部队素质优良，很能打仗，特别是善于打游击战。在中央苏区反对蒋介石第四、五次“围剿”时，它配合红三军团在东方战线（闽赣边和闽西、闽中）作战，打过不少胜仗。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参加了硝石战役，消灭了许克祥师的一部。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它掩护红三军团攻开沙县，当红三军团向延平（即现在的南平）开进时，它在三军团的掩护下，打下福建省有名的土匪卢兴邦的老巢尤溪县，后来又单独打下永安县。两仗消灭卢兴邦三个团，缴获一个兵工厂。特别是四月间，我归化县城被卢兴邦匪部四个团的兵力包围时，城内我军只有一个独立营和一些县级机关，情况十分危急，红七军团奉命从一百七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出发援救，当天赶到归化，打垮敌军并消灭其一部，及时解了归化县城的围。之后，它又在三元（即

现在的三明市）永安和尤溪之间的桃源，击溃来犯的敌军第八十师一个旅并全歼其一个团。以上这两仗都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嘉奖。还参加过剧烈的浒湾八角亭之战。六月底，它在参加建宁方面的保卫战中，被紧急调回瑞金，接受新的任务，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行北上抗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到达长江南岸的皖南地区，支援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皖南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当时皖赣边和皖南黟县柯村一带已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保卫闽浙赣苏区，配合闽浙赣红军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在皖浙赣地区建立新的抗日前进阵地，开展抗日民族革命斗争。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第七军团北上抗日还发表了宣言，名称是“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向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亡国灭种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之后，宣言接着说：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灭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笔者注：即（一）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二）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群

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中国的民族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族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进攻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六千多人，秉承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抗日意旨，高举北上抗日的光荣旗帜，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由红都瑞金出发，经过福建的西部、中部、于七月二十九日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部分队伍的掩护下，在樟湖板胜利地渡过闽江。接着沿江东下，占领水口，进攻福州（未打进去）之后，再北向经过福建东部、北部以及浙江南部、西部，越过西天目山，于九月底胜利地到达目的地安徽省的南部地区。一路来，先遣队英勇善战，消灭了不少敌人。如一出苏区门就打下大田县，消灭城内守敌，并缴获无线电台一架，渡过闽江后的当天，在黄田、谷口打垮敌军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的江防部队一个营，并俘获一部分敌兵。在福州以北的桃源坞打垮来犯的敌军一个团，并缴获武器几百件。攻下罗源县城又消灭敌人一个营，加上伪警察等共一千多人，并俘虏伪县长一名。打下福安的重镇穆墙又消灭了一部分敌人，缴获大批物

资，仅鸦片烟土就有五十多担。进入浙江后，打下庆元县城，消灭敌军三个连，第二天又在梅园、竹口打垮浙保第一纵队两个团，打伤伪指挥官蒋志英，缴获迫击炮两门及其轻武器数百件，并俘虏庆云县的伪县长。在江山的清湖镇也缴获大批物资，翌日在通过杭江铁路（即现在的浙赣铁路）时，又打垮由浦城和衢州两方面来的四个团敌军，破坏铁路两段，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据说蒋介石的亲信浙江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其时正在常山城内，险些被我们活捉。在天目山脚下给尾追的敌军伍诚仁的四十九师以杀伤。翻过天目山后，又在屯溪给从芜湖增援来的敌军一个师以迎头痛击。此外，沿途还消灭了不少地主武装。

在政治上，一路上宣传了党的主张和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时，党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给先遣队印发了各种宣传品二百万份，计三百担，并专门派了一个运输营挑着前进。先遣队过闽江后就开始张贴和散发了这些宣传品。沿途群众从来未见过共产党和红军，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与政策不了解；相反的，国民党反动派则在群众中进行了长期的反动欺骗宣传。先遣队每到一处都向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如发宣言，写标语，开调查会、座谈会，召开群众大会，指出劳苦群众受苦受难的原因是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号召一切革命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在当前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北上抗日先遣队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严格遵守毛泽东同志亲自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保护群众利益，从事实上揭破了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民

族利益，不打日本，专门进攻苏区，“围剿”红军，拦阻红军抗日去路的卖国政策及其反革命行径。因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横跨福建、浙江两省，最后到达皖南的一路上，深得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抗日先遣队在北上途中路过闽东时，在连江县的白浪地方与闽东特委会师，第三天又在罗源与福安之间的赤溪与闽东游击队会师，那时闽东还没有正式红军，主要是地下党和地下武装组织。在那里举行过连级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出苏区以来，特别是打福州的经验教训，并会了餐。请闽东特委负责同志和游击队干部参加了会餐。在以上两个地方，随先遣队行动的中央代表和先遣队的领导同志向闽东特委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指示，同时先遣队也得到了闽东特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主要是替先遣队安排了四、五百名伤病员在当地群众家里隐蔽治疗，使先遣队摆脱了几百名伤病员的拖累，继续轻装北上。而这批伤病员经过治疗痊愈以后，也就成了后来闽东独立师的骨干。如独立师的师长冯品太同志就是原来先遣队的一个营长。先遣队经过闽浙边时弯路到过闽北苏区，在浦城和广丰之间的二十都休息了两天，主要是做好过杭江铁路的准备工作。那时闽北苏区比较艰苦，但我们在那里仍然得到闽北苏区人民的关怀和慰问，先遣队也将一路来缴获的一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以及在穆墙缴来的鸦片烟土等送给了闽北苏区。

毛主席在总结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时指出：红军是英雄好汉，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北上途中也同样起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如沿途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与政策，帮助群众建立了革命组织，同时还留下了一部分部队在沿

途打游击。如过杭江铁路时，留下了一个加强营，又叫红一团在江山、浦城和龙泉之间打游击。经过常山、开化和休宁之间时，又留下了一部分人在那一带活动。这些后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红一团在江浦龙一带打击敌人，发动群众，为后来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经验，也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皖南后，为了熟悉情况，捕捉战机，消灭敌人，先是在休宁、黟县、歙县、太平、泾县、东流、秋浦与浮梁、婺源等县之间作了初步行动，跟敌人打了几仗，杀伤过一些敌人。并与当地党的组织和游击队会过师。但这时接到中央电令，要先遣队进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同志会师后再决定尔后行动。因此先遣队又于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奉命由皖南转入闽浙赣苏区，与闽浙赣党政军民胜利地会师。闽浙赣苏区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地迎接先遣队，称先遣队为老十军，闽浙赣苏区重建的红十军为新十军。因为这两个军都是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创建的，群众这样称呼这两个军，并说老十军又回来了，我们听了后感到很亲切。为了今后统一行动和统一指挥起见，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在方志敏同志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北上抗日先遣队与闽浙赣红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由于战事关系此时两个部队尚未会合），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原七军团的部队编为第十九师，闽浙赣的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共约九千多人。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回到闽浙赣苏区后，得到方志敏同志的极大关怀，当我们一进入闽浙赣苏区，方志敏同志就在当天从闽浙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葛源镇到储田桥来检阅部队，

参加先遣队领导干部会议和全军指战员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在方志敏同志的关怀和领导下，中共闽浙赣省委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先遣队解决了棉衣问题，并补充了五百多名新战士。此外，还发动群众对先遣队进行了很大的慰问，单毛猪就有一千多头，草鞋近万双，以及其它食用物品很多。这样大的慰问，是我们七军团过去所没有见过的。方志敏同志的关怀和闽浙赣苏区人民的热烈慰问，先遣队全体指战员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战斗情绪大大提高。

这时主力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闽浙赣苏区的环境也十分紧张。十九师由寻淮洲同志率领从上饶、玉山和开化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浙西在白马击溃俞济时指挥的浙保第二纵队两个团，在分水县击溃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乘胜再进入皖南活动并攻克旌德县城。这时中央局指示红十军团全部跳出苏区。闽浙赣皖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和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同志乃率领军团部、二十师和二十一师经过婺源和德兴之间进入皖南，与十九师在黄山脚下的方村和汤口会师。

皖南地处南京、芜湖、杭州、南昌、九江之间，在军事上是一块战略要地。红军第十军团进入皖南后，曾打到宁国、宣城和芜湖附近，给敌人的统治心脏以很大威胁，蒋介石调兵遣将从四面八方调来了好几个师（旅）来围攻我们。红十军团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在严重的环境里跟众多的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几乎天天打仗。其中因一个主要仗即谭家桥战斗（敌军是王耀武三个团和俞济时的指挥部）没有打好，在皖南行动陷入被动，最后留下了一部分部队和干部（其中有原红十军政委聂鸿钧、原十九师五十六团政委王天龙、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邵南等同志）在皖

南游击区坚持斗争，主力乃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向南转移，不幸于当月二十一日在怀玉山被七倍于我的敌军包围，肉搏血战数昼夜，最后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除政委乐少华、参谋长栗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同志率领一部分队伍（主要是伤员和军团直属机关、四个已无弹药的重机枪连）做为前卫部队先期出发，回到闽浙赣苏区外，大部分部队都不幸损失了。原七军团军团长、红军名将寻淮洲同志在谭家桥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的最高领导者、闽浙赣皖政治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军团长刘畴西，师长王如痴，政治保卫局长周群等同志均在这次战斗中不幸被俘，后来又都在南昌英勇就义，光荣牺牲了。

当时部队里以及后来有不少人都这样讲，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谭家桥战斗没有打好，如果这一仗打胜了，先遣队就不至于失败的。这种说法，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似乎有几分道理，但就整个形势来说，谭家桥战斗并不是先遣队失败的主要原因，先遣队的失败主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结果。在当时主力红军退出了南方苏区，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这个谭家桥战斗即使打胜了，先遣队要在皖南安然无恙的坚持下来，也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早点下决心化整为零，把整个军团分散到闽浙赣皖边境或四省境内，充分发挥干部的独立自主的作战精神分开打游击，那么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或许可能多保存一点部队下来。根据后来挺进师的经验，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惜当时没有下这样的决心。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在执行北上抗日的神圣任务中，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史上所起过的重大作用是不可磨灭

的，它未竟的抗日事业，后来毕竟由它的突围部队所组成的红军挺进师继续肩负起来，在浙江南部和浙闽边境坚持游击战争，开花结果。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又成了光荣的新四军的组成部分之一，转战大江南北。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红十军团的光荣斗争史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里。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方志敏同志和其他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永垂青史，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一九七九年二月

浙南岗头村革命简史

曾 成 文

岗头村在浙江平阳矾山埔坪公社。解放前，全村十三户都是贫下中农，共百来人，都姓曾。岗头山山脉向四周延伸，村东面一村名枫树坪，南侧是福建省前岐区龟岭村，西面与福建前岐风桐村相近，北临温州堀村，四周约住三百多户。

十年内战时期，当时地下党领导人林辉山等同志发展了岗头村人曾彤弓、曾碧俭二位同志为党员，随后建立了村苏维埃政权，曾彤弓同志任村苏维埃主席，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建立了党支部，曾彤弓同志任支部书记。

一九三四年王宏文同志被福鼎县前岐反动头子林笑治杀害，但老区的人民没被敌人的残暴所吓倒，仍长期坚持革命的斗争。先后在我村从事革命活动的有：郑丹甫、林辉山、刘法羨、陈勉良、郑衍宗、陈朝九、温德奎、林桂程、陈伯弓、王烈评、何传练等同志，他们均较长时间地在我们地方进行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老区人民积极拥护革命，密切配合游击队进行分青苗，抗租抗税，打土豪，抓财政等革命斗争。

同志们来了，我们把床铺腾出来让同志们睡，自己睡地铺、柴窝。在饥寒交迫的艰难岁月里，我们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给同志们吃饱穿暖。如曾碧俭同志把自己的田卖了给党做活动经费；

曾彤弓同志一家将几担粮食支援革命同志吃用。

同志们来时，为保护同志安全，我们常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匪处探消息；晚上同志们睡了，队伍的岗哨布在二线，我们总是抢站第一线岗哨。后来，敌人摧残越来越残酷，同志们睡村里不安全，我们就在山上给盖个小茅房，让同志们平安住在山里。有一个山洞，现在人们把它叫“红军洞”就是当时住过无数红军的山洞。同志们住在山上不能煮饭，我们就把茶水饭菜送到山上，送东西得伪装上山打柴，把东西装在箩筐里，上面盖上柴禾，有时挎上竹篮，东西放在里面装做上山采蘑菇。

岗头村遭受敌人四次大清剿，先后有两位游击队员被捕，一位革命群众被捕。全村遭受大洗劫，人们都搬到山里住，在山里不敢煮饭吃，只得一连几天饿肚子，小孩饿得连哭也不敢让哭，遇上冬天还要受冻。敌人撤走后，要派人先回村探消息，回到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被敌人抢劫一空。

一九三四年正月，何传练等三人到我村，由于叛徒陈朝助叛变带前岐伪民团一百多人来抓，当场何传练等同志被捕，并抓去群众曾碧湛等七人。在敌搜查时，曾彤弓同志的母亲为了不使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机智地将文件袋投入粪桶中，自己坐在粪桶上装做小解，保护了党的机密文件。曾彤弓同志钻到一个破房子楼上用大箩筐罩上，逃过敌人搜查。

九位同志和群众被抓到前岐后，进行灌水、灌辣椒水，吊打，坐老虎凳等刑罚。何传练等同志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是共产党，要杀要毙随你便，但这七个是老百姓，与他们无关。在敌人严刑下，没暴露党的半点机密，用生命来保护革命老区和群众，在前岐英勇牺牲。后来，七位群众关押在前岐，敌人提出

让曾彤弓去前岐对换，曾彤弓同志为了救出七位群众，毅然决定去前岐对换，经请示了党组织。组织上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对换，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贿赂敌人头子，贿赂土豪劣绅，花去白银几百元，才保释了七位群众。

有一次，曾彤弓、曾碧俭二位同志被反动搜剿队长林德佑抓去，党为了拯救这二位同志，郑衍宗同志立即写信给林德佑的亲家郑宗妹：不放二曾，灭你全家。迫使郑宗妹连夜赶到桥亭敌人所在地向林保释彤弓、碧俭二同志。

敌人几次要把我们房子烧掉，我们党组织就发出信件，派人秘密投到反动头子家中，扬言如果烧掉我们的房子，就把他们房子烧光，致使敌人不敢放火烧房，保护了老区人民的房产。

一九三五年，党派陈勉良同志在枫树坪建立联络站，开了一个豆腐房，明里做豆腐，暗里做革命工作，联络站情况被前岐联甲头子曾仁秋所觉察，一九三六年正月初二，联甲头子曾仁秋随带联甲兵到枫树坪来抓陈勉良同志。为了保护林桂程同志安全脱险，陈勉良同志先带桂程同志藏在门后的柴禾堆里，敌人正在抓住群众拷问，他却昂首挺胸，面对残暴的敌人说：我在这里，不许伤害百姓。敌人抓了勉良同志，随即离开枫树坪，桂程同志因此而脱险。

勉良同志被抓到前岐受尽严刑，敌人将铜片放在炉子里烧红，放在勉良同志身上烙，勉良同志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没透露党的半点秘密。勉良同志为了保护联络站，没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说自己是做豆腐的老百姓，并且说曾仁秋是为了报私仇。通过多方活动，把勉良同志从狱中保释，规定保释后每十天要去给敌人见一次面，但勉良出狱第二天就投入了革命队伍，来

到我们岗头村。

后来，敌人发现勉良继续活动，随将其父抓去顶替作为人质，其父在狱中也受尽折磨，遍身生了狱疮而死亡。

一九四九年，解放大军南下解放我们家乡，我们村组织了几十个民兵配合解放军去解放前岐、福鼎。妇女烧茶倒水，在路上接亲人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在我民兵配合下，一举解放了福鼎县，击毙伪搜剿队长林德佑这个杀人魔王，活抓了四十多个搜剿队员。岗头村人民在浙南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一页。

忆林夫兼记浙南往事

连 珍

我是一九三七年冬在闽浙边革命根据地认识林夫的。那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平津沦陷，我从北平逃出，经过一番挫折，辗转南归，十月初回到温州。当时，闽浙边红军已与国民党谈判成功，在温州设立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吴毓同志(已牺牲)任办事处主任。吴毓是我初中时代的老朋友，我到温州，他就到旅馆来看我，久别重逢，喜出望外。他告诉我，闽浙边根据地准备办一个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要“招兵买马”，希望我先回我的家乡乐清参加群众工作，然后再到根据地去。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同年底，他便约我一同带着七十多个青年学生，浩浩荡荡地从温州进入根据地的浙江平阳北港山门。我就是在这里见到林夫的。他是先我到达，还是在我之后才来的，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象见到久别的老朋友那样，“一见如故”。原来我在乐清从事救亡工作时，就从野夫口中听到过林夫的名字，知道他是木刻家，还善篆刻，绘画颇有功夫。野夫还指给我看过一张照片中的林夫，那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与几位木刻青年的合影。在照片中，林夫那种全神贯注地倾听鲁迅先生谈话的神态，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初次见面，

我对他却毫无陌生感觉的原因。

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就办在北港山门，处在群山环抱之中。校舍原先是一间小学的旧房子。林夫和我，同干校其他干部、教员一起，住在这房子左边的木楼上，大家都打地铺。学员二百余人，大都是来自温州在学的中学生，也有从处州、台州和别处来的。红军闽浙军区司令员兼中共闽浙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粟裕同志任干校校长，何畏（黄先河）同志任副校长，干校开设四门课程：哲学、经济学、游击战术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一课是粟裕同志亲自讲授的，每一堂我都去听。他现身说法，讲得那样充实生动，战斗故事多，引人入胜，课堂里肃静无声，时而又爆发出一阵欢笑。我还常常看见他给红军战士上军事操练课，也老是使我一看就忘记了走。在干校开学典礼上，中共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同志讲了话。当主持大会的何畏副校长把这位被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成“青面獠牙”、“飞檐走壁”的传奇人物介绍给学员群众的时候，全场青年以惊异的眼光和热烈的掌声来表达他们对这位共产党人的崇敬。

我在干校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校内和街头的墙报。我不懂美术，常常请林夫画报头或宣传画。因此，同他接触比较多。但我对他的过去知道不多，因为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日很少谈到自己。林夫原名林裕，浙江平阳江南人，家境贫寒，抗战前毕业于上海美专，求学期间生活艰苦，后来专心学习木刻，作品参加过“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我认识他那年，他大约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长得还算结实，但曾因颈淋巴结核动过手术，影响发声，讲话有点沙哑。他有一颗善良而炽热的心，富于正义感，对人诚挚、厚朴，使人一接触就觉得他可亲和可信。学

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带着东南局的指示来到闽浙边根据地。不久，粟裕同志率领红军游击总队开赴皖南，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会师，改编为新四军。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随即结束。小部分学员随军出发，大多数学员连同干校干部留下来，由省委分配到浙江公开和秘密两条战线开展新区的工作。同时，新四军在浙江设立三个公开机构，即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在丽水，吴毓同志调任办事处主任；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改名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仍在温州城内九柏园头十七号，周饮冰同志（已牺牲）任通讯处主任；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在平阳北港水头，黄耕夫同志任留守处主任。此外，还组织了一个新四军流动宣传队，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区流动宣传，由我和林夫同志带队。

宣传队由二十余人组成，其中除了四个中年农民和一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老孙同志之外，都是救亡干校毕业学员。这是一群具有民族觉悟、富于理想、憧憬共产主义的小青年，有男有女，都是那样纯洁、热情、活泼、朝气蓬勃。全队只有林夫和我两个共产党员。我新入党，未见世面，未经风雨。林夫也是知识分子，一派书生气。党把这样一支娇嫩的队伍，交给我们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知识分子，打着新四军的旗号，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浙南城乡巡回宣传抗日救亡，我和林夫对党的这种信任，既感到兴奋，又怕完成不了任务。毕竟初生之犊不怕虎，那天晚上，当党组织向我们交代任务的时候，我们两人都毫不踌躇，就毅然接受了。

经过一番学习和准备，清明前后，我们的宣传队高举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离开山门，向浙南平阳、泰顺、瑞安三县的城乡出发。我们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也遭到了一些顽固的国民党党棍、县长，地主、豪绅的刁难和破坏。我们紧紧依靠当地贫苦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严防反动派的捣乱和暗算，队员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各人背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爬山涉水，穿乡过县，抗战的歌声响彻浙南山区。白天，我们举行各种座谈会，三三两两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发传单，刷标语；晚上，我们点起煤气灯，召开群众大会，在人山人海之中，痛陈民族危机，讲解抗战形势，振臂呼吁团结抗日，枪口对外，然后演出一些短小的文艺节目。平阳南部许多地方是讲福建话的，林夫是本地人，会讲几种方言。因为他平时声音沙哑，说话吃力，我有意让他少做些口头宣传工作，而每到这些方言地区，他即自告奋勇，要求和大家一同出去。每当我看到他在进行家庭访问时，一反平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向群众滔滔不绝地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有时甚至声嘶力竭，我心中不禁感到佩服。我从小拘谨，不善交际，而林夫总是把对外打交道以及主持座谈会、群众大会之类的事情推给我，对我实在是很好的锻炼，而他自己则把全队的内务包揽下来，不怕麻烦琐碎，工作勤勤恳恳，吃苦耐劳。队里挑水、劈柴、做饭、打扫卫生以至昼夜安全保卫等等，都有分工和轮值，哪一样如果忙不过来，他就主动去帮助。一有空，他便抢时间拿起画笔，制作各种宣传画。他平易近人，队员们个个喜欢他，常常围着他，要他讲讲与鲁迅先生接触的情景。他与我总是有商有量，互相尊重，情同手足。每天早餐之前或夜晚队员们睡下之后，我们两人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就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和当天的工作安排等等，

细细交换意见。遇到意见有分歧的时候，决不轻易放过，一定反复讨论，作出一致同意的决定，而从未发生过争吵。我们常常互相提醒，彼此都缺乏党工作的锻炼，如今责任重大，只有多多商量，才能少出差错。每当我提到，我们所带的是十五、六岁小青年，所到的是国民党统治区，人地生疏，而且三天、五天换一个地方，住的又是祠堂庙宇，门窗破缺，一定要严防坏人暗算，特别要注意保护女队员的安全，他总是连连点头，继而彼此互投信任的眼光。到平阳县城的第二天下午，县长徐用约我们全体队员到伪县政府开会，提出不让我们在全县境内继续流动宣传的无理要求。我们针锋相对，当场据理严词驳斥，弄得他哑口无言，自讨没趣。散会后，林夫赶紧带队回住地，准备晚上照样召开群众大会，我则去找县抗敌后援会一位倾向进步的负责人，请他出面多发动一些进步青年帮助我们维持当晚大会场的秩序。那天晚上，林夫自始至终周旋于那一群热情的进步青年之中，大会开得很成功。又一次，经过瑞安县城的时候，国民党瑞安县党部派了几个青年“保护”我们，我们和他们多次发生争辩。在这种场合，林夫比我有修养，他耐心地对那几个年轻人讲道理，晓以大义，启发他们的爱国心，结果他们跟了我们一站，就偷偷地跑掉了。一天晚上，我们在平阳县一个乡演出，有几个坏蛋出来捣乱，用石子打坏了会场上的煤气灯，我们当即严厉警告捣乱者，要求全场群众自觉维持秩序，随即把后台的煤气灯拿到前台，继续演出。散场之后，我们严密布置保卫工作。那一夜，林夫披着棉大衣，一手拿电筒，一手拿短棍，同几个农民同志在住地周围巡逻到天亮。还有一次，我们初到一个乡，住地的祠堂一扇门来不及修理，不能闩。当夜，我们布置当地两位农民党员睡在那扇

门内。夜深，我起身巡查，发现林夫披着棉大衣，靠着那扇门坐在地上打盹。我要和他换班，他怎么也不肯，说我第二天上午要同乡保长开座谈会，不可熬夜，说罢，把我一直推到我们打铺睡觉的戏台上。

国民党反动派最初看不起我们这支宣传队，说这些小娃娃成不了什么气候。出乎他们的所料，娃娃们把浙南的山山水水闹得沸腾起来了，政治影响很大，这就吓破了反动派的胆。伪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气急败坏地向我新四军驻浙办事处交涉，要求我们宣传队停止在国统区活动。我省委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在我们流动宣传了两个多月、将向永嘉进发的时候，派人送来一封信，指示我们把队伍带到后方留守处，宣布解散。

我们回到留守处，随即总结工作。留守处主任黄耕夫同志宣布省委对队员们的工作安排。平阳人都留在本县，林夫参加中共平阳县委工作，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我带着其他同志到温州去。

我到温州的第二天上午，就向刘英同志作了关于宣传队工作的汇报。之后，遵照组织指示，我留在温州工作。从此，我的工作从公开转入地下，开始新的学习，接受新的锻炼和考验，常常往来于瓯江之滨与雁荡山麓之间。不料同年冬天，由于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使我和林夫失掉了组织关系。

为了寻找组织关系，一九三九年二月，我从温州转到闽浙边老根据地附近的平阳鳌江，在一个进步的小型报纸《平报》担任编辑；林夫从平阳转到丽水，在伪浙江省建设厅属下的一个据说有进步倾向的“合作工作队”任队员。同年五月，林夫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要我转到丽水去工作。信中说，国民党军队某部在丽水新办的小型报纸《诚报》，有个编辑是《平报》的前社长，要辞

职，答应介绍我去接替。又说，该报是浙东印刷厂承印的，厂经理是党的同路人，我们都相识。还说，野夫新近从乐清到了丽水，没有职业，住宿也成问题，我去可以和我住在一起，等等。经过考虑，我就辞去《平报》的职务，改名转到丽水。

到了丽水，我在城里租了两间房子，一间给野夫，一间自己住。野夫正在写他的《木刻手册》，同时筹备成立木刻用品供应社。林夫差不多每天傍晚都来看我们，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我们谈得多的是如何利用《诚报》这个国民党军队报纸的园地和浙东印刷厂的印刷条件，为党多做点工作。我们又把原新四军宣传队队员鲁林杰（林斤澜）介绍到印刷厂当校对；同时设法与其他失散的队员取得联系。林夫在此期间还继续从事木刻创作，编印了一本《五月》纪念木刻集。

我在丽水呆了将近两个月。当时，浙江的形势不容许我和林夫这样继续呆下去。八月十三日，敌机轰炸丽水，浙东印刷厂的排字房被炸，《诚报》因此停刊。我乘机辞职，与林夫商量一同离开浙江，设法去延安。考虑到两人同行不便，决定我先走，在桂林一带等他前来会合。九月中，我到了广西宜山，寄住在浙江大学。不久接到林夫来信，说他已辞职，先回家一转，弄点路费，就来宜山。我等着他的到来，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了，连个消息也没有。

原来，林夫从家里出来路过鳌江，投宿《平报》社，不料当夜国民党反动派派兵查封《平报》，报纸编辑和林夫一齐被捕了。（据当年《平报》排字工人、现上海新华书店党委书记何平同志最近追忆，当时被捕只有林夫同志一人，该报编辑黄藻如同志后来也被国民党平阳县党部软禁起来。）林夫被捕后，立即被

解到金华。这是后来报社的一个工作人员写信告诉浙大我的一个同乡的。

我还听林斤澜说过，林夫在这段时间往来于丽水、平阳之间，经过温州便住在低级的平阳客栈，约失散的同志见面。但见到却又没有多少话可说，往往相对无言。大家的心境都不好。林夫正在筹措去延安的旅费，身上也没有几个钱，却非常关心其他同志的困难。他曾把金戒指默默地塞给两位同志，一句话也没有。

九四七年暑假，我在从上海到温州的轮船上，碰到野夫。他告诉我，林夫后来又被送到上饶集中营，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寇流窜上饶时，集中营迁往福建，途经赤石，被囚的革命同志发起暴动，反动派开枪镇压。林夫也参加了暴动，但因病跑不快，中弹牺牲。

林夫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他的死是壮烈的。

黄新波同志在《不逝的记忆》（见广州鲁迅纪念馆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鲁迅研究资料选编》）中说：“林夫同志后来参加新四军，牺牲在战场上”。这是传闻失实。林夫同志不是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而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枪杀。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林夫同志，一个面朝着墙壁上一幅创作中的水彩宣传画，站在离画几步的地方，右手拿着画笔，左手插在旧短棉大衣口袋里的厚朴、深沉、热情的青年画家在端详自己的作品的形象，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后记〕解放后，我常常想起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的我青年时代的战友林夫同志，几次执笔要写点纪念文字，却又思绪

万千，不知从何说起，终于作罢。一年多前，木刻家黄新波同志为了搜集他解放前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到中山大学图书馆找我。在谈话中，我告诉他，野夫和林夫是我的老朋友；解放初，野夫还曾来信要介绍我去看他，想不到直到今天才在这样的机缘下见面。接着，他谈起，某地鲁迅纪念馆要他提供林夫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情况，但他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谁了解。我说对林夫这段经历，我倒知道一些，因为我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同他一起战斗过。于是，新波同志就叫我写个材料，我也答应了，但又迟迟没有动笔，而心里总象是负了债似的牵挂着。最近，又有一位老朋友告诉我，北京鲁迅研究室因研究工作需要，辗转托他要我写点有关林夫的材料。至此，我感到这笔心头的债已非还不可了。但是写起来，确实也有些困难，因为时隔四十多年，许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于广州

我在江南、浙江工作接触到的

陈 毅 同 志

何 克 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曾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耳闻目睹他的光辉业绩，亲身感受到他的高贵品质，他给了我许多指导、帮助和教诲，至今犹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

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是在一九三八年深秋。

一九三七年六月，地下党组织派我到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工作，宣传党在抗日战争新时期的总政策、总方针，争取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发展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我们在江阴西石桥争取到梅光迪部约一个连，澄锡虞地区争取朱松寿部一个连，组织上通知我尽早与新四军取得联系。我把上海地下党动员来的青年工人和学生组织起来，办了一个训练班，也有一个连的规模，初步形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六月，陈毅同志率新四军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十月，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同志率领段焕竞营向东挺进澄西，来到距我部不远的地方。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即亲自找到王必成和段焕竞同志，

向他们介绍了开展工作情况和宁沪线一带地方上的情况。当时国民党地方部队张少华部只扰民不抗日，但他的下属陈守根，经我们争取做工作后，表示愿意抗日，已派人来我训练班学习。张少华得知后，将陈的部队调到长江以北企图解决。我们便先发制人在江阴申港，打掉了张的司令部。这一仗老二团这个营是主力，我们是配合他们的。由于我们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结果我们的缴获最大，壮大了这支有三个连队的我们党自己的地方武装力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上海地下党交给我和新四军党组织接上关系的问题。对此，王必成同志表示只有直接找到陈毅同志才能解决。我便带了二个警卫员到茅山地区找到了陈毅同志。交谈了几句后，陈毅同志发现我也是四川口音，就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四川人，他问四川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峨嵋县人。他问我：

“有个耿士毅，原名耿道弘，你晓得吗？”我说耿是我小学同学。陈毅同志说：“他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是个国家主义派，不过人还是好的。”他又讲到曾在成都读甲种工业学校，而我也曾在成都高师附中学过工科，这样谈了几句话，就使我感到非常亲切融洽。我向他汇报了工作，他很高兴地说：“你搞得好嘛，你把队伍带过来，我帮你整编！”然后安排我们休息，对我说：

“现在比较困难，委屈你们睡‘金丝被’吧。”所谓金丝被就是铺一捆稻草，盖一捆稻草。我原来以为，到了正规部队，装备和各方面条件要好一些，没想到招待我们睡了“金丝被”。那时已是深秋时令，金风萧瑟，我同两位警卫员缩成一团，相互偎依，夜里被冻醒好几次。尤其是到了黎明时分，寒气逼人，更加难眠。我们便在打谷场上跑步，使身体发热，最后连“金丝被”也付诸一炬，烤火取暖。但是和主力联系上了，又接上了党的关

系，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的心情十分畅快，浑身有一股暖流，也就觉不到苦了。以后又听说陈毅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渡过了十分艰难的岁月，觉得这更是微不足道了。

“江 抗” 的 成 立

返回部队后，经过动员，我们将队伍拉到茅山进行整编。编了三个连队，另编侦察排和通讯班，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党的支部，所有部队骨干都从原训练班人员中抽调补充。成立了司令部，梅光迪担任部队司令员，我任副职，其实就是政委。陈毅同志给我们每个连队派了一个政治指导员，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并派徐绪奎同志担任参谋长，在讨论如何命名这支部队时，我提出是否用新四军番号，成为正规部队。陈毅同志说：“这就不必了，新四军虽然是正规部队，但是一切补给都受国民党限制，特别是活动地区受限制更大，我们尚且要千方百计打破顽固派限制，你们何必要用绳索把自己捆绑起来呢？还是放开手脚干的好！”我听后，深感陈毅同志站得高、看得远。我记起党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就提出是否可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称。陈毅同志说：“这个名字好！就按你说的做吧。你们部队就叫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为什么叫第三路军呢？原来陈毅同志此时已为今后部队的发展预做了文章。

部队整编后，军部来电要我们去三战区谈判，争取合法地位。我心里认为没个啥谈头，不会有什么结果。原定由陈毅同志与我同去，后来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来告诉我，陈毅同志不去了，他和我去。到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处洽谈后，果

然不出所料，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空手回到茅山。

军民游击满南华

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给日寇很大震动。敌人加强兵力，分路合击，对茅山根据地进行扫荡。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一部从延陵向我出击，陈毅同志亲自布置，指挥我部与老二团配合，在延陵镇附近伏击敌人。

这次战斗是由老二团团长江正坤同志指挥的。当我要到前线部队去的时候，陈毅同志要我告诉张正坤同志，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要打，可以把部队撤出。陈老总指挥作战，就是这样讲民主，给下面指挥员以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张正坤同志作战决心非常坚决，我们部队埋伏在正面，老二团从侧后两路出击歼敌九十多名，生俘鬼子一名，给了日寇一个沉重打击。

一九三九年六月，陈毅同志派叶飞同志率老六团东进，与我部在武进以南太湖地区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担任总指挥，叶飞与我担任副总指挥。党内还由上海地下党东路特委书记林枫同志参加，组成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一切工作。我们沿宁沪线东进，直指上海附近青浦、浦东一带。在上海地下党所属各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不断取得胜利，如夜袭虹桥机场，炸毁敌机四架；解决了浦东许雷声部，加强了顾复生部；叶飞同志率一部在地方部队吕炳奎同志配合下，在嘉定解决了国民党特务部队邓金烈部，缴获轻重机枪几十挺；我部与叶飞部在嘉定会合后又转回澄锡虞地区，与前来扫荡的日寇在黄土塘激战，歼敌近百名，老六团副团长吴焜同志在

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我军另一部夜袭浒墅关车站，全歼敌军五十名，伪军一个中队。……一系列的胜利，震撼了宁沪线上的敌伪，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我“江抗”部队也发展到五路之众。日寇对我分路合击，兵力不足，便唆使顽固派国民党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向我进攻。我们在澄东顾山与忠义救国军袁亚承部一战未能解决战斗，伤亡较大，老六团政治处主任刘飞同志负伤。陈毅同志闻讯亲率老二团一个营由刘培善同志带领陪同前来东路接应。部队撤至江阴无锡公路以西地区，开了一个会。陈毅同志主持，指定叶飞同志做一个小时发言，我做半个小时发言，其他同志十分钟发言。最后陈毅同志讲话。他风趣地说：“战争时期，讲话从简，你们‘八路军诸侯’来此会聚，部队发展了，取得了很大胜利，达到了人、枪、款目的。但部队不巩固，需要整顿。”陈毅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人、枪、款”的口号，他以后又多次说明：有人就有枪，有枪就有款。会议后，部队撤至长江江中的扬中县集训。陈毅同志夜过江阴履国防废垒时赋诗一首：“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客过风尖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高度概括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

从扬中回茅山地区途中，陈老总和我们同行。有几件小事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有一次在途中吃饭，管理员问我是否可以买只鸡吃，我看大家连续几天行军都很疲劳，就答应了。到吃饭时，陈毅同志看到桌上有鸡，马上问是谁个叫买的？我见他有责备之意，就承担下责任，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可是这件事给我的思想一个震动，老总是多么严格地要求自己啊！我和陈总、刘炎同志加上警卫员，一行不到二十人，经常在黑夜靠近敌人据点穿插

在封锁线上。有一夜通过封锁线后又走了一程，大家都很疲劳，决定宿营在一个小村庄上。有位同志可能是看房子用手电筒照了几下，陈毅同志发现了，立即集合部队，继续前进，又走出好远才停下来宿营。在路上大家都埋怨那位惹事的同志，再宿营时就没有人敢再打手电筒了。经过多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磨炼，老总的警惕性很高，尽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损失。几天的行军，快要到达根据地了，有一天晚上，老总看大家确实劳累，就主动决定在一个村庄宿营。警卫员在一家地方绅士的大门外为陈总、我和刘炎同志三人搭了个通铺。天亮了，那位绅士开门看见陈老总睡在他的大门外，大吃一惊，急忙把我们请到他的客厅，给每人立即送上一碗滚烫的荷包蛋。陈毅同志在茅山地区上层人士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声望很高。

陈老总初向江南敌后进军时，一只手拉着管文蔚，鼓励他、帮助他，派人到他部队去加强领导，建立起一支挺进纵队；另一只手就是拉着我们的部队——“江抗”。“江抗”主要是上海地下党直接派人发展起来的地方武装。为加强和发展这两支部队，陈老总是付出了相当的心血的。陈毅同志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但我们当时思想水平还很低，政策水平也不高，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掌握不够，遇到问题还是处理不好。我虽然是军人，但并没有学过游击战争。对于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经过武装斗争的实践，生死线上的摸索、探求，陈毅同志的言传身教，才把书本上的理论与实际斗争统一起来，学会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政治上军事上与敌伪顽作三角斗争，“江抗”广大指挥员、战斗员在江南敌后这个舞台

上，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每念及此，我们怎能不无比怀念这位坚强、卓越、老练、成熟的老领导呢？

派 来 浙 江

一九四一年反清乡斗争后，我来到苏北盐阜区黄士集华中党校学习。陈老总很少到党校来，偶然一次，听说他痔疮发了，行动不方便。一天他突然派人来找我，要我到他那里去。我来到老总的住所，他躺在床上，告诉我办公桌上有一个抄电本，要我从某页看到某页止。我按他的指示，重复地读了二遍。这个抄电本上全是他与毛主席来往电报。毛主席的来电下面都是主席个人署名，这是极为负责的态度。我看的那份电报是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和毛主席的批复。当时日寇正在调兵遣将，企图打通浙赣线，而国民党方面则仍然是不抵抗主义，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在浙江敌后开辟一个战场，随着敌人的进攻，我们就有可能把过去在江西、福建的老根据地恢复起来，把闽、浙、赣联成一片。这在战略上讲是很重要的。当时浙江党省委书记刘英同志被国民党逮捕牺牲了，所以急需加强浙江省党的工作，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四明山、会稽山一直向天台山、括苍山脉发展。陈毅同志在报告中详尽地分析了敌、我、顽各方面的形势，决定要加强江南敌后工作，在组织上，建议谭启龙同志和我到浙东建立浙东区党委，由谭任书记。毛主席批示完全同意了陈老总的意见。待我看完两遍后，陈毅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他说：“你就准备走，除从这里带去的干部外，你到苏中请粟裕同志给你配备干部和机要报务人员。”过了

二天，曾山同志请我吃饭，他告诉我：“陈老总身体不好，不能来为你饯行，由我代行。”我深深体会到这不单纯是陈总个人的意见，而且是华东局和新四军党委的共同意见，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我一方面感到党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担心挑不起这副重担。但想到有党中央、毛主席和陈老总的领导，派去的干部又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很多是浙江本地人，也相信浙江人民是要抗日、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就满怀信心地到浙江来了。

用延安整风精神处理党内矛盾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切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要达到同广大的工农干部的真诚团结是很不容易的。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陈毅同志了解我，在思想上给了我严肃的、真切的帮助，对于他的教诲，我是铭记在心的。

初来浙江不久，我和一些同志对于如何开展浙江工作，产生了一些分歧。陈毅同志得知后，马上给我发了一个限立刻到的电报，电报的原文和我的复电我一直保存着。电报原文如下：“你在浙东负重要工作，军人宜特别抑制自己的个性，了解你的特点，虚心向人请教，如有人不服你，不必强人服从，宜在长期斗争中做实际工作来改变别人的观点，打破别人与你相互间许多成见。我们的一些老干部是很好的，但如应付不当，亦难得配合工作。”

我复电：“个人缺点甚多，正从工作中锻炼修养，所指各

点，当从工作中来回答上级的期望，使不损害党的工作。”

我把陈毅同志的这份电报，看做是给我来浙江工作的基石。我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方针，尊重谭启龙同志的领导，学习谭启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优点，多看他们的长处，经常注意克服自己存在的个性和弱点，以利于党的事业。本着陈毅同志指示的精神，处理同志间关系，开展工作，我们在浙东坚持了艰苦的抗战，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发展了武装力量，成为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点成绩，这是与陈老总的教导分不开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浙东纵队奉命北撤被编为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三师向山东挺进。一九四六年陈老总从延安来到山东指挥华东野战军。一次他叫我到临沂去汇报工作。我才又见到我所敬慕信赖的老领导，心情十分激动，把工作和思想情况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整整讲了三个下午。老总耐心地听了三个下午，最后他对我说：“克希同志，你的谈话，我是完全相信的。我把我在延安整风的精神和我的收获告诉你：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是内因论者，很多问题要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克服自己存在的缺点，使党更团结，才能更有利于革命。”陈老总的话，虽然只有这么短短几句，但我听后，出了一身冷汗。我马上意识到，有些问题我对别人提得多了，对自己方面想得少了，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后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就想起陈老总的这些教诲，多考虑自己的缺点、弱点，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多想别人的长处、优点，心情就舒畅了，同志关系也就融洽多了。

孟 良 崮 战 役

陈毅同志到华东战场后，粟裕同志所率二、四、六纵队逐步向山东集结，山东地方武装也逐步发展扩大，先后成立了三、八、十等纵队，仗也越打越大。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大量歼敌，痛快淋漓，打破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老蒋输红了眼，孤注一掷，把它的“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也搬出来，加上桂系第七军、二十五军黄伯韬等部队，齐头并进，寻我主力决战。开始我们还只想歼敌桂系第七军或敌二十五军，但七十四师依仗其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突出冒进坦埠地区。陈老总抓住战机，当机立断，下决心打掉它。这样便产生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

这是一个重大战役，我们纵队是我去接受任务的。在一个山谷里，除陈老总外，还有粟裕、陈士渠同志召集各纵队领导布置作战任务。大家到齐后，粟裕同志摆开地图，介绍了敌军分布情况和我军的决心和部署，最后陈毅同志讲话，他指出：我们在战略上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迫使敌人将其战略决策改为重点进攻。一个重点是指向延安，那里由毛主席亲自对付他们，敌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另一重点就是我们山东、苏北地区，已经给了敌人多次重大打击。孟良崮这一仗至关重要，是改变敌我形势关键性的一仗。七十四师是敌人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的王牌军，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顽敌虽众，但各自为战，矛盾重重，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彻底歼灭敌人是完全可能的。歼灭了顽敌七十四师，全局就将为之改观。全国的战局就

会起重大变化。各个纵队都要动员全体指战员不惜任何代价来取得这一仗的彻底胜利。老总的豪言壮语，是动员令、是进军号，鼓舞着各纵队来接受任务的领导同志。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摩拳擦掌，恰如利箭在强弓之弦，一触即发。我纵的任务是解决天王山两个主峰，打掉敌人的牙齿，并钻入敌人的心脏，最后致敌于死命。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正要上马赶回部队，老总把我叫住说：“克希同志，这次是一场恶战，你们一纵队打仗一直是过得硬的，这个部队我是信得过的。这次作战除了你们原有的三个师外，还有皮定钧同志的独立师也归你们指挥，你们虽然任务重些，但你们兵力也多一个师，要坚决完成任务。有把握吗？”我想“打掉敌人牙齿，钻进敌人心脏”，任务的确不简单，但也很光荣，就坚定地回答：“一定完成任务！”

我回到部队，叶飞、张翼翔同志马上召集已等候多时的各师领导同志听我传达任务。经过研究，叶飞同志和我分工，他率一师和三师去消灭天王山两个主峰上的敌军，拔掉敌人牙齿。谭启龙同志与我率独立师、第二师钻入敌人心脏致敌死命。独立师皮定钧部原系中原刘邓部队，突围出来归我一纵指挥，部队老战士多，作战很有经验。部队提前吃过晚饭，即分头出击，天黑我率独立师和二师于坦埠侧翼两个山峰之间插入敌人纵深，一夜急行军，在敌人新筑简易碉堡工事之间穿插。天明时分完成了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在小曹庄构筑工事，建立了指挥阵地。敌人发觉被包围，便组织对我反击。一天中，独立师阵地七次易手，最后子弹都几乎打光，就用石头把敌人压在山下，巩固了我军防御阵地。小曹庄则四面呼警，我们以攻为守，主动出击，终于守住了这个指挥阵地。我们包围着七十四师，而敌人二十五军黄伯韬部

和六十五军又把我们包围起来，包围、反包围，一层套一层。七十四师不断向老蒋告急，老蒋则拼命督促其他各军前进，直杀得炮火纷飞，昏天黑地。以后知道六纵队拉住敌二十五军，帮了我们大忙。晚上，叶司令及一师师长廖政国同志来到小曹庄驻地，原先被阻在隘口的我部二师也全部通过敌碉堡间隙，集结在小曹庄。我们便进一步研究了登上孟良崮顶峰、彻底歼灭敌人的部署。趁着夜色，各路大军成纵队向孟良崮顶挺进，有的从小路，有的简直是攀藤附葛沿着悬岩绝壁前进，真是把人的积极性，部队的积极性最高度地调动起来了。叶、谭都到前线去了，黄源同志随我留在前线指挥所保持与陈总、粟裕同志的联系，几乎每十分钟或一刻钟，陈或粟首长都要来一次电话催要战报。几夜来我们何曾合过眼，只有争取在电话旁打个盹是天大的快事。当时的陈总、粟裕同志他们也何曾睡过觉呢？那个时候，能够睡一觉就真成了活神仙了。几天激战，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击毙顽敌整编师长张灵甫，全歼王牌军七十四师。这一喜讯振奋全军，那晚，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这次作战经验。我正好坐在陈总旁边，见他手里拿着一支笔在写。我问他写什么？他微笑着说：“我在写诗。”这就是那首豪迈的《孟良崮战役》之诗：“孟良崮上鬼神嚎，七十四师无处逃，信号点点星光灿，照明处处火如潮……”

我们的元帅、诗人，雄才大略，用战火锤炼他的诗篇，他的诗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真实写照，是无比丰富生动的中国革命的结晶。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涉外事件

顾 春 林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几起涉外事件，都发生在一九四五年春。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苏联红军直逼柏林城下，希特勒正在作绝望的垂死挣扎。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已转入战略反攻，取得重大胜利。我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日战争，处在最后胜利前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亦已度过最艰苦困难的阶段，日益巩固扩大。一月二十一日，在梁弄召开了浙东各界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中共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代表区党委提出的浙东地区施政纲领，通过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静（何克希）同志所作三年军事工作报告以及浙东行政公署主席连柏生同志所作行政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以谭启龙、郭静唐同志为正副议长的参议会，准备迎接新的胜利，打开新的局面。新四军苏浙军区已建立，粟裕同志正挥师挺进浙西，计划与浙东抗日根据地打成一片。

上述整个形势，就是发生几起涉外事件的背景。我当时担任纵队司令部秘书，协助政治委员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处理些日常工作，有机会接触这些事件，因为之记。

(一)



美国飞行员托勒特

这里是一张美国飞行员的照片。(见左)

在原照片的背面，我曾写下如下几行字，现在墨水褪色了，但仍依稀可辨，照录如下：

“美飞机师托勒特，阿肯萨斯州人，年二十一岁，隶美国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部下。一九四四年十月，横渡大西洋经印度来华，纵横飞驰于中国战场，予广州、香港、汉口、安庆、

芜湖、南京等处敌寇以重大杀伤。不幸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江西遂川驾机飞袭上海时，为敌寇高射炮击落。渠乘降落伞下降时，为我淞沪支队救获，面部四肢为火灼伤甚重，经送至浙东梁弄司令部医治，旋即健复如常。相处五十日，于三月二十二日护送其归队。此照摄于梁弄新年雪景中，留此作为永久纪念。三月二十二日。”

另外根据我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而复得的简略的日记，关于这个美国飞行员有以下几段记载：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

美飞机师由浦东护送至梁弄。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日

今日旧历年初一。昨晚又大雪，玉树琼枝，风景甚佳。晨起与何司令出外踏雪。民众来拜年者极多。晚上开晚会，欢迎盟国飞机师托勒特。多年来未曾有过如此快乐平安的新年了。

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

上午谭政委在全军排以上干部会议上报告：新形势与新任务，作进一步深入动员。下午在大操场开军人大会，庆祝苏浙军区成立，欢迎盟国飞机师及金萧支队前来会合。会上何司令、谭政委进行更广泛动员，并有盟国飞机师演说。晚社教队演出：“扩大解放区。”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盟国飞机师托勒特南行，拟护送其返重庆。天雨，欢送者甚众。”

淞沪支队是浙东抗日游击纵队领导下的在上海浦东地区活动的部队。他们在浦东救获美飞行员的具体情形，我不清楚。二月一日，一队武装人员把飞行员送到梁弄时，只见他面部、四肢烧伤甚重，躺在担架上，行动很困难。当时纵队行政机关驻在梁弄。司令部位在梁弄东头一户姓黄的地主家，我们即把他安置在单独一间房子里，实际上和谭、何首长住在同一个四合院。我们以上宾之礼待他。天冷，给他烧火盆，医务人员每天来给他治疗，伙房给他做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好的饭菜，还派人到余姚、宁波采办面包、罐头、咖啡、炼乳等东西给他吃，还找了一本英语小说给他消遣。由于他年轻力壮，我们医疗及时，生活调理得宜，健复很快。日常口语翻译，由一位名叫雷震的同志担任，也只能勉

强凑合几句。

查阅我的日记，纵队行政机关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自袁马移至梁弄，至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离开梁弄移至上虞县城附近的朗桥朝西屋，在梁弄共住了六个月又二十天。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中最小的一个，处在强大的敌、伪、顽军包围之下居然能在四明山区一个小市镇上，一连住得这么长久，这件事本身，就可以充分说明根据地的巩固。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梁弄山静村闲，根据地群众情绪很高。美国飞行员到达后，我们对部队和群众进行了必要的时事教育和革命人道主义教育。飞行员在一定范围内的活动是相当自由的。

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处理问题，由谭、何首长发电报请示新四军军部。后得复电，交给国民党地方政府接收，转送美国驻华机构，手续必须完备，以防不测。我们当即通过统战关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嵊县或新昌）联系，商定交接时间、地点，双方备好交接证件，办理交接。我方带了飞行员前往办理交接（地点在梁弄至嵊县山区途中某地）的同志，我已想不起来。他们完成交接任务后，取回交接证件，并在交接现场拍了一张双方人员包括美国飞行员在内的照片。

托勒特的英文名字如何拼写，因我不懂英文没有记下来。此人是一个空军尉官，今年不过五十六岁，如无意外，应当还活在人间。

（二）

美国飞行员送走不久，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我日记上有如

下记载：

“了解‘警大’情况，连续三天。

美大使馆新闻处东南分处派周璧先生来此。”

前一句记的是我根据何司令的指示，与政治部组织科长徐放同志和司令部作战科长周毅同志（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去警卫大队工作。

后一句记的是什么事呢？

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派周璧先生偕夫人彭传玺女士和刘文宪（刘金）同志到梁弄找到纵队司令部后，我奉谭、何首长之命，接待他们。对他们在梁弄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对他们在此以前与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的关系，则一直不知道，为了弄清事件的真相，最近，我通过刘金同志找到了周璧先生。先生是江苏无锡梅村吕浜人，原名吕祖渭，现更名吕宜。周璧是他到浙东时使用的化名。

下面是周璧先生给我的回信中关于一九四五年春“浙东之行”主要情节的原文摘要。

“还在一九四三年，为了准备向日本侵略军反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在东南抗战前线的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设立了一个东南分处。由美国民主党人Chxistoph Rand（兰德）任主任。美国新闻处这个机构，据我所知，既是一个文化宣传机构，也是一个从事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的机关。

“当时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是比较进步的文化人。他跟兰德以及他身边的几个翻译，过从甚密，建立了友谊。

“一九四五年初，兰德跟谌震说起，想跟前线部队（游

击队)取得联系,替他们散发日文宣传品。据谌震说,听兰德意思,他们提出的对象,表面上是国民党部队,但也并不排除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那时我在永安改进出版社(黎烈文任社长)编辑部工作。一月间,谌震借访问黎烈文的机会,趁空袭警报躲飞机时,一面散步,一面跟我谈了美国新闻处的事情,问我能不能找到游击队,最好能找到新四军。我那时在业余时间帮董秋芳先生编《民主报》副刊“新语”跟当地进步青年接触较多。我知道,在省的训练团(国民党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刘文宪(刘金),家住浙东嵊县,可能找到浙东的新四军。谌震嘱我跟他们研究,希望能争取完成这一任务。

“刘金说,他早先读书的清波中学校长很可能是地下党员,找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把握是有的,愿与我同去。我向谌震汇报后,他跟兰德联系,约我去美国新闻处面谈。我告诉他们可以找到游击队,但不是国民党部队。他们没有坚持找国民党部队,向我谈了他们的要求。我的任务是代表美国新闻处去游击队接上关系,转达新闻处的意见:(一)建立联系,互相交换情报,包括政治军事气象各方面;(二)美国新闻处可以给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也愿意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三)请游击队派正式代表到永安或上饶洽商具体办法。(美国陆军有一个机构在上饶)。

“他们约期作第二次谈话,要我提出目的地和路费数目。

“我到谌震家中汇报情况,他给我看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发的关于中共情况的机密材料,从中看到浙东纵队司令员

何克希的名字。他告诉我向新闻处要路费的大致数目。我又开了三个名字，要他开通行证。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刘金的，用刘文宪名字，一张是我爱人彭传玺的，用史平的名字。

“第二次谈话是在深夜，这次把一切都谈妥了，我把目的地四明山告诉了他们，明确说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浙东纵队，并要新闻处提供三个人的路费和身份证明。兰德约我第二天去取路费和证明。他们希望我能在五月初回到永安或上饶。

“到达嵊县，和刘金同志去清波中学找校长裘某（即裘颂兰先生），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由交通员送我们越过封锁线，进入游击区。以后就由交通站逐站伴送，翻山越岭，约在四月上旬到达梁弄。（据刘金同志来信，途径北庄附近）”

周璧等三人来到梁弄，我出面接待他们。通报姓名后，周璧一封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给我部队的正式信件，是用中文打印，蓝颜色的。接着周璧陈述来意，转达美国新闻处的意思我听完之后，一面给他们安排住在梁弄一户老百姓家里，告诉他们耐心等待回音，一面如实报告谭、何首长，美新处的来也一并交上。

谭、何首长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打电报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示。

在此期间，我秉承首长指示，请周璧等各自写了一份详细的，还请他们写些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送交首长参考。在此上，有一天晚上，何司令找周璧单独谈了一次话。《新浙东

报》记者，黄源同志等都去看过他们。

周璧等三人亲眼看到浙东根据地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安居乐业的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和他们长期生活其中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深为感动。他们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

大约过了十天、半个月时间，军部复电到达，根据谭、何首长指示，我找周璧他们来谈话，转述电报内容，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浙东纵队无权与美国新闻处直接建立联系。美国如想同我们建立联系，必须由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延安党中央商谈解决。”关于他们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的问题，我说：“我们四明山区处在抗日前线，战斗激烈，行动频繁，生活艰苦，你们很难适应，还是回大后方去为好。只要有抗日的热情与愿望，即使在大后方，也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不一定非要留下来不可。”经我这么一说，大概周璧也觉察出我们不想留他们的意思，就同意和他爱人回去。刘金同志家住嵊县，他在梁弄的一些日子里，看到了一些同乡、老师如俞德丰、周丹虹、黄源同志等，并知道在千田坂有一所鲁迅学院，由黄源同志主办，就坚决不愿再回福建。我说：“那也好，你家在嵊县，还是回家去吧！”可刘金说啥也不行，一定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我把这一情况向何司令汇报后，遂决定将刘金同志留下。但刘金同志是从大后方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人呢，为了考验他，我就把他送到设在横壩头的抗日军政干校学习。

周璧在梁弄期间，曾几次去韬奋书店。在决定他回福建以后，曾在书店买了十多本书，其中有“整风文献”，艾青的长诗“吴满有”等，他要我们供给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带回

国民党统治区，我送了他几十份《新浙东报》。临走的时候，我又请司令部供给处长魏音域同志张罗了足够的“法币”，礼送周璧作为路费。

（三）

一九四五年五月底或六月初，纵队行政机关还驻在梁弄。这时有两名青年，一名徐仲言，一名何为，他们从福建大后方来到司令部。我奉谭、何首长之命，又接待了他们。他们是肩负着美国驻华空军的使命来的。最近我写信给徐仲言同志，请他回忆一九四五年到浙东之事。下面是他两次给我来信的综合：

“一九四五年春，美国打算在浙东沿海登陆，打击日军。美十四航空队（驻福建长汀）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由于搞不到浙东沿海日军情报，很想同浙东新四军建立联系，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有关日军的军事情报，愿意空投新式武器作交换。为了建立这种联系，美军愿意空投小型电台设备，并且告诉了空投联络的标记——红色布板。我记得是用长红布条铺在地上，飞机就能按指示的地点进行空投。

美十四航空队顾问吴大琨（现在北京）了解美军这一意图，就到福建龙岩，找到了友人徐里平（台湾义勇队、台湾青年报主编，已故），徐里平同地下党负责人潘超（现在北京）商量，决定此事可办，可以利用美十四航空队提供的路费向解放区输送人员。当时我与何为（按：解放战争期间，何为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爱好和擅长音乐。解放后，曾在中央戏曲研究院工作。我至今未能联系

上。)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到浙东解放区找徐里平的友人郭静唐(已故)我们没有带什么介绍信，只带了茶叶公司工作人员的证明，说是到浙东采购茶叶的。途中又增加一人，名叫王坚。到了天台，王坚留在天台旅馆里等待回音，我和何为进入了解放区。五月间，我与何为到达梁弄，先是找到了郭静唐。郭感到此事甚大，要找党内负责同志，于是把我们介绍到行署连柏生主席那里。连接见了我们。他说这是有关军事问题，要找何司令、谭政委。于是我们又到了纵队司令部。(按：郭静唐同志当时担任司令部秘书长，所以说：“又到了司令部。”)

到了司令部，是你接见我们的。你说何司令、谭政委很忙，不在司令部，要我们和你具体谈。谈后，你说这事要请示领导。当晚我们随同司令部行军。(按：大概是六月三日我们离开梁弄那一天。)次日你和我们谈，说：“此事已向领导汇报，象这样的事，自己不能决定，要请示延安。”又说：“你俩任务已完成，同天台王坚联系的事由部队办。”我们两人提出要求投考浙东鲁迅艺术学院，你就把我们介绍到鲁艺去了。”(按：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黄源同志。)事情到这里也就结束。

× × × ×

从一九四五年到现在，一晃三十五年过去了，那时从福建大后方到浙东抗日根据地来的几个青年，现在怎么样了昵？

何为同志的情况，已如前述。徐仲言同志，现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刘金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咬牙切齿地诬蔑

为小爬虫，大张挞伐，现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尽管他们也都已到了两鬓花雪的年龄。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于杭州

定海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简述

陈子方等

接 受 任 务

日寇为了把舟山群岛作为海军第三舰队的基地，加强上海外围的防务，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凌晨，在海、陆、空军的配合下，侵占了定海城关和沈家门。当时国民党县长和他的国民兵团未经作战，就渡海逃至大榭岛。在国民党政权瓦解、日寇势力无法深入的广大农村，实际上为地方势力所控制，如：本岛的丁崧生，六横的王继能，岱山的郑留忠，秀山的林良坤，巨山的王小冰，长涂的顾荣林，金塘的俞烈荣等。这些“乱世英雄”据岛为王，有的挂着抗日的招牌，有的公然打出汉奸的旗号，都干着土匪的勾当，鱼肉人民。

国民党县长苏本善逃到大榭岛后，仍然标榜“抗日”。一九四〇年初，在我党的支持下又进军本岛，击败本岛“游击司令”丁崧生部，控制了本岛的广大农村，并委任其亲信吕道英为东区（洞岙区）区长，岳树猷为西区（小沙区）区长。吕道英当时标榜进步，欢迎我党派人前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宁波特委决定：从余姚调干部到定海，将定海作为我党在浙东沦陷区开展

武装斗争的重点。

一九四〇年九月，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夕，余姚的政治形势逆转，上级党委决定余姚中心县全体同志及面目较红的干部，分批撤离。这一时期先后调离的有熊达人、许振武（均已牺牲）、陆飞（陆学斌）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小杨（即朱学勉，已牺牲）、叶伯善去诸暨，马青、唐敏鹿（唐伟）、屠品生（陈忠琪）等去绍兴，俞震、杨肖梅（杨明）、叶瑞康去嵊县，马步方、岑勋（均已牺牲）去萧山。正在这时，宁波特委书记王平（王文祥）同志来到余姚南城，与中心县委书记小杨同志商量后，决定立即调楼明山、陈肃两位同志离姚，另行分配工作，并通知到姚江边的青林渡口等候。楼、陈二人遵嘱乘姚江轮在青林渡上岸后，由前来联系的“小黑炭”岑永福同志带到了王平同志住地。当晚，王平同志才向楼、陈交代了去定海的任务——到舟山敌后开展武装斗争。他还详细地介绍了定海的斗争形势，去定海的路线及联系地点。

第二天，楼、陈乘船转宁波到柴桥，找到以开设鱼鲜摊贩为掩护的交通李志松同志。然后由李雇了一只能够越过海军封锁线的小海船，在日寇舰艇探照灯的强烈照射下，沿着大猫、扎玉等小岛进入岙山港，在惠民桥上岸。通过李正兴找到了定海党的负责人王烈钧（王起）同志。经过研究，由楼明山搞统战工作，名义上是洞岙区指导员；陈肃搞武装工作，名义上也是洞岙区的指导员，部队的支部书记。抗日、抗日，喊了几年，但从未和日本鬼子直接战斗过，现在已进入敌占区了，可以直接和鬼子战斗了，内心很是兴奋。在柴桥，两人就商量好，为了工作的方便，明山改名为童生，陈肃改名为子方。就这样，新的战斗生活开始了。

创 建 武 装

定海沦陷后，县工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认识到要团结各阶层人民来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掌握武装。因此，从一九三九年冬开始，就组织了武装部队，但第一次组织的以褚公良为队长的吴榭乡自卫队，在一九四〇年夏被苏本善以升级扩编的名义改称为县抗日自卫独立中队，任命褚公良为中队长。从此褚公良就逐渐紧跟苏本善，当他的“大官”去了。党组织决定重新建立起一支小部队，部队名义上是洞岙区署的队伍，实质上完全是我党掌握的武装。我到部队时，全队十二个队员中，有七、八个党员，基本上是定海城关镇的地下党员。队长是李子祥；武器有一支七九式汉阳造套筒步枪，一支毛瑟手枪，一支三号木壳枪，三支“独粒弹”的蜡弹步枪以及几支土造手枪。由于队伍初建，战士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纪律比较松懈，也缺乏军事常识。记得当时有这样一件事：班长潘阿明缴到一支三八步枪后非常高兴，随即卡上一颗子弹试起枪来，只听嘭的一响，接着又是“啊唷”一声，枪筒炸裂，脸部负伤，原来他把七九步枪弹装在三八步枪上打，造成事故。

当时洞岙区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敌人正部署对舟山群岛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扫荡，东区又是大清乡的重点。在长二十公里，宽七、八公里的狭小的海岛范围内，日寇在东区就建立了定海、沈家门、白泉、大展四个据点，驻有重兵。以日寇海军为主，常驻有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八百多人。为了清乡，又从上海增调了五

百人，配有轻、重机枪六十余挺，重炮、高炮等二十四门，以及其他各式武器。海上用军舰封锁，沿海又以武装的小汽艇不断巡逻，空中用飞机威胁（定海东门外有飞机场，常停轰炸机等十架左右）。环岛军用公路已联成一线，东区四个据点之间敌人的军用汽车都可直达每一个乡镇。同时，日寇为了强化伪组织，从东北调来日寇的忠实鹰犬李继臣为定海县伪自治会长，赵日亮为伪警察局长，毕继臣为特高科长，利用汉奸镇压与奴役舟山广大人民群众，妄图建立他们的所谓“巩固的海军基地”。

一九四〇年秋，敌人准备进行全面的有计划的大清乡，苏本善得到这一情报后，又一次率部逃离本岛，并占领了镇海县柴桥地区。不久，黄绍竑任命苏本善兼象山县县长，从此苏部再也不敢来定海了。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敌人开始了极其疯狂的清乡，反复采用“拉网”战术，“篦梳”战术，漫山遍野地进行搜索；或东西夹击、沿路扫荡，以山岙为重点，山上的庵庙山舍全被放火烧了。

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们充分认识到海岛回旋余地较小，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才能生存下来。党在东区是有基础的，这里是沦陷后定海党首先开辟的一个地区，为坚持武装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积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我们肃清了本岛的散兵游勇的抢劫活动，多次击退海匪对钓门渔港的袭击，保证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也积极做好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在本岛，除了我们这支小部队外，还有褚公良部和邬阿定部共有二十多支枪。为了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党组织曾先后派党员张启达、徐长海同志做他们的工作，使得在反清乡斗争中能做到

互相配合，不发生磨擦。在军事上，我们也实行正确的方针。一开始，采取荫蔽力量的办法，不和敌人正面接触。以后，觉得老是被动也不是办法，应该伺机出击，打击敌探汉奸和另星敌人的活动，于是把那些妨碍行动而又无实际作用的武器暂行埋藏起来，部队以小组为单位分散到敌人周围去打击敌人。同时也加强了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及时处决了为敌人带路搜索的汉奸敌探，破坏敌人的通讯工具，拔除了十余华里的军用电话线杆，袭击了敌人的岗哨等。

这一时期，我们一直处于极其艰苦的斗争中，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部队钻山洞、住盐舍、露宿山岗和小海岛，每天都要爬山越岭，穿插于敌人的扫荡队伍的间隙。情况最严重时，只留下我们三、四个人携带短枪，坚持斗争。所有地方干部甚至连小学教师也暂时撤离本岛。部队分成小组活动后，采取了住宿和联系工作严格分开的措施，天黑进村，天明转移，使敌人的扫荡搜索经常扑空。敌人扫荡的重点是在山岙，我们就到敌人活动频繁的公路两侧，或在敌人据点的外围，依靠群众，坚持了斗争。在这些严酷的日子里，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党的干部和爱国青年杨静娟（女）、胡尖峰、夏建奋、吴荣钧等同志就在这一时期英勇地牺牲了。经过半年多的斗争，我们的部队得到了发展，在反清乡扫荡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了部队，他们都是年轻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同时又陆续缴到十多支步枪，使部队的战斗力加强了，狠狠打击敌人清乡扫荡的时机成熟了。

初 试 锋 芒

由于在一段时期内，我们没有正面打击敌人，日寇的气焰更

加嚣张，到处进行残酷的掠夺、烧杀、奸淫，广大群众和战士对此无不切齿痛恨，军民要求打击日寇的情绪日益高涨。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寇侵占宁绍一带，调走了一部分扫荡的部队。但他们为了继续清乡扫荡，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从岱山调来伪治安大队郑留忠部进驻沈家门，妄图消灭我部。一九四一年五月，为了狠狠打击日寇，鼓舞人民斗志，我们把东区愿意抗日的力量集中起来，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开进蒲岙乡的蒲湾，在日伪军扫荡途中设下埋伏。不久，日寇率领郑留忠治安大队的一百多名日伪军乖乖地进入我们的伏击圈。这时，在楼童生同志指挥下，我们的部队突然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时枪声四起，杀声震天。这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袭击，敌人以为游击队早被消灭了，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此遭到突然伏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惊慌失措，只顾四散向沈家门方向逃跑。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多名，俘虏一名，缴获步枪四支。

蒲湾战斗，是共产党人在浙东对日伪军的第一次直接战斗。说明了日伪军也是可以打败的，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蒲湾战斗，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使动摇中的乡保政权稳定下来，不敢全面投敌。蒲湾战斗，促使沈家门的敌伪军矛盾加深。不久郑留忠被赶出了沈家门，当地的伪军与伪警察分局也表示不敢为非作歹。沈家门的大商人，也迫于形势，同意向我缴纳营业税了。蒲湾战斗的胜利，为东区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

这时日寇把希望寄托在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大展乡人王秉楚身上，提升王秉楚为东区伪自治会会长，利用王秉楚与东区乡保长的历史关系，办理清乡，企图逐步压缩我们的活动范围，伺机消灭我军。这一时期，我们的部队又得到了发展，已有长短枪

四十余支，在敌占区附近建立了战斗小组，群众称我们部队为洞岙区警察大队（当时定海的部队一般以队长的姓名代表部队，并无正式番号）。

为了打击王秉楚的狂妄野心，粉碎他的清乡阴谋，九月二十八日，我们又组织了大展战斗，主动向敌占区据点发动进攻，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占领了大展镇。但是由于事先联系的内应未起作用，王秉楚龟缩在大展的大庙里负隅顽抗，我们又缺少攻占碉堡的武器，没能消灭王秉楚的武装力量，但是只消十几分钟就可以赶来援助的沈家门和白泉的敌伪军都不敢出援。这次战斗加深了敌伪之间的矛盾，仍然给王秉楚一个很大的打击，从而粉碎了他的企图通过清乡消灭抗日力量的狂妄野心。

战斗结束后，部队胜利转移到北蝉乡小展的汤岙。这是一个山谷平地，西边是小展岭通白泉，东边茅洋岭通大展，南边黄梁尖



楼童生烈士遗像

岭通洞岙，北边靠大海。由于连续取得胜利，我们在思想上有些麻痹，九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岗哨发现东西岭上有敌人的情况，当地群众也来报告，敌情得到了证实。楼童生同志预感到我们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他当机立断，决定部队向北下海，沿海边绕过小展岭突围。他自己则带四个持短枪的区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工队员，奔向黄梁尖岭，以转移敌人的视线，掩护部队撤退。日寇很快

发现了向南转移的楼童生等，三路合围，把他们包围在岭上，楼童生、陈小黑、董千里、翁世俊等四同志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搏斗，终因敌众我寡，在子弹打光后全部英勇牺牲。由于日寇被牵制到南边去了，使部队顺利突围到皋泄乡。

楼童生同志的牺牲，使我们深感悲痛。楼童生同志是浙江余姚人，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三八年入党后回余姚工作，曾任中共余姚战时政治工作队党团委员，第三、第四区队长。到定海后，他努力执行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东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与抗日武装的成长，作出了贡献。最后，用自己的鲜血保存了这一支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部队。他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激励着我们去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大展战斗后，敌人发现我主力还完整地存在着，于是更加疯狂地进行清乡。他们充分利用军用公路和海上舰艇，采取抓住目标，不分日夜的突然奔袭的战术，妄图消灭我们。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与敌人周旋。直到一九四二年底后，太平洋战争已爆发一年，敌人在本岛的部队有所减少，形势才稍有缓和。这一时期我们经受了锻炼，也取得了经验，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与广大群众的支持下，部队在斗争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楼童生同志牺牲后，一九四一年十月，宁波特委又调朱树春（朱洪山）同志前来，任大队附兼指导员，加强部队的领导。

一九四一年四月后，宁波、镇海等地相继沦陷，汪伪军一九四师进驻柴桥，原驻柴桥的苏本善部逃到象山港一带去了。广大农村，一时成为空隙地带，这给我党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

的部队不断扩大后，也需要向外发展，经宁波特委决定，到镇海东部开辟新的基地。一九四一年冬，开始了向嵛头地区的进军。嵛头位于镇海极东，是突出于海面的一个尖角，通浙东大陆，与本岛的五海山隔海相望，木帆船一潮水就能直插过去。在这里，我党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础，上宅乡乡长贺灏群就是共产党员。我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受到了嵛头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却引起了盘踞于六横、桃花等地的王继能部的反对，不久，双方就在王前门发生激战。这次战斗，我军缴获步枪十多支，王残部纷纷逃回六横岛。王继能部的公开番号是“定象游击指挥部第四大队”，他以抗日为名，实则霸占一方，鱼肉人民，是一伙土匪。但他当时还挂着抗日的招牌，属于友军。因此，我们对他仍然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要时打他一下，但又适可而止，当王继能派人前来联系，承认我部在嵛头活动权利时，为了团结抗日，就归还了他的全部枪枝。嵛头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以后，成立了嵛头办事处，以李子祥为办事处主任，在那里设有医务所、粮站等。后来又建立了大碶头办事处，这里成为我们向鄞、奉一带发展力量的跳板，也是打通三北根据地的要道。

随着嵛头游击区的开辟，我们的部队也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以步枪为主，有四十人左右，主要由朱树春同志负责，在柴桥以东进行活动，有时，也来本岛进行突击活动；一部分以短枪为主，有五十人左右分散在本岛活动。本岛的短枪队，着重吸收了熟悉敌占区情况的青年参加。在城区外围，在东门外一带建立了一个分队；在沈家门、大展之间的芦花舵岙一带，建立了一个分队；在本岛与镇海之间的长崎等小岛上建立了一个分队，以控制

海上交通线。主力与步枪队、短枪队根据形势需要，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分散为了深入群众，打击敌人，集中为了进行教育，配合主力，打击敌人。这个布局直到一九四三年撤离定海为止，没有根本的变化。

随着东区群众工作的开展，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参军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按照新四军的要求，严格挑选战士，首先吸收经过手工工会、农会组织考验的青年党员参加部队。一九四二年十月，当宁波特委调朱树春同志回四明山根据地时（注一），部队已得到很大的发展。

成 立 五 大 队

一九四二年六月，宁波特委派当时淞沪游击指挥部五支队的中队长吴志先、吕芳，政治指导员王群怀和李斌等四同志来部队加强领导。这时，主力部队已有一百多人，轻机一挺，步枪一百多支，我们把步枪队扩编为两个中队，由吴志先任大队附兼一中队长，吕芳担任二中队长，陈大江、徐长海担任政治指导员。这两个主力连里，班长以上的干部都是党员，连内建立了党的支部。主力连活动范围从定海本岛、镇海崎头，向我党有群众基础的镇东的大碇头、邬隘，鄞东的天童、咸祥一带进军，在定海的短枪队，仍坚持东区的游击战争。

一九四二年七月，中共浙东区党委建立了。为了适应浙东地区的斗争形势，宁绍地区分别成立了金萧、三北、四明三个地委和以吕炳奎为主要负责人的三东地工委，宁波的甬江以东地区即镇东、奉东和定海等地区属三东工委领导。在三东工委的范围内，

除宁波、定海等少数敌伪军据点为日伪军占领外，广大农村是属国民党定海、象山县长苏本善（占有象山、镇海江南一带），鄞县县长俞济民（占有宁海、奉化、鄞县一带）的势力范围。他们游而不击，称王称霸，为非作歹，深为群众所痛恨。为了打开这一地区的局面，使三东地区和三北根据地联成一片，经三东地工委决定，将部队的对外名称定为定象游击指挥部的第五大队，大队长名义上由挂名的洞岙区区长吕道英兼任，大队附为吴志先。如同东区警察大队一样，这个部队完全是党所领导的一个部队，实质上与苏本善毫无关系。苏本善也象对待洞岙区的部队一样，从未发给过一支枪、一颗子弹、一分钱，吕道英也未随部队行动过。第五大队成为三东地区党的主力武装。在三东地区活动时，就由三东地工委的同志领导了。在定海方面，自日本鬼子清乡失败后，党结束了单线领导的形式。一九四二年六月，以陈维新（钱鸣岐）、王博平、陈子方三同志组成县工委，领导定海的斗争。当时的定海县工委除坚持定海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外，在主力方面是向“五大”输送新战士，输送全部步枪，负责部队的全部财经供给，还为建立通往苏中革命根据地的海上交通线作出努力。

吴志先同志来部队后，使部队的建设进一步出现了新的面貌。党的领导加强了，每个中队的党支部，各有党员近三十人，班、排、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经过反清乡斗争的考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基层武装干部，如分队长黄阿木、朱松基、吴静立、徐良夫等。根据上级党委的统一安排，还分期分批的组织班长以上的同志去三北根据地参加军政训练。与此同时，部队的思想建设也加强了，建立了一套政治工作制度，积极开展抗日理论的教

育，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每周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作为生活检讨会的内容。各级干部都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战士。在镇海小港行军时，战士双珠文同志脚痛，吴大队附就背着他行军。原一中队班长史飞同志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党组织对全体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每天早上出操军训，回来上政治课，中午上文化课，下午上军事课，专讲游击队八大技术的理论，晚饭后开生活检讨会或做集体游戏，然后出发夜行军，这些制度是风雨无阻的。每到节日，如元旦、春节等，党支部要动员每个战士写抗日文章，指导员用约四市尺长、三市尺阔的土白布二块，把同志们写的文章，整整齐齐地贴在土白布上，并在白布上方贴上用红布剪成的大字标题和镰刀锤子的图案。当队伍出发时，白布挂在中队通讯员同志的背上，可以边走边看。因此，我们称它为“背报”。到宿营地后，再把“背报”挂在墙壁上。老百姓围拢来看报，都称赞不已，说这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与人家不一样。

“五大”向三东区进军后，由于太平洋战争已爆发，日寇的清乡、扫荡有所减少，形势开始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加强了对日伪的进攻。

一九四二年秋，第一中队在吴志先同志率领下，在鄞县袭击前去天童寺烧香的汪伪军一九四师师长霍振汝及其随从多人，击毙敌排长一人、士兵三人，缴获长短枪四支，而我军无一伤亡。战斗中同志们表现得非常顽强，机枪脚架打得螺丝松动脱落了，就架在弹药手的大腿上继续扫射敌人。胜利后，战士们唱着一支自编的曲子，凯旋而归。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大展王秉楚部的伪军十余人，全

付武装，大摇大摆地来到芦花乡乡长家里，要款派粮，进行敲诈勒索。我部闻讯后，吴志先同志立即率领部分队员，赶往芦花。当快靠近乡长家时，被伪哨兵发现，敌军慌忙开枪射击，并立即关闭前门、后门，妄图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等待大展敌人前来增援。芦花离大展据点仅八华里，不宜久战。吴大队附决定抓紧时间，速战速决，指挥大家猛冲，自己首先一个箭步冲到门口，一脚把门踢开，第一个冲了进去，接着队员们一个个冲进里面，冲杀声、口号声交叉在一起。受到攻击的敌人，慌成一团，有的爬进床底下，有的钻进灰缸里，最后一个个缴枪投降。这次战斗共俘敌七名，缴获步枪七枝、短枪一枝。

我本岛部队还积极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如瓦解敌伪治安大队梅必成部，缴获全部武器；在沈家门炸毁了敌人军事经济情报特务机关——新民洋行；闯入定海城关，处死汉奸，袭击敌人岗哨；发动群众保卫秋收的反抢粮斗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扩大了我军的影响，打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也引起了伪军内部的分化。

我们在坚持对敌占区的斗争中，也付出重大的代价：驻城区和沈家门附近的二个分队的同志，虽然不断补充，但伤亡很大。负责短枪队政治工作和芦花、航岙、蒲岙三乡以及沈家门、大展工作的指导员王群怀同志，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在芦花施家岙地方与日寇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驻城区附近的党员分队长叶振芳，也在一九四一年秋一次扫荡中付出了年青的生命。又如一九四二年九月我们进驻普陀山时，遭到敌人五只舰艇的包围，一个班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了；再如我部为控制本岛与镇海新碇头之间的海上交通线，进驻大猫山时，由于汉奸告密，我们一个小组的同志

也都牺牲了。我们狠狠严惩了这伙敌探，才控制了这些岛屿。

一九四三年五月，国民党定象游击指挥部第四大队王继能部公开投降日寇，其部下分队长俞磊峰标榜“抗日”，携部三十多人前来崎头要求加入我部。三东地工委同意了这个要求，并拟在组织上作相应的调整，把原二中队的二分队划归一中队，由原二中队的一分队与俞磊峰部重新组成二中队，委任俞磊峰为中队长，徐长海为指导员。当时有的同志从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要改造旧军队出发，曾经建议一、二中队的建制不变，俞磊峰部可单独给以第三中队的名义，派党员加强领导，逐步加以改造。但领导上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仍按原方案执行了。这样，部队虽然在数量上扩大了，但在政治素质上却下降了，以后的实践证明，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建设洞岙根据地

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是和洞岙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分不开的，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为部队的发展提供了人力、物力可靠的基地。

洞岙区（东区）辖十六个乡镇，自从一九四〇年底日寇对舟山进行大清乡后，国民党在定海的党政机构全垮了，东区区长吕道英不久也走了。共产党员楼童生、陈子方等公开领导了政权和武装斗争，定海党的主要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也长驻东区，不少乡建立了党的支部，一切均由我们说了算。我们征税，委派乡、保长，处决罪犯，一切均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实行“三三制”政权，二五减租，执行正确的锄奸政策等。

我们在洞岙区政府的工作中，高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了团结东区的上层势力，一开始，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由与上层势力联系较多的党员出面和吕道英、梅燕翼、褚公良等结拜为七兄弟，在坚持反清乡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政权建设中，根据中央实行“三三制”的指示，我们邀请了失业在岛的国民党员陈雨水和一些地方绅士、旧行政人员参加工作，他们中有的人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牺牲。如吴筠，原是旧行政人员，一九四一年大清乡中被日寇捕去，经严刑拷打，英勇牺牲。我们特别做好乡、保长的工作，选择同情抗日的开明绅士、商人担任乡长，又派共产党员担任一些乡的事务员，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对乡保长采取了面对面的领导方式，主动上门做工作，增强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困难。这样，使有的乡保长在敌人清乡扫荡时也不与敌人合作，结果有的乡长房屋被烧毁（如吴榭乡乡长梅燕翼），有的乡保长被日伪逮捕关押。

当然，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实力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县长苏本善是不甘心于我党力量壮大的，他千方百计的想吃掉我们这支队伍，当日伪的清乡扫荡减少，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苏本善的阴谋活动就更加频繁了。他进一步把褚公良收买过去，一九四二年秋，褚已是西区区长了，他却委派国民党军官吕志雄为中队长，赖在洞岙区的平阳浦东塘地一带活动，处处与我们作对，准备争夺我们的根据地，争夺沈家门的税收，甚至秘密杀害我驻沈家门税收干部叶涛同志。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们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主动把主力部队开赴西区的干览、马岙等乡进行活动，扩大政治影响。

我们把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作为全部工作的基点，在

农村，试行二五减租，规定负担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总产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同时，也规定交租交息，既承认地主地权，又承认农民佃权。在集镇，正确调节劳资关系，保证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又使资方有利可图。同时，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有条件的地区，如吴榭、洞岙、蒲岙、长崎等乡，我们建立了工会、农会、游击小组。在敌占区附近的甬东、皋泄、北蝉、芦花、舵岙等乡建立灰色的组织。以后，正是从这些组织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成为我们战士的主要来源。当时，除了政府干部、军队干部做群众工作外，还有一个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主的、党所领导的战时政治工作队，进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成为日寇逮捕杀害的主要对象，许多同志为抗日救国斗争而牺牲了年青的生命。

从定海武装部队创建起，部队的全部供给（包括政工队的供给）均由洞岙区政府负担。为了保证供给，我们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税收制度与公粮制度。但是，随着部队的增加，近三百人党政军工作人员与战士供给，绝不是山岙里的农民所能负担得了的。因此，我们积极开辟沈家门的工作。在沈家门开设同济鱼行，作为我们的联络点，派一个短枪班经常出入该镇，派叶涛、陈雨水等干部常驻沈家门做商人的工作，结果使沈家门成为我们搜集敌人情报的中心，也是部队经济的最大供给地。向沈家门商行征收的营业税，占我们部队全部供给的百分之九十。当时的沈家门是闽、浙与上海之间的转运商港，有“小上海”之称，商行林立，奸商麇集，向他们征税是完全应该的。

皖南事变后，有一些面目较红的同志在宁绍一带蹲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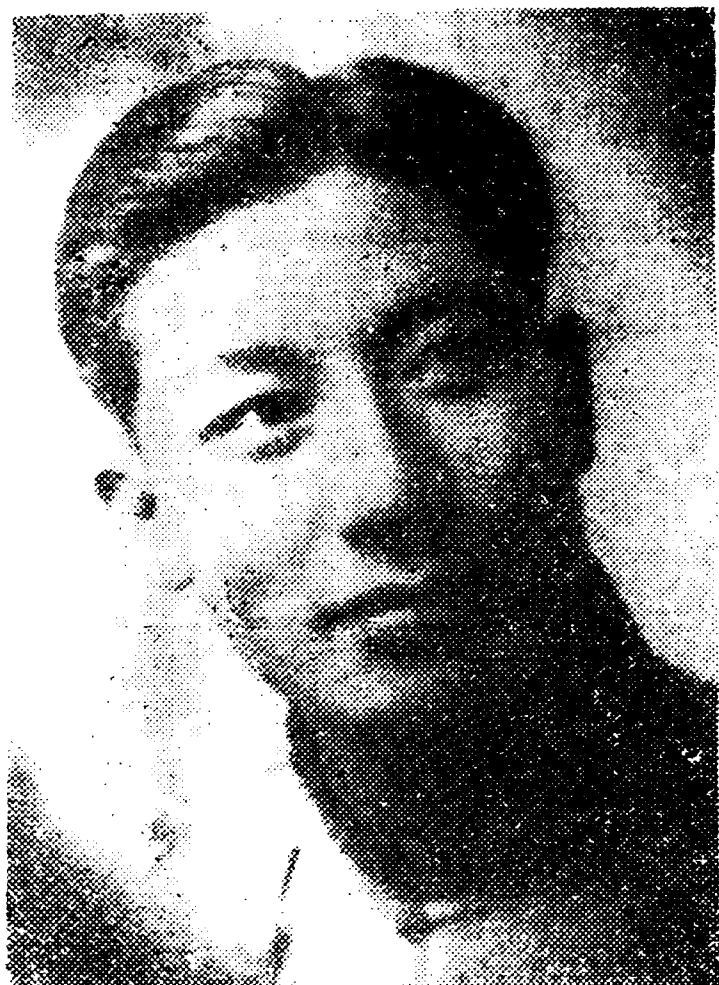
了，转移到了定海洞岙区，除了一部分参加军政工作外，一部分担任了小学教师，以达到长期荫蔽，积蓄力量的目的。当时宁波著名文化人庄禹梅老同志也到了洞岙，还曾经打算出版一个刊物。在三北游击根据地与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创建前，定海这个孤岛成为我党在浙东可以公开活动的一个基地。

奔 向 四 明

浙东自一九四一年四月沦陷后，我党的武装力量有了迅速发展。一九四一年底开辟了三北（余姚北、慈溪北、镇海北）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九月后，又挺进四明山，至一九四三年秋，队伍在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名义下，已发展到二千多人，逐步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浙东顽方企图进攻我四明山根据地，消灭我浙东部队的主力。原国民党定象县长苏本善，撕下抗日的面纱，也想向他的主子表功，企图公开与敌伪勾结，阴谋策划消灭“五大”。为此，上级党决定将“五大”和面目较红的地方干部撤到三北，去和浙东主力会合，以集中优势兵力，粉碎敌人对四明山根据地的围剿。

但是，在镇海一带活动的“五大”主力在撤出过程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当大队附吴志先、指导员徐长海去镇海洪溪庙动员二中队撤出时，当时从王继能部分化出来的标榜进步抗日的俞磊峰，却露出了反共卖国的真面目。他完全投靠苏本善，拒绝执行党的指示，并公然叛变，采取突然袭击，当场打死了大队附吴志先和徐长海同志（注二），又配合苏本善部收缴了我党员占绝对



吴志先烈士遗像

优势的二中一分队全体队员的武器。但是，二中队一分队的广大党员是好的，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了斗争，分队附徐良夫等一九四四年初到了四明山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分队长朱松基、班长陈阿多等坚持了在舟山的革命斗争，一九四七年参与组织了东海游击总队，担任了中队长，是总队的骨干。

一中队在中队长吕芳、指导员陈大江率领下，顺利撤到定

海，县工委的同志进行了紧急部署。由于俞磊峰的叛变，我们必须迅速撤离定海。为了保证主力武装和主要干部顺利撤出定海，又要保证党继续坚持在定海的抗日战争，在接到通知后的两天内，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和善后工作。离开定海前，由军政负责人出面写了《告长期在党领导下进行合作的各阶层上层人士》的信，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敌伪顽合流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也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十月十四日，主力一中队，本岛的部分战士，一些地方干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本岛的大部分战士。动员回乡，参加生产。），集中到北蝉乡的黄沙海口，乘海船撤离舟山，同时还为四明山根据地带去五万多斤粮食。五只大海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扬帆前进，同志们一方面警惕地注视着海上的动静，同时又为即将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斗争而无比兴奋。经过八小时的航程，安全地驶过黄大洋、灰鳖

洋，在旭日高升的时候，到达三北根据地的海口古窑浦。第二天晚上，三北地委在驻地洪魏村召开了欢迎大会，我代表定海部队讲了话；地委书记兼三北自卫总队政委王耀中讲了话。十月十六日晚，部队越过姚江敌人的封锁线，进入了四明山，开抵中共浙东区党委所在地的梁弄镇。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听取了陈维新（钱鸣岐）和我关于定海部队撤离情况的汇报，并宣布“五大”一中队按原编制转入新四军三北游击指挥部五支队，成为五支队三大队的第二中队，并立即投入了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为保卫浙东革命根据地而战斗。

从定海沦陷之日起，定海党即积极组织武装斗争。在长期复杂的艰苦奋斗中，定海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逐步的成长壮大了，这完全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在皖南事变后，在日寇大规模的残酷的清乡扫荡的情况下，当全国抗日战争处于比较困难的形势下，我们的队伍仍然稳步发展。这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也是上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定海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在定海坚持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许多同志为着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党的好干部。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我们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过去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在四个现代化的新的进军中，作出新的贡献。（**本文由陈学明根据陈子方、吴静立、鲁定智、史飞等同志回忆整理。**）

注一：朱洪山同志（朱树春），浙江慈溪人。一九三八年去山西八路军学兵队学习，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慈溪战时服务大队大队附。一九四二年十月调回四明地委，曾任鄞慈和嵊新奉办事处主任，浙东纵队后勤部副部长等职。浙东新四军北撤后，坚持四明山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在鄞县罨湖乡潘岙与国民党浙江保安团激战中英勇牺牲。

注二：吴志先（盛坤）同志，浙江余姚人。一九二二年生，小学毕业后，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余姚战时政治工作队，是年入党。党为了培养他学习军事，曾在余姚抗日自卫中队为战士、班长。一九四一年浦东五支队来三北后，任五支六中中队长。一九四二年调来定海，任五大队实际负责人。吴志先同志作战时身先士卒，猛打猛冲，当时是一个出色的青年干部。

徐长海同志（徐士圻），浙江镇海人。一九一一年生，店员，一九三八年入党，曾在浙西工作，一九四一年调来定海。由党以定海政治工作队员名义，派往褚公良部负责政治工作。一九四二年任五大二中政治指导员，徐长海同志曾对五大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

东 方 小 学

周 丕 振

一九四一年古历年初四的晚上，朴头村岩头咀停泊着一艘小航船。深夜的海边北风凛冽，兰色的天空寒星闪耀，上涨的潮头拍打着船肚，催促行人启航。这时，小船头站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他头戴礼帽，身穿深灰色的皮袍，两眼朝东南方向眺望。那里，是他的目的地，新的战斗岗位——楚门东方小学。

他就是乐清县委郑梅欣同志，因国民党顽固派在春节前夕，在朴头、白溪一带搞了一次武装清乡，组织上决定他转移到玉环县楚门镇工作，以教书先生的公开身份，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方针。

到了楚门，他住在地下党员王咏樵家里。

次日上午，玉环地下县委书记吕屏带着一个穿中山装的青年来到了王咏樵家。吕屏给双方介绍：“这是郑梅欣同志，化名宋伯钦；这位是杨干同志，化名李正之……”杨干的家乡远在江苏南通，抗战爆发后，他翻山越岭，只身来到台州参加地下工作。

吕屏介绍以后，由王咏樵介绍东方小学的情况。东方小学创建于一九三九年春，是当地开明绅士陈愚亭以及从外地回乡的中学教师林任望等发起筹资兴办的。第一任校长林任望，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镇上很有影响，第一

次反共高潮后，林任望被排挤，接替他的第二任校长姓谢的是个三青团员，他一来，一切抗日救亡运动均被禁止，学校办得死气沉沉，“莫谈国事”，闭门读书成了东方小学的“校风”。姓谢的只干了一年，随着他的后台玉环县长方引之下台而滚蛋。东方小学现在面临停办的危险，没有校长，没有教导主任，师资缺乏，学生不多，经费困难……。只有校董事长陈愚亭还在撑持着。他是芳杜乡人，是玉环县颇有地位的开明士绅，也是楚门镇上有名的中医。抗战以来，他拥护我党团结抗日主张，热心教育事业，一心要把东方小学办好。

第二天，王咏樵陪同宋伯钦与陈愚亭见面时，宋已成竹在胸。他谈吐文雅，仪态大方，见解鲜明，对开学的准备工作也颇有见地，很使陈愚亭折服，当即聘请宋伯钦当了教导主任。从此东方小学就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了。

东方小学又开学了。

宋伯钦兼任五、六年级（复式）级任，教国语、自然；李正之担任三、四年级（复式）级任，教音乐、社会。宋、李对国民政府颁发的课本，凡是反动的，采取跳过去的办法，坚决不教；凡是错误的采取批判的教法；对缺乏思想政治内容的补充抗战的内容，同时介绍学生订阅比较进步的少年儿童刊物，或选作课文，从而使教学内容一新。

二位老师，除了晚上备课、改作业外，还要研究工作，为了团结教师，他们了解到本镇周昌龄老师患肺结核，为了让他多休息，就把他的课程调整到上午，下午他可以不必来校，使他极为感动；有位住校的温州女教师，教导处多方关心她的生活，解决她的困难，使之不致有异乡孤独感。就这样他们团结了老师，第

一个星期教学就上了正轨。第二个星期陈愚亭来学校，对宋伯钦说：“宋先生，教学我完全放心了，只是校长缺人，经费也有困难……”宋知道他曾邀王咏樵当校长，被王父拒绝了。校长人选问题，党组织已作了研究，认为王咏樵最合适的。他是党员，为人忠厚老实，家庭是地主，正可掩护地下活动，又可从他家庭得到经济援助。这时宋故作不知地说：“人倒是有，就是年轻了点，不知是否适合？”陈愚亭忙问是谁，宋说了王咏樵。陈愚亭长叹一声说：“我早就请过了，只要他当校长，经费等等也就好解决了，无奈其父拒不应承。”宋伯钦毛遂自荐说：“只要王咏樵愿干，他父亲那里由我去作说客。”

王咏樵的父亲是一个吝啬的土财主，他有良田百亩，还兼营木行生意，在楚门确是数得上的财主。但他有钱无势，在摊捐派税上总是比人多掏一点，有时还得受气。儿子中学毕业后，他就决心把他留在身边，安分守业，至于当校长，既要掏腰包，又要闯祸的亏本买卖，他是不干的。所以，陈愚亭一开口，他就拒绝了。但是王咏樵当不当校长，却是我们党能不能完全掌握东方小学的关键，因此必须说服王父。但说通王父确非易事，于是，宋、李、王三人计议了一番。

星期天上午，宋伯钦独自到了王家，土地主正坐在堂上。宋和他寒暄一番以后，立即拉上了正题，谈起东方小学的复兴，需要物色一个有声望的人来当校长。老头儿原来只想到当校长要掏腰包，没想到担任校长还有讲究，他兴趣来了，忙问：“校长还不是拉一个凑凑数就算了。”

宋伯钦庄重地说：“校长，校长，一校之长。为人既要有品德，还要具有一定学历，象姓谢的校长，有后台，无威望，所以

东方学生一天天减少，几乎停办。可见，校长不简单。”

宋伯钦的每一句话，打动了王咏樵父亲。他要早知道当校长有这么重要，陈愚亭来找他时就会满口答应的，现在坐失了一个良机，恐怕难挽回了。沉吟一会他又问：“那现在一定找好了？”

“还在物色当中。有几个人，正在衡量。”宋伯钦隐而不露。他已察觉老头儿动了心了，所以也不主动提出。

“是那些人啊？”

“咏樵老弟也在考虑之列！”

“陈老先生能不介意吗？上次怪我，一口回得太死！”老头悔恨之色溢于言表。

“是啊，愚亭先生一片好意，有心栽培咏樵，不想老伯没有体会他的一片苦衷！”说罢，宋伯钦慢慢抽起烟来，静观这位土财主的动静。他心里有数，王咏樵当校长已没问题了，老头儿已经动心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王咏樵当校长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他从老财主那儿挖一点“肉”来解决经费困难，所以还得给老财主把这一点破。

沉默了好一会，还是老头儿含糊其词地先问了：“你看这事……”这时他已经从七分后悔增加到十分后悔了。

“哦，咏樵当校长的事？好办，好办。我去跟愚亭先生说。只是……”宋伯钦这下低声细语地从王家的财富谈到王家的社会地位，暗示只有钱财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家是被人瞧不起的，吃了亏，还要受气。现在王家什么都有了，就是缺少一点社会地位。咏樵老弟正年轻，应该让他到社会上去闯闯。东方小学的校长，社会地位是蛮高的，很受父老士绅的尊敬，校长的父

亲，当然也会受人另眼看待。再说，有的人家还拿出一点钱来修桥铺路，这还不是为了图个名？象你们王家还在乎为办学校拿出几个钱吗？办学校是桃李满天下的事，它的影响就不只是个楚门，往往是几个区，几个县都有影响，这不比修桥铺路更有好处，更受人尊敬吗？

一席话，说得土财主心悦诚服，五体投地。

几天后，王咏樵走马上任，当了东方第三任校长。这样，东方小学就有了五个地下党员：校长王咏樵，教导主任宋伯钦，教师李正之、钱启敏，校工林子梅。

王咏樵当校长以后，宋、李二位就可以更深地隐蔽下来，由校长出面去做上层统战工作。不久，王咏樵成了楚门镇上有名的人物。校长老太爷当然也沾了光，因此，尽管“肉疼”，钱还是照拿。这样东方小学既添教具，又添图书，还买了一套《鲁迅全集》。这对一所私立小学就很有样子了。

正在东方小学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轰！日寇一颗炸弹投进了东方的校园。

就在这年的四月间，日寇在坎门镇登陆，经常派小汽轮、小炮艇到离楚门三、四里的深浦头、小龙门、外圻陡门头一带侵扰，形势十分紧张。这时各校已经停课，商店也只开了一扇小门，农、渔、盐民很少上街，路上很少行人。惊慌、恐惧笼罩着楚门镇。

继十七日敌机轰炸“瑞平”货轮，扫射居民以后，十八日上午，警钟又响了，这时，镇上人已寥寥无几，而共产党员宋伯钦、李正之仍然坚守在东方小学。八时许，敌机在楚门上空盘旋不去，他们才走出校门，站在校南约百米的麦地里，突然敌机直

向学校俯冲下来，两颗炸弹从头顶落下，只听轰轰两声巨响，炸碎的瓦砾木片冲天而起，到烟消尘落，东方新大楼屹立如故，二人又惊又喜，连忙回到学校，只见七间平房全被炸毁，大楼也炸掉一角，厨房、仓库、图书室以及学校邻近的商会、育婴堂都已荡然无存。在愤怒中，两人默默地把被炸得散落在门外的学校的東西收拾起来，一趟一趟地搬进房内。

十点多钟，四年级的同学阮禾秀摇了一只小船来到学校，在阮禾秀的坚请下，宋、李只得乘了小船到塘垵阮家暂住。这时，阮家住满了逃难的人，二位老师趁此机会宣传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及我党的抗日主张。

敌机野蛮轰炸这一血淋淋的事实，有力地教育了全镇居民与全校师生，举镇抗日救亡情绪十分高涨，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及腐败无能更为不满。抓紧这个机会，李正之分别就国内、国际形势作了两次报告，从正面讲清道理，宣传我党的主张，师生评价很高。他还利用上社会课的机会，慷慨激昂地给学生讲“八·一三”淞沪战争时，上海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故事，也含蓄地讲到敌后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不断胜利的故事。下课铃响了，小学生含着热泪不愿离去，要求李老师讲完一个再讲一个。就在这一堂堂生动、形象的教学，爱国主义的种子已深深扎根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上了。

不久，在楚门的西青山上，有一群少年学生，不畏盛暑，不畏烈风，每天天不明就爬上山头，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战歌曲，多少居民从梦中惊醒，不由地被这群天真青少年的爱国热忱所感动。

东方小学与北盐场是同一个地下党支部，支书钱启厚是盐场

的职员，归宋伯钦领导的。李正之调走后，北盐场职员、进步青年周仁驹义务的接替李的职务。他不满足于仅在学校搞搞救亡活动，在他的积极活动下，“东方剧团”正式成立。周仁驹当了团长，他跟宋伯钦合作，编了一个《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抗战组歌，由钱启敏老师主演；还创作了一个《抗战小英雄》的独幕剧，由叶善龄等同学主演；另外还排演了一些少年儿童剧和舞蹈、独唱等廿来个节目。东方校庆那一天，学校张灯结彩，宾客如云，楚门倾镇出动观看“东方剧团”的汇报演出。后来，又在楚门附近作巡回演出。至此，东方小学声誉大著，不少家长纷纷送子弟来上学，以至有人满之患。

但是，对同学们教育最深的，还是那次罢课、罢教斗争。

事情发生在十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东方小学体育教师到北盐场俱乐部的球场去打球，被玉环县自卫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徐品三无理扣押，徐品三是条地头蛇，王咏樵当校长后，县、区、镇的机关都去“烧过香”，“拜过佛”，唯独漏“烧”了驻镇海寺的这个中队。徐品三认为“东方目中无人，看不起他，总想伺机报复。正好今天碰上这个机会，他寻衅闹事，行凶打人，这个体育教师就这样无缘无故被徐品三手下连推带打，绳捆索绑带到中队部关了起来。

这一事件，激起了全校师生极大的愤怒。在教师会议上，宋伯钦主张先礼后兵，先向楚门区长、镇长报告经过，提出无条件释放体育老师的要求，并要徐品三亲自送回学校，当面道歉。谁知徐品三根本不卖区长、镇长的账，扬言“奉陪到底”。这进一步激怒了广大师生。有的主张以通电方式通报县、区、镇以及所有机关团体，揭露徐品三的罪恶，呼吁各界声援，给徐品三以制

裁；有的主张请校董们在士绅中争取支持；也有的主张争取与楚门中心小学、玉环师资训练班两校师生联合行动，造成更大的声势。这些意见，获得一致通过，会后立即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三校师生慷慨激昂地齐集在楚门中心小学操场，举行了“声讨徐品三无理扣押教师的罪行的联合行动大会”。会议决定：三校一致罢教、罢课，会后立即上街游行。当这支几百师生的游行队伍出现在楚门街上时，许多平时饱受自卫中队敲诈勒索，欺压迫害的居民也自动参加了游行队伍，街上一时人声鼎沸，抗战的歌声此起彼落，抗议的口号前呼后应，整个楚门镇都沸腾起来了。

队伍到达中队部门口，要徐品三出来答话。随后高唱抗战歌曲：“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徐品三一见这个情况，吓得不敢露头。他不出来，队伍不散，徐品三害怕学生冲进来，事态扩大，担罪不起，立即撤回哨兵，关起大门。

三校联合行动后，一场全镇性罢市和全区性的联合行动正在酝酿，震惊了玉环县政府，县长以定邦怕事态扩大，急忙责成县教育科长会同楚门区长出面调停。三校联合罢教、罢课委员会派出谈判代表，提出四个条件：

- 一、立即释放被押老师，赔偿一切损失；
- 二、徐品三亲自到东方小学向全体师生赔礼道歉；
- 三、严惩打人凶手；

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侵犯教师人身自由、侮辱师生及居民的任何劣行。

徐品三只答应三条，要他亲自登门赔礼道歉坚决不答应。三校坚持四个条件必须全部答应，否则决不复教、复课。这样，双

方互不让步，罢教、罢课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徐品三被迫答应全部条件。这一天，东方小学校园里排列着全体师生和楚小、师训班的代表，徐品三由教育科长、区长陪同前来当面赔礼道歉，并找了几个小兵当了替罪羊，关了几天的禁闭，以示惩办凶手。从此以后，自卫中队再也不敢惹这些教师、学生了。

在同徐品三斗争胜利后当天下午，正下着暴雨，校董事长陈愚亭冒雨来到学校，陈愚亭对东方小学声誉大振、学生猛增，学校办得热气腾腾，表示满意，对同徐品三的斗争有理、有利、有节表示欣赏，对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表示赞同。最后他说：“在宣传上适当注意一下，不要太突出了。”

“有人说闲话？”宋伯钦警觉地问。

“有几个，主要是讲那个剧本。”

“剧本是宣传抗日的，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吗？”宋伯钦不介意地说，“上面怎么看？”

“问起过，我作了解释，没再说什么。”陈愚亭知道宋伯钦指的是县长以定邦，心照不宣地解释。“所以，还是小心点为妙，不过，你放心，我会留意的。”

这次谈话后，宋伯钦进一步相信陈愚亭掩护和支持我们的活动，态度是真诚的。不久宋伯钦在一次回校的路上劈面遇见了一个同乡人，在向组织上作了汇报后，地下党怀疑此人是特务，通知他准备撤离，派船来接他回乐清。

师生听说宋先生要走了，谁都依依不舍，特别是五、六年级的同学，可是，他的爱人“病重”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让他走。大家再三向他要求，希望他还回到东方小学来。宋先生言短意长地说：“后会有期。友谊的种子已经播下，正在生根、发芽，等

开花结果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相会的日子。”就这样，宋先生离开了东方小学。

宋先生走后，来了一个“大学生”，他就是乐清县芙蓉区的区委书记蔡熙，接过了郑梅欣的全部工作，还来了一个女老师周时静。新任地下党玉环县委特派员叶令良同志就以蔡老师的好友身份，以养病名义，住在东方小学。从此，东方小学就成为我党玉环县委机关所在地。叶令良化名王德明，除了领导全县党的工作外，也不放松做同学工作的机会。他常常给同学们讲“天方夜谭”。但他讲的“天方夜谭”与众不同，能从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故事讲到苏维埃政权，布尔塞维克的斗争，给同学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蔡熙利用业余时间组织高年级的谢劳、林有邦、阮禾秀、郑云卿等同学参加秘密的读书会，阅读“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等革命书籍，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那个敌机轰炸出来的墙洞，就被修成秘密书籍的藏书橱。他们还组织时事讲座、时事讨论会，吸收社会上的进步青年参加，利用各种活动方式和社会青年交朋友，宣传革命思想，扩大党的影响。因此，在楚门镇上自然形成了一个“东方之友”的圈子，很多青年在工余、课后，都积极参加东方小学组织的晚上歌咏队和星期时事讨论会等活动。

为了做好毕业生的工作，加强毕业后的联系，王、蔡建议成立“东方校友会”。在征得上二届毕业生支持和赞同后，“东方校友会”正式成立，推荐谢劳同学为主席，出版不定期刊物“东方校友通讯”，每逢寒暑假开展活动。

东方小学毕业的同学象革命种子撒向四面八方。王德明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基础上组织了地下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浙东青年救

国会楚门工作委员会”，吸收周仁驹参加，并由他去温岭县中介绍林有邦、谢劳等四人入会；一九四三年九月底，谢劳、林有邦、耿翔岗被吸收入党，成立楚门知青支部，谢劳任支书。知青支部以后又发展了郑云卿、丁世祥入党，为以后建立新的玉环区委、县委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原乐清地区党负责人之一的郑梅迪叛变，乐清县委通知所有隐蔽在东方小学的党员全部撤离。东方小学师生们对这么大的变动，莫不惊异，窃窃私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依依不舍地挽留这些朝夕相处，相亲相爱，诲人不倦的敬爱的老师。但是，不知什么缘故，隔不几天这些老师杳然不见了。直至一九四四年我们在乐清建立抗日游击纵队和解放战争时期建立括苍支队时，不少的东方小学同学参加我们武装斗争的行列，这时，他们才找到他们那些亲爱的老师，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东方小学创建于一九三九年春，结束于一九四四年春，前后虽只五年，但在地下党的抚育下，开放了灿烂的鲜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抗战前期，她是楚门镇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在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中，她是我地下党执行荫蔽精干方针的一个突出的据点。

东方小学五年，先后掩护了我地下党员郑梅欣、叶令艮、杨干、蔡熙、钱启敏、汤幼林、汤仲林、周时静等十余人。

她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党的队伍不断扩大。东方小学参加党的教师和学生先后共有二十四人。在人力、物力上给革命以很大的支援，在我们初建抗日游击队时，她输送武器长短枪七支，子弹四百发，捐助活动经费有二、三千光洋和法币；在解放战争期

间，东方小学同学大部上山参加括苍支队，成了括苍支队的骨干。学生阮禾秀担任过营长，林存邦担任过中队长，都在作战中英勇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东方小学不仅是玉环县革命活动的基地，也是南来北往的地下交通站、招待所，校内设有暗室，备有干粮、茶水、纸笔、书籍，三餐茶饭均由担任校工的地下党员张子梅、孙玉夫按时送入。因此，东方小学素有“红色堡垒”之誉。

当年东方小学学生现在参加工作的，据初步了解：担负县、团以上职务的有四十多人，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正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本稿承谢劳同志提供资料，作者附注。）

抗日游击战争在余上（中）

张 光

（五）重新审查五支队

陈平被捕逃回来，我又动员他去参军。我感到我在天元已有暴露，同时天元的住宅在街后，隐蔽虽较好，但不能做生意，坐吃山空，把仅剩的一点钱都吃光了。当时是靠王益生同志的五百元（储备币）抚恤金过活了。竺永惠同志说：“我们在吃老王的血哩！”是啊，烈士的鲜血哺育着我们，我们也准备随时以我们的鲜血，去灌溉革命的花朵。但我们决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我们必须善于荫蔽自己，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因此，我们决定于十月底迁临山，通过竺永惠的师兄雕花阿云，在临山东门头租了一间店面房子，开起小店来，主要是卖土香烟，自卷自卖。我们的香烟叫“金鸡牌”，竺永惠雕刻了一只大公鸡的木印，打在包装纸上。我们的交通员每次去嵊县，都带些嵊县烟丝回来。我们的“金鸡牌”由于烟丝较好，配方独特，竟卖出一点名气来了。这样我们的生活，勉强可以维持了。

搬到临山后，竺永惠同志调到杨思一同志那里去了，另调诸暨枫桥区委书记余能耕同志来我处任交通员。我化名为吴章生，

钟学意化名为陈铁我，余能耕化名为陈竹青，作为陈铁我的弟弟，叫我姐夫。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杨思一同志只身一人来了，我们对邻居说，他是我的叔父。喝稀饭时，陈铁我端出一碗盐炒花生米，风趣地说：“这是特地留着孝敬叔叔的。”杨思一同志笑着说：“真是深情厚谊啊！”他问铁我：“近来看点什么书？”

铁我答道：“西行漫记。”“唔，得读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现在是学习的好机会哩。真的，将来局面一打开，就没工夫学了！”杨思一同志这样嘱咐。

他问我，部队的负责人在哪里？我说：“现在部队的负责人叫吕炳奎，他跟五支队一起在慈北姚东一带活动，这里去大约有一百几十里路，这一带是三纵队的活动地区，通过肖张，可以联系到三纵队的负责人”。

老杨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先去三纵队，问他们二点：一、最近他们收到的中央文件是什么？二、最近他们学习什么？”

我就跑到长河区店桥路许元德同志家里，叫许元德送字条给肖张，不一会肖张陪着何亦达同志来了。何亦达同志与我是初次见面，我却直截了当地说：我想了解一些情况，你们最近收到的中央文件是什么？何说：最新的文件是《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两个文件的名称我还是初次听到，我又问：那么你们最近学习些什么啦？何说：就学习这两个文件哩。

我立即回去向杨思一同志汇报。老杨点点头说，对的，最近中央是这两个文件。老杨决定要我陪他去慈北找吕炳奎。因为要绕开据点，我们整整跑了一天，到道路头联络站过夜。联络站负

责人钱忆群同志，高兴极了，有说不完的话，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老杨叫她谈谈五支队情况，她谈了她去五支队的过程和所见所闻。她肯定五支队是咱们的新四军，不会错的。

第二天，我们跟一个通讯员去慈北海甸戎家，找到了吕炳奎同志。杨思一同志和吕炳奎同志谈了一个通宵。吕炳奎同志介绍了浦东搞游击队的曲折经验，和五支队的建立过程，以及和“江抗”取得联系的情况，还谈到了新四军在苏北黄桥胜利的自卫反击战，和敌人在苏、常、泰地区的“清乡”情况等等。最后吕炳奎同志表示，我们在浙东还不是发展方针，因为敌人仅占沿钱塘湾的几个桥头堡，随时有撤退的可能性。

经过这一夜的会谈，杨思一同志才确认五支队（包括三纵队）是新四军的地方部队，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因而正式确定了横的关系，并决定继续向部队输送干部，帮助部队开展民运工作和相应的统战工作，扩大税收工作（当时仅收货物税），以便逐步摆脱经济上对崇德部队的依赖（他们已经千方百计克扣我们了）。同时，部队也调个别适宜地方工作的同志到地方工作。这样，地方与部队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了。

（六）组织南进支队

和吕炳奎同志会谈后，杨思一同志就急匆匆地回嵊县去了。但到上虞的章家埠，被国民党的军队扣住了，企图诬以汉奸罪，把他秘密杀害，以谋夺他的几百块钱（这是部队支援地方党的经费）。正在危急关头，见一个军官走过，杨思一同志就大声叫喊，要求那个军官谈话。杨思一同志用事实有力地说明自己不是

汉奸，是无罪的。这样一来，影响扩大了，他们无法秘密处决了。同时，也许杨的话对军官有所感动，他带点讽刺味道的说：

“是啊，你是无罪的，可现在的时世，你带着几百块钱就是罪哩！”他把杨思一同志释放了，这是杨思一同志以后告诉我的。他摇着头说，这次真危险，这次真危险。

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到临山街上去买小菜，突然有一只手搭住了我的右肩，我回头看见一个高大汉子，他说，去，给我们去搬点东西。我立即意识到我被拉伏了。就拒绝说，不，我是做生意的，没有气力的。

“去，去，东西不重的。”他另一只手扭住了我的右臂，我知道我无法脱身了，便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得和家里说一声，——我的家就在东门头。

我被扭进我们的小店，钟学意和余能耕同时吃惊地站起来，我就说：“这位先生叫我去替他们部队搬些东西。”

能耕同志立即对大汉说，那不行，我姊夫是文人，没有力气的，还是我代姊夫去好。你看，我不是比姊夫棒吗？说罢，他挺挺身。

大汉打量了一下能耕同志挺直结实的躯干，点点头说：好，行！能耕同志就跟着大汉去了。过了三天，第四天下午，能耕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来了。他说，这个部队是国民党的三十二师，向嵊县方面撤退，一路上开小差的很多，到第三天晚上，他也乘机把背着的重机枪架子，丢进柴窝里逃回来了。他认为这个机枪架子，将来还可以去找回来的。他几天几夜没有好休息，困乏极了，吃了饭，倒下身就睡着了。这时，突然五支队送来通知，说宁波、余姚各据点里的鬼子，大量减少，估计敌人可能要

撤退了，要我迅速查明绍兴方面敌人的动态。

我把能耕叫醒，把部队通知的内容告诉他，他立即坐起来说，我连夜赶到绍兴去。第二天，能耕回来了，他说他到绍兴孙端，找到了马青同志，情况立即弄清楚了，敌人不是撤退，而是大举进攻。诸暨已再度沦陷，据说敌人已进攻到金华、兰溪去了。

能耕一面说，一面又倒下身去，想睡觉了。我说，这个情况，必须立即送给部队，部队在等我们的消息呢。能耕侧身卧着，沉默了数秒钟，突然翻身坐起来说，我立即就走。他下床，吃了些剩饭，就上路了。又过了三、四天，他回来了。他说：他第二天傍晚就赶到古窑浦了（临山距古窑浦约二百里），部队已经上船了，得到我们的报告以后，部队离船重新登陆了。

他说着，又躺倒在他那张小板床上了。这一躺下，有四、五天不能起来，他跑得脱力了。

这时，杨思一同志又来了，他就是为了这个新情况赶来的。他说，敌人已突破金兰线，进迫江西上饶，他认为敌人的战略意图是打通浙赣线，企图与长沙沿粤汉路南下之敌会师，控制整个东南沿海，以策应太平洋战争。

我陪着杨思一同志到道路头，找到了吕炳奎同志。吕炳奎同志又找来了三纵队政治负责人王仲良（即王耀中）同志共同研究。根据杨思一同志提供的情况分析，估计敌人将全面占领浙东，浙东游击战争的发展时期到来了。于是决定成立“南进支队”，挺进到会稽地区去开辟游击区。并具体决定，从五支队，三纵队各抽一部份人枪；朱之光同志的六中队，全部参加，由蔡群帆、黄明同志负责率领，杨志渊同志作向导和联络，经嵊县挺

进到诸暨去。

部署定后，杨思一同志即先回会稽去布置动员全党，发动群众，迎接“南进支队”，以配合开辟会稽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诸北的四乡联防队（后来发展为八乡联防队）、义乌的八大队，就在这时候先后建立起来了。“南进支队”到诸暨后，又称三支队，与八乡联防队一起，不断打击敌人，连连获胜，纪律严明，群众称他们为“三八部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八部队”奉调参加三北自卫战争。诸暨党和人民，以十几名痊愈伤病员为骨干，重新又建立了一支部队，就叫“小三八部队”，后来和义乌八大队一起，发展成为金萧支队。

（七）一次重要的会议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天左右，王仲良同志派人通知我，速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大约于八月十二日傍晚到达慈北鸣鹤场。王仲良同志对我说：“中央决定我们浙东要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了，现在中央派谭启龙同志来，明天开大会，要成立浙东区党委，所以要你来参加大会。”

我问：“特委书记杨思一同志来了没有？”

仲良同志说：“派人去通知了，但估计他这次赶不到了。”我感到有些尴尬，便说：“没有特委的通知，我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吗？”

王仲良同志就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连中央来的，你都不相信？”

我没有说话，但我想：我们之间只是横的关系，你又没有给

我看中央文件或电报。这符合秘密工作的组织原则吗？

我看到来了许多干部，但极大多数我都不认识。我想：这样大的事，总不至于是假的。且看会议如何进行。

第二天下午，大会开始了，谭启龙同志一上来就说：今天正好是“八·一三”抗战五周年纪念日。他叫大家起立，向在抗日战争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念致敬。接着分析当前形势，记得主要内容大致如下：一、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企图控制东南沿海，以声援太平洋和卫护其本土安全，最近对浙赣路和粤汉路的进攻，就是这个意图。但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撤掉一些据点，这就给我们一个发展的机会。二、日寇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边打边拉的诱降逼降政策，因此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危险，依然存在，特别是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政策是一致的，因此敌、伪、顽随时可能勾结起来，联合进攻我们，这就决定了敌后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

接下去谭启龙同志宣布中央关于建立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定。由于浙江省委已遭破坏，中央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张文碧为委员。

同时宣布成立部队的司令部，何静（即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委，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刘亨云为参谋长。为了灰色荫蔽，不刺激国民党，部队仍沿用：“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番号。当时何克希同志还风趣地说：薛天白不要这块招牌了，这块招牌对我们倒还有用。（因为当时薛天白的部队已改称崇德部队，成立崇德指挥部，薛自称指挥官。）于是我们就称“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司令部”。会上是这样宣布的，后来也许因为这个名称太长了，就略去了“淞沪游击队”五字，成为“第三

战区三北司令部”。不称浙东而称三北，也是为了缩小目标，减少刺激。同时也因为三北是我们的立足点，当时有句口号叫做：

“立足三北，背靠苏北，面向四明。”整编部队，主要是把“三纵队”改编为“四支队”，由吴建功任支队长，朱人俊任政委。其他三支队、五支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

为了扩大军队，我们在姚北动员了百余人，由肖张带队去参军，肖张任指导员。他于一九四四年在鄞西后杜桥战斗中英勇牺牲，牺牲时，确实是很英勇的。当战斗到最后时刻，他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装进饭包袋，作为最后的党费，叫通讯员送到后方去交给上级，通讯员不肯离他去，他命令通讯员立即撤退，自己拿起步枪冲了上去。……

大会还宣布成立三北地委，王仲良任地委书记，张光、金如山、谢仁安为地委委员。重新划分三北地区为三个县，从姚城经周行到庵东的公路为界，公路以西直至曹娥江边，（其中包括姚西和虞北两地区。）成为余上县。公路以东的姚东和慈西，划为慈姚县。慈东和镇北划为慈镇县。张光兼任余上县委书记，谢仁安兼慈姚县委书记，金如山兼慈镇县委书记。

王仲良同志还召集我们开了一次地委会议，研究分工和开展工作问题：张光负责组织，金如山负责统战，谢仁安负责民运。研究恢复党委制问题，由于缺乏干部，除我们三人分别兼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外，县委班子一时建立不起来，区委更不要说了。虽然敌人为了进攻浙赣线，撤去了一些据点，而反动派的游杂部队和伪军，倒反嚣张起来了，到处奸淫掳掠，反共、反人民，地方党仍然处在灰色荫蔽、单线联系的状态中。

（八）坚持敌后反扫荡

大会以后，我回临山，联系了上虞县工委书记朱加铭同志，向他传达了区党委成立大会的情况，和建立余上县委并要他参加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决定。然后介绍他去见过王仲良和谭启龙同志。但县委除我们二个人外，肖张参军去了，其他干部一时配备不起来，而形势也并不妙。由于三纵队调到东面去接受整编，在余上地区，我们的力量反见空虚。国民党的游杂部队，（群众叫它游吃队、或烧毛部队。）却十分嚣张起来，到处抢劫掳掠，（盘据临山的鲁杰部队，乘周行敌人撤退之机，倾巢出动，去周行大抢一番。）强奸妇女，强娶老婆，捕杀我财经工作人员。八月以后，敌人停止浙赣线的进攻以后，敌后据点有所恢复和增设，余上地区，除恢复周行、庵东等据点外，还增设了泗门据点，一时，形势更恶劣，我们的工作更难开展了。鉴于这个情况，我再到东面去，向上级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

九月上旬，天气仍然十分灼热，我以一个小商贩的打扮，把一件纺绸短衫，搭在右臂上，只穿一件汗衫，左手挥着黑纸扇，走到道林镇，我远远看到路尽头的一座石桥上，站着一个哨兵。开头，我以为是我们自己部队的哨兵，因为道林镇一直是五支队的活动中心，但越走近越看样子不象，可已没法避开了。左右两边，都是碧澄澄的湖水，没有叉路，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去。一个独只眼的，一付流氓腔的忠义救国军，拦住我就问：干什么的？一伸手就把我的纺绸衫夺了过去，另一只手往口袋里掏，就这样我被他足足纠缠了半天，到头来还是不准进道林镇，只得到

樟树庙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出发，向东走到鸣鹤场西口，又碰上岗哨。这时，过往的人较多，哨兵正拦住一批人在检查，我趁机悄悄地溜了过去。我正庆幸逃过了这一关，忽见前面有二个军人向我走来，一个背步枪，一个没有枪的显然是个军官。他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但他并不听我的回答，而是一个劲地向我身上抄啊摸，又叫我把布鞋脱下来，把鞋帮捏了又捏，想在鞋子上捏出什么东西来，然后他叫我跟着他走到哨所，把哨兵掉换了，又叫我跟他回到队部，他坐下来审问我了。

“你老实说，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樟树庙！”“樟树庙？你不是本地口音。”“是的，我是诸儿人，我在樟树庙和朋友合伙做线生意的。”

“好，我叫几个樟树庙人来给你认认。”他就叫来了两名青年士兵，我当然不认识。这两个小鬼就拼命的追问嘲弄我，我不便多说，就问那军官：“你们是什么部队？”“我们是什么部队不要你管。”“我估计你们是一支队！”“我们是什么支队，不用你问，我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是五支队的，我昨天在道路头被忠义救国军扣住，……”“你真的是五支队的吗？那么我问你，五支队支队长是谁？”“连柏生，但在这里负责的是林友章，最近还来了张席珍。”

他不问了，拿起笔来，我看他写：

“友章兄，有可疑人一名，自称是你支队的人，特送你处理。”

他派了一名战士，把我押送出去，走了数十步，我远远看见肖张，就快步走上去大叫：

“肖张！肖张！我被一支队扣住了啦！”

一支队的战士就把条子交给肖张，肖张看了看，扯下一角，写了“收到”二字交给那战士，就带着我去见谭启龙同志。

我向谭启龙同志汇报了情况，又去向王仲良同志汇报了情况。因为我分工负责地委组织工作，王仲良同志一定要我搬到东区靠近他去住。他说：“余上的工作交给朱加铭多负责好了。”

我回临山，走到距临山仅三里路的湖堤时，又被三十三师扣住了。这次我有经验了，我拿出二元钱，叫一个小青年去通知我家里托人来保，不一回雕花阿云来把我保了回去。

我向朱加铭同志作了交待，并把“金鸡牌”这块印版交给他，叫他继续坚持西区工作。我和陈铁我、陈竹青三人，于十月初搬往道林。由岑六生同志介绍到双桥二九房，租一间楼房居住，我化名为张生光。

双桥距道林镇约三华里，距王仲良同志的老家王家埭也不过三、四里路，但仲良同志随军队行动，我们仍然难得见面。

敌人停止进攻后，企图巩固后方，同时配合秋季抢粮，因即发起“大扫荡”，我军进行反扫荡。十月初在蜀山渡首战告捷后，接着大战杨葛殿。我军控制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狠揍敌人，敌伤亡很大，据群众反映，敌人从三七市运走的尸体达二十二具。接着又在竹山岙伏击敌人，又获胜利。

为了减少消耗，保存有生力量，在反扫荡三战三捷后，谭启龙、何克希等同志，率三、四支队及区党委、司令部的机关人员，转入四明山区。由参谋长刘亨云同志率五支队，坚持三北，继续不断打击敌人，并在东埠头附近的三九房全歼伪十师的一个营。

随着反扫荡取得胜利，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了，我们即以姚山工作队为主力，开展民运工作，并动员群众交军粮，这是我军首次征收军粮。由于我军的实际行动和工作队的宣传作用，群众认识到建立根据地的意义，而且相信我军不会走了，信心高了，缴粮也踊跃了。

（九）三北自卫战

为要迎接发展形势，准备恢复支部工作，我与朱加铭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这个短暂的稳定时间，开办一个支部书记训练班。从姚西、虞北（即余上地区）抽调十几名原来任过支书和可以培养为支书的同志，于十一月廿五日，到双桥二九房（即我的新居）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我正在道路头办事处帮助工作，突然有一支国民党的部队，占领了逍林镇。我们不知道它的性质和来意，也不知道它的番号，我立即召集办事处负责人钱忆群，逍林区委书记陈竹青和杜琍同志，商量对策，决定宰一口猪，买一担酒和香烟等，由办事处主任宋人元同志为代表，杜琍同志充秘书，去慰问他们，并以联合抗日的大义相试探，以观动态。

晚上，朱、杜二人回来说：“这个部队是从对江（指钱江北岸）来的，自称国民党金山县自卫队，看来人数不少，但无法知道确数。他们的首领叫张立民，是国民党金山县长，这个人年纪不大，看样子有些干练。他对我们提出联合抗日的意见避不作答，却恶狠狠的说：“你们擅自设卡征税，是不允许的。”

“鬼子在这里扫荡掳掠时，他们在干啥？”有同志气愤地

说。但尽管气愤，可我们身边无一兵一卒，办事处平时对群众是公开的，这个地方，现在是很不安全了，决定连夜转移到双桥去。

第二天上午，情报不断传来：反动部队在道林街上开始抢掠了，把我军委托加工的棉军装，也全部抢去了。在直浦乡逮捕我财经工作人员，还传说有被杀害的。

我们的主力已经转到四明山去了，这点我知道。在三北，是否还有我们的部队，我不清楚。王仲良同志也联系不到。

第三天下午，反动派向双桥方向掳掠过来，双桥周围的小村庄，都被掳掠到了。看来双桥也很难幸免了。双桥的地形，又好、又很不好。它有一条河，把整个村子团团围住，象一条护城河，河两岸和村子里，密密麻麻的树木，远远看去，只是一片林地，看不见村子。在东北角上，架一座二条石板的石桥，是唯一的进出口，这地形，好的是十分荫蔽，即使到了河边，见到村子，一时找不到那座双桥，也无法进去；但缺点也在这里，如果这座桥被敌人发现，我们就将成为瓮中之鳖。

我们在双桥堆放着二万多斤粮食，我们连通讯员共八、九个人，男女各半，有一条打不响的步枪，有二、三颗手榴弹。如果敌人冲进来，我们是无法抵抗的，转移已经不行了，因为周围都是敌人了。正在危急的时候，忽然听到东南角上枪声大作，我们很高兴，以为我们的部队到了，但密集枪声时间很短促，慢慢的稀少下去，终至沉寂了。我们马上派人出去了解情况，据说是慈溪国民兵团打的，这是“狗咬狗”。但反动派已缩回道林镇去了。以后几天，反动派只在道林镇上骚扰，不再出来，但也不走。

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了，我正担心我们的支书训练班，能否如期开办起来。朱加铭同志先到了，以后学员也陆续到了。我们觉得这个地点很不安全，但也找不到另外可靠的地方就决定仍在这个地方开办。由我和朱加铭同志讲课，主要课程是“党的建设”，着重讲支部工作和如何发展新党员，以及统一战线、武装工作等讲了两、三天课。大约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傍晚，天刚有点暗下来了，突然，部队的一名通讯员送给我一张条子，叫我立即去游源参加军事会议。我就跟着通讯员直奔游源，走进司令部，灯光下见满屋子的军事干部，中间台子上，两盏桅灯旁边，坐着谭政委和刘参谋长，何司令正在讲话。他见我进去就问：“反动派总共有多少人？”我答：“一千五百多。”何司令说：“不对，总共在二千人以上。”他接下去说：敌人虽然数量多，但部份庞杂，有忠救军和金山、平湖等县的自卫队，成立联合指挥部以艾庆章为总指挥，张立民为副指挥。指挥不统一，有利于我们各个击破。何司令继续分析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我军的许多有利条件之后说：三北是我们必争之地，我们是“背靠苏北，立足三北，面向四明”嘛！这一仗必须打，我们准备付出五十个人的代价，他把右手五指竖了竖，然后捏紧拳头一挥，说：我们必须打赢这一仗。

接着谭启龙同志讲话，他补充了我军必胜的有利条件，其中我感到特别新鲜的是他说：田胡子的八十八团刚投敌，敌人要消化它，一时无暇他顾。田胡子，八十八团，这是我初次听到的，后来有同志告诉我，田胡子名叫田岫山，是八十八团的团长，由于蒋介石翦除异己，把他们的师长杀了，八八、八九两个团，逃到四明山来了，我们就和他们联合抗日。不久，田胡子投敌了，

不过在投敌时，他向何司令打过招呼，说是“假投敌，不信，以后看好了。”

最后，谭启龙同志号召：当前，一切要服从军事，地方党要动员一切力量，密切配合部队。说到这里，他盯住我问：“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在办支部书记训练班。”

“你的支书训练班立即解散，叫他们回去，发动党员和群众，监视敌人，报告敌情，捕捉敌特，一切要为自卫战争的胜利而奋斗。”

我回到双桥已是半夜光景了。我把朱加铭同志和学员们都叫起床，扼要地传达了军事会议情况，决定训练班立即解散，叫他们连夜回去，积极准备配合部队行动。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听到道林镇的敌人已向坎墩方向撤退了，下午，我军从游源下来，我就随军经过道林镇，进驻坎墩，没有找到敌踪。第三天（三十日）我单身一人，一早出发，经过天元、长河，均无敌踪，我到四塘店桥路支书许元德同志家里，他刚从支书训练班回来，告诉我，张立民部就在西面小安街、登州街、周家路一线。我立即奔回坎墩，部队正在开饭，我向何司令、参谋长报告了情况，何司令说：情况和参谋处侦察到的完全一致。饭后，部队集合，立即出发，此时，我发现慈溪国民兵团也在一起，原来慈溪国民兵团早已被我军所改编，并派周迪道同志任副大队长，掌握整个部队了。

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悄悄前进，约九时许，我跟司令部进入店桥路。部队在村口的晒谷场上站队时，许元德同志来了，他小声的说，敌人有一名副官，带一个勤务兵，傍晚时来本

村看房子，声言明天要进驻本村了，现在这个副官，住在保长家里。

由许元德同志带路，立即逮捕了这个副官，从他的身上，搜出一份当日的通报。从通报及俘虏的口供，对面前敌人的部署，了解得一清二楚了。而且还得到了敌方当晚的“口令”。

我们进屋坐下不久，一个通讯员送一份报告来，报告是左翼“南进支队”的蔡群帆同志送来的。内容大意是：我支队刚到三塘驻下，忠救军一个排，窜到我步哨线上，问：你们是张司令部分吗？我哨兵十分机灵，即答道：是的，是的，你们是那部分？……噢，自家人，自家人，请到里面去休息。就这样，不发一枪一弹，就把这个排全部俘虏了，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二支。并抄到派令一纸，内容是，得悉‘共匪’西来，兹派你排前去配合张司令，伏击‘匪军’。战斗还未打响，先获得了这样的小胜利，大家高兴了一阵。忽然北面响了一阵枪声，侦察员侦察回来说：是段头湾我五支队的步哨上，发现几个人，打了一阵枪就跑了。我不懂军事，怕敌人发觉我们，又连夜溜走了，心里很急，就问参谋长：“还不进攻吗？”参谋长一本正经的说：“情况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进攻？”我很奇怪：“情况还不够清楚吗？”

“清楚什么啦？”我不敢多问了，同时由于连日奔波劳顿，胃病发作了，痛得厉害，便倒下身睡了。正在朦胧中，不知谁推了我一下，我立即起来，跟着大家往门外走，天已黎明，何司令、参谋长等都不见了，大概已经到第一线去了。我跟司令部机关人员，主要是医疗队的同志一道走了几分钟，突然听到前面枪声大作，我们就跑步前进，我们跑到小安街村口的一条土堤上，枪声停了，接着南面、西面又响了几阵枪声，然后沉寂了，一批批的俘

虏押下来了。战事胜利结束得这样快，出了我的意外。除张立民本人带了一个班逃脱外，其余五百余人，全部被俘，我军无伤亡。缴重机枪二挺，步枪数百条，据说还有几门迫击炮。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我军的斗志。

俘虏和枪支，由慈溪国民兵团负责押送到三北的中心地区逍林去了。

晚上，我军转入山区，在鸚山、夏家岭一带宿营。次日（十二月二日）部队休息，一面侦察敌情。我因胃痛，也不出去。三日上午，朱加铭同志来了，但他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三日下午，我军从鸚山出发，向虞北挺进。当先头部队出黄家埠时，突然遭遇了敌人，这是艾庆璋的本部，战斗到天黑，艾部已被我军包围，但天黑以后，却被他们溜走了。这一仗各无伤亡，也无缴获。

又不知敌人的去向了，我和朱加铭同志走进司令部，谭、何、刘三首长，正在热烈讨论。何司令见我们二人，命令我们必须连夜查明敌踪。我和朱加铭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二人同去夏家支部，通过支部同志以探亲访友的办法，连夜渗入到邻近各村去探听情况。终于查明敌人在上塘回龙寺一线。拂晓时，我们回到黄家埠司令部报告，早饭后，司令部即进驻夏家，部队分二路进攻上塘和回龙寺。这天战斗较激烈，整整战斗了一天，敌人向西溃退，我军追击，一直追过五车堰、马家堰，直至小越。天黑才收兵，这天毙伤敌甚多，我军亦伤亡十余人，俘获敌人枪数十，艾庆璋部基本被击溃，向西逃跑了。

当时可能顾虑鬼子袭击我们，我军就连夜回临山宿营。后来了解，这一仗打得鬼子也很震惊，泗门据点连夜撤走。

在临山休息一天，谭启龙同志代表区党委叫我和朱加铭同志留在临山，建立余上县委和余上办事处，由我任县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朱加铭同志任副书记兼副主任。部队就向东回去了。

但是过了几天，溃散的艾部，又集结起来了。而且依附了太湖强盗王百美部（王百美真名王百器），对我们的威胁，又日渐增加，群众也很害怕，我们的工作根本不能开展。我再去道路头汇报情况，于是，由朱人俊、张季伦等率四支队重来余上，进行了小越战斗，谢塘战斗，把艾庆璋一直追击到曹娥江边，艾庆璋逃过了曹娥江，从此不敢再来了。

特别是盖北（华盖山北）战斗，把王百美部基本歼灭，并俘获了平湖县长谢友生，“大名鼎鼎”的双枪王百美，躲进了草堆，得以幸免。以后经过谈判，我们释放了谢友生，他们就逃回钱江北岸去了，从此也不再来了。

至此，三北自卫战，才彻底取得了胜利，整个三北的局面打开了。

（待续）

一九四〇年嵊县党组织情况 及“六·三”斗争

杨 源 时

抗日战争初期，嵊县是浙东重镇。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杭州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先撤退到了金华，以后又撤退到了永康的方岩及丽水。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总部退到了金华。杭州市及杭嘉湖地区的一部分难民逃到嵊县暂时安家，有一些工商业资本家就在嵊县开张营业。杭州的清波中学，慈溪县的锦堂乡村师范及宁波中学，也先后迁移到了嵊县的长乐一带继续办学，加上国民党在嵊县增设了一些军政机构及交通运输事业，使嵊县的人口猛增至五十万人。

由于肖山、绍兴、诸暨等县成了前线，特别是一九四〇年日寇渡江占领肖山以后，浙赣线受到严重威胁，嵊县更成为联系前后方的交通枢纽。从丽水、金华两地分别经过东阳通向宁波海口的公路线都经过嵊县。许多战争物资及商品，在嵊县装卸，利用航船及竹筏，经水路转运到曹娥、上虞、余姚、宁波及绍兴等地；向新昌、台州方向运输的物资亦以嵊县为转运点。嵊县、甘霖、长乐，三界等城镇，特别是嵊县和长乐，呈现出一派战时虚假繁荣景象。

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

我们党十分重视嵊县的工作。邢子陶、张桂清、顾玉良、袁雨田、张珂表、丁友灿等同志在建立和发展嵊县党组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底（县委书记王正山）全县党员已发展到三百多人，一九四〇年又陆续发展到六百人左右。党员的主要成份是贫下中农，也有一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在缫丝厂、织绸厂、印刷厂、北山茶厂、交通运输业、理发业、制鞋业及商店职工中，都有党的组织。知识分子党员中，有一小部分出身于剥削家庭，他（她）们中的大多数不仅能积极地为党工作，而且还在党困难的时候，给予党经济上的援助。

一九三九年，中共宁（波）绍（兴）特委为便于领导，在特委下设立了诸暨、余姚、宁波、嵊县四个中心县委。嵊县中心县委领导嵊县、新昌两县工作。一九四〇年嵊县中心县委的成员是：书记杨洛桥（源时），委员、组织部长裘祖恩（陈布衣），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竺曾撰（后牺牲于四明山），委员、民运部长赵礼冉（赵虞），委员、妇女部长张月珍（她是特委妇女部长），县委妇女工作委员会成员为郭雪聪、袁楚珩、杨月影、张喜勤、郭韵琴，县委青年部长周肇基，县委青年工作委员会成员为徐巴盾、应晨企（女宁中中学生）。新昌县工委书记先是魏相生，后是傅志评。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宁、绍分家，嵊县中心县委撤销，嵊、新两县县委都直属绍兴特委领导。

根据党员分布情况，全县设立了七个区委，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的有张仁奎、徐巴盾、钱章平、吴载琴（女）、竺柏青、竺

见山、张增焕、郭雪聪（女）。三界北山茶厂及几所中等学校中的党组织，由县委直接领导。

中心县委机关最初设在现建国路一弄七号陈午韵（静之）家中。陈午韵在党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战线及青年中做了很多工作，在县内外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抗战初期，他的家一直是党与非党进步分子联系、住宿的地点。陈午韵、丁水珠（党员）夫妇以自己的收入接待省委、特委及外地来的许多党员同志。有时开不出饭，袁楚珩（周瑛、女）、杨月影（女）等也给予经济上的支援。因陈面目较红，不适宜作秘密机关，县委就迁到吴公庙内。“六·三”斗争后，又迁入谢安芬家，谢安芬是周肇基的初小班儿童，她是国民党司法部长谢冠生本家，父亲已去世，家中只剩下寡母及祖母、外祖母。三个妇女或年老，或有病，足不出户，不问政治。我是以新闻记者身份住进去的，后来我爱人唐友清担任了小学教师，有公开职业，她们就完全信任我们，相处得比较好。她的家，在孝子坊和周武弄之间的小弄堂里，比较隐蔽，我在这里刻钢板，印文件，开会、接待省委、特委领导同志，一直很安全。

特委机关设在西乡。特委书记杨思一，经常住在屋基村邢子陶同志家中，宣传部长顾春林经常住在坎流村邢传炎（佐贤）同志家中。为了掩护特委机关，邢传炎担任了联保主任和坎流小学董事。坎流小学完全掌握在党手里，校长周陶（柏生），教员郭韵琴、蒋仲华、冯建白都是党员，有时县委也在这里开会。特委在嵊县东乡丁友灿同志家里设了个工作点。丁友灿原是县委领导成员，一九四〇年特委要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担任保长掩护特委工作，同时在中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杨、顾两同志路过东

乡就住在他家里。另外，由郭雪聪、邢莲卿出面在开元、太平两地办了妇女合作社，内部工作人员大都是党员，张月珍就隐蔽在这里。这个合作社对外是个商店，实际上是特委和省委以及各县县委的联络机关，县委也在长乐开了一爿饭店，叫金甬食堂，由平涛负责，是县委的秘密联络点。

为了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县委在这年春季在施银村施一鸣同志家中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各区领导干部及党员骨干几十人。学习内容有：目前形势与任务，党章和党的秘密工作守则。这期党训班对加强党的建设起了一定作用。

党采取各种办法在群众中做宣传、组织工作，根据上级党的决定，我们通过各级党组织在城乡各地张贴、散发了党中央一九三九年发布的“七七宣言”，这是一次全省规模的统一行动，党在这篇宣言中针对国民党秘密发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一系列反共、投降活动，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揭露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共产党，分裂抗战队伍，企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还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及民间团体开展党的工作。抗战初期，在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下（张珂表、陈午韵任抗委会委员、政训组干事）组成了两个群众宣传团体，一个叫流动宣传队，主要在乡间活动；另一个叫业余宣传组，主要在城区活动。这两个组织，名义上都属于国民党党政机关领导，我们提出“挂国民党的牌子，做共产党的工作”，派了一些党员参加进去，在其中建立党的工作。章文君、张欣苗（张朗）汪维

城、钱松泉、赵大葆、尹仲芳（俞林）、袁楚珩、杨月影、沈天麟（钟麟）等同志分别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他们在城乡各地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演戏、化装宣传、慰问伤兵、募集抗日捐款、宣传二五减租和发展生产，举办民校识字班（又叫台门教育）等等，对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党在这里面吸收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的组织。

一九三八年黄绍竑为推行他自己颁布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也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与中统、军统抗衡，在省、专区、县三级政府机关下设立了政治工作队。原来参加“流宣队”、“业宣组”的党员同志及进步青年有一部份转进嵊县政治工作队，并在里面担任了中下层领导骨干。党在政治工作队内建立了两个支部，由赵礼冉统一领导。国民党嵊县书记长俞美四与县长方志超有矛盾，俞为了与方志超争夺青年，在城区组织了一个“战时青年工作队”，我们也乘机把一些党员派了进去。党以合法斗争形式，利用这两个组织，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中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浙江的中统及反动势力，污蔑各地政治工作队是共产党控制的赤化组织，在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决定解散各级政治工作队，改为青年服务队，归各级三青团领导。这年七月，嵊县政治工作队和其他县政工队一起被解散，改为嵊县三青团领导的青年服务队，并强迫政工队员加入三青团。党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已经红了的党员全部撤出，转向小学教师阵地，在基层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党取得了一批学校的领导权。竺巧英与袁楚珩到了东郭小学，在东郭区委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后来竺巧英在四明山牺牲，是个刘胡兰式的英雄），“青年工作队”也因

受到反动派的破坏而被迫解散。

党十分重视在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嵊县中学建立了一个党支部，有十多名党员，支委成员是王生基、金冠雄、汪湘琴。党员黄胜德、裘愉堂后来牺牲在四明山。党员作家骆宾基及徐巴盾在这里做了不少工作，当晨企同志在宁波中学，钱章平同志在清波中学，张丽笙（佐毅）同志在锦堂师范也都做了不少工作，宁中及锦师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大资本家汪正金有个兄弟叫汪正铤，爱好体育，于一九三五年组织了“星峰体育会”，自任会长。这个体育会有篮球、足球、排球各项设备，经常与县内外体育队进行比赛，在浙东有一定影响。抗战时期，我们党就通过一些爱好体育的党员，如竺曾撰等同志参加进这个体育会，利用这个历史悠久的民间团体从事抗日、进步活动。一九四〇年当反共活动进一步加紧时，我党又通过汪正铤在体育会下建立“星峰剧团”，将原“战时青年工作队”中一些从事宣传、戏剧的党员及进步青年转进去，在城区公演过“魔窟”、“江南恨”及“古城的怒吼”等大型话剧，有些戏是在“六·三”斗争以后白色恐怖下公演的。党在嵊县领导的革命戏剧运动在浙东有较大影响。沈天麟、周肇基、周新娥（女、陈苇）等同志是这个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

当时嵊县的青年工作是很活跃的，在革命运动中确实起到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

省委、特委十分重视嵊县的青年工作。省委青年部长郑嘉治，特委青年部长邵明，经常来嵊县检查帮助工作。

为了宣传抗日及马列主义，张珂表发起于一九三八年在城关开办了“群力书店”，代销“新华日报”出售生活、新知等书店

出版的进步书籍，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被国民党关闭后，又办了“国际文化服务社”。一九四〇年党又在长乐办了“长风书店”，出售“浙江潮”、“战旗”等进步刊物，成为向宁波中学、清波中学、锦堂师范广大师生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些书店都曾经一度作为党的联系机关，在这些书店工作的有薛仲三，钟德风、石磊等。

省委、特委对绍兴地区的工人运动十分重视，指出：嵊县的产业工人、绍兴的箔工、船夫，余姚的盐民及各县失业工人、交通工人、手工业工人有六、七十万，要求县委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省委职工部长陈雨笠同志曾经两次来嵊县检查帮助工作。嵊县的产业工人，每天只有五、六角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每天劳动时间都在十三小时以上。厂方无理禁止工人出厂，不准工人参加抗战活动，甚至不准工人识字。广大工人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参加抗战活动。我们抓住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及“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上有关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组织工会的规定，领导工人组织工会，为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生活待遇而斗争。我们还以识字班、研究会的形式组织工人学习，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我们在失业工人中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有一些从上海回来的产业工人成了党的领导骨干。

嵊县党员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中，女党员比较多。县委组织这些女党员在广大劳动妇女中进行了大量工作。一九四〇年二月，国民党浙江省妇女会发布了纪念三八节的通知。中共绍属特委妇委会决定利用这一通知的精神，在绍属七县开展三八妇女节活动，教育广大妇女参加到抗战、团结、进步的运动中来。特委还提出要在县际之间开展工作竞赛，叫我们绣了一面锦旗以奖励优

胜者。为了大规模地开展这一活动，我们利用县政工队这个组织形式，把公开号召和秘密党组织自下而上的发动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我们在县政工队内有一个妇女支部，有竺巧英、王芸蓉、袁楚珩、钱秋城（钱辉）、郭韵琴、郑兰娟等六位同志，袁为书记。根据党的指示，袁、王两同志向县政工队长提出了纪念三八节的意见，在取得同意后，就组织力量分赴各地，利用政工队这块牌子，在三八节那一天，与当地党组织配合，广泛发动，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城区召开了妇女问题讨论会，东乡东坂庄（区委书记张增焕住在这里）、东郭、官地、朱湖山等地及北乡三界、沙园等地分别举行了群众大会和妇女识字班座谈会（全县办妇女识字班三十余处）。崇仁周围发动了一千多妇女（包括缫丝厂女工、女教师、女学生、农村妇女及崇仁镇各界妇女）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西乡长乐、太平、开元等地也开展了纪念活动。

“六·三”饥民请愿运动

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发动的饥民请愿运动，是嵊县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一九三九年嵊县是个好年景。秋收以后，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勾结官府，利用逼租、逼债、逼捐的机会，压低粮价，以每担六、七元的价格从农民手里购进大量粮食，囤积居奇，谋取暴利。一九四〇年春节以后，粮价逐日飞涨，到五月底六月初，竟涨到每担六十六元，而且有钱无米。浙江省粮食管理处在嵊县有个办事处负责向省内外采购粮食，通过“粮食公卖处”以平价

每担二十五元的价格出售给人民。但是这个官办的“粮食公卖处”也是有价无米，和奸商勾结一起，哄抬价格，发国难财。许多衣衫褴褛的农民半夜就到“公卖处”等候，每天都是等到中午空手回去。麦收以后，灾情不仅没有减轻，而且继续发展。当时在宁波中学担任教师的吕漠野根据诸暨、嵊县的见闻写了一首诗歌，题为“打大麦”，登载在当时的《东南日报》上。歌词写道：

“打大麦，打大麦，大麦打得头二石。往年大麦饲猪猡，今年大麦人要嚼。请问大麦啥价钱？阿哥，告诉你来勿可吓！大麦五升多，铜板卖三百（作者按：约合法币二、三元，当时新麦市价每担三十五元）。隔壁阿三老伯伯，背脊驼来胡须白，儿子孙子饿勿过，拿了淘箩买大麦。走到上街头，走到下街头，走坏了一双草鞋脚，早上买到日头落到西山脚，大麦还是买勿着！天呀天，地呀地，背脊驼来胡须白，勿及店王仓里钻进钻出的一只小麻雀！”西乡有个农民，因为断粮，向邻居借了三元钱，买了几斤肉和菜虫药，把一家老小连同自己都毒死了。还有个农民因为养不活家小，把小孩丢进了水缸。粮店门口，道路两旁，到处都可以碰到饿倒、晕倒的老人、小孩。寻死上吊的，到处都有。还有一个情况是，嵊县自四月以来，干旱无雨，出现了几十年少有的奇热现象。五月底六月初，正是插秧季节，河干水浅，农民空着肚子车不动水，水田灌不满，秧苗插不下，眼看秋收无望，心里更是焦急万分。

一九三九年浙江是个好收成，现在为什么普遍闹粮荒？嵊县粮荒为什么特别严重？根据党的调查和各界舆论，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党、政、军官吏与奸商勾结，囤积居奇，走私资敌。嵊县县长方志超，国民党嵊县书记长俞美四和调统室主任、特务头目钱

增河早在三八年底就曾经勾结一起，豢养了“十三太保”，运用手里的权力和枪杆子。武装走私，发国难财。嵊县大地主、大资本家裘祝馨、赵雪珍（国民党军长赵观涛的兄弟）、汪正金除了在本县榨取租谷，大量收购粮食外，他们还勾通官府，从省粮食管理处取得采购证，向黄岩等县买进大米二千石，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有时国民党政府迫于情势，向乡镇“公卖处”调拨少许平价米，规定以每担二十九元进行平果，但这些大米一到乡镇长及乡镇事务员手里，又被囤积起来，高价出售。

走私的主要通道是东海及钱塘江的各个港口。据马青同志（时在余姚工作）提供的情况说，余姚沿江三百里海岸，特别是断头湾以西一带，走私十分严重。走私的物资大抵从金华、绍兴、嵊县方向来，出口向杭州敌占区去的有桐油、大米、茶叶、盐、锡箔等，从敌区进口的有香烟、香烟纸、火柴、鸦片、五金、洋货、白糖等，平均利润出口比进口大。三月间，我区大米价格每担二十五元到三十五元，敌区杭州为五十二元。一个月余姚的进出口走私总额在二千万元左右。当地群众都知道：国民党游击队是走私贩的最好的保镳。嵊县商人自己也说，他们用船、筏经曹娥江向北运的物资，都是出钱由国民党武装一路护送的。据报载：仅仅沿海一带靠勾结官吏和军队非法走私发国难财的就有几百户，其中百万以上的暴发户有十余家，八十万以上暴发户有六十余家。

怎么办？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向我们党提出了问题，“饿死不如犯法”，绝大多数人要求对奸商及贪官污吏开展斗争。剡源乡的部分农民，探听得石璜街上有个奸商囤积粮食，就聚众拥向街头要他平价出售。他不肯，群众就冲进这户商家，搜查出

了他囤积的大批白米和鱼肉。辅仁乡的农民在夜间截获了奸商偷偷外运的粮食，强迫他在当地平价出售。他们还对乡长进行说理斗争，要他以乡公所名义勒令米商开门营业。这些非法的、合法的斗争，大都是基层党支部领导的，在全县特别是在西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奸商也非常狡猾，他们千方百计地转移粮食，并紧闭粮店，连官办的“粮食公卖处”也关了门，使市场粮食供应完全断绝。

宁绍特委一直重视粮荒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将解决粮荒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五月初，杨思一、顾春林同志来嵊县检查工作，和我们一起研究了嵊县的情况。杨、顾两同志说：浙东广大地区粮荒严重，已引起全省各界人士注意。我党通过各种报章杂志指出囤积居奇和走私资敌是造成严重粮荒的重要原因，已为大多数人所认识。三月初黄绍竑来绍兴，答应要马上调运粮食在绍兴平价出售（从每担三十五元降为二十五元。二十五元是浙江省政府规定的官方价格，叫平价。）；并明令要惩办奸商，严禁走私和囤积居奇，他的诺言没有兑现。但是他的这些话及国民党省政府公布的某些救济粮荒、惩办奸商的条令，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向国民党政府作斗争的武器。他们说，我党现在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正在合作抗日，对国民党的斗争要根据中央指示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而不能采取非法斗争的形式。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县委决定发动饥民向国民党县政府进行合法斗争，争取尽可能解决粮荒问题。一、斗争内容和要求是惩办奸商，开放米市，抑平米价，保证供应。具体要求四条：第一条、请求政府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第二条、迅速而有效地抑平

米价，按政府定价每担二十五元，一元要买四升米；第三条、请政府明令允许开垦一切荒地，以增加粮食生产；第四条、请政府迅速向外地采购大批粮食紧急救济灾荒。二、斗争和打击的对象是奸商囤粮户，争取的对象是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吏，特别要争取抗日、民主、进步人士为解决粮荒出力。三、斗争的主力军是农民，主要是西乡重灾区的农民，同时吸引广大职工、职员及中小学教师参加请愿行列。四、斗争的形式是合法的，请愿的形式，由基层党支部发动群众向方志超写信，提出上述四点要求，请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救济灾荒，保证不误农时，插上稻苗。

方志超对群众的千百封信件置之不理，灾情更加严重了。

五月底，杨思一同志来到嵯县，和县委一起对发动群众进行请愿斗争的各项具体工作作了部署。确定了发动群众的范围，人数，各区带头人员（公开的带头人员和秘密的领导小组人员），斗争的要求及口号，进城后集合地点及与县委指挥部的联系，还讨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部署等等。有人反映，农民及基层党员对方志超和国民党不相信，怕他们开枪、抓人，主张请愿时携带土枪自卫。县委和特委研究后，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带武器不易掌握，也容易被国民党顽固派利用作为破坏运动的借口。决定：所有参加请愿的农民一律携带米袋、扁担和钞票，其他武器一律不带。五月底的一天，我从长乐一路检查工作回城，傍晚到达西山头村，发现党支部已在群众中公开动员，党支部及广大群众都纷纷要求立即行动，县委和特委研究，决定将请愿日期定为六月三日。

六月三日，县委全体成员都集中在城区，杨思一同志一直和我们在一起。这天上午从八、九点钟开始，西乡饥民四千余人陆

续分批进城，中午基本到齐，连离城九十里的水竹庵（裘祖恩在此任小学校长，唐友清任教员。）一带的农民也赶到了，他们是半夜动身的。城区居民也在党领导下配合行动，为农民烧茶、让屋，招呼农民休息。有些人自发地张贴标语，发表演说，支持农民的请愿行动。许多职工、职员、教师、学生加入了请愿队伍。

根据县委指挥部的决定，除少数人进县政府向方志超送请愿书外，绝大多数请愿群众都集中在东门操场上。县委指挥部设在操场临近的泥塘墩石磊同志家中。

方志超在武装保护下来到大操场，向群众发表欺骗性的讲话。他假惺惺地对农民的缺粮受饥情况表示同情，说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向外地采购粮食，最近就可以运到，劝农民们回去。请愿群众当场向方志超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揭露了某些奸商非法走私和囤积居奇的种种罪行，并提出许多要求，要方志超马上答复。方志超狡猾地说：“人多听不清，你们派代表讲”。县委原来指定的公开带头人党员费昭彦、费洪标，就作为农民代表在人丛中发言。方志超一面听，一面提问题刁难，袁冠群（钱亿群）、吴载琴又挺身而出，和费昭彦、费洪标一起对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根据县委指示及群众情绪，要求方志超严惩奸商，平价供应大米，并供应请愿群众一顿中饭。方志超理屈词穷，露出凶相，威胁群众说：“大米确实没有，你们不要受共产党煽动……”话音未落，愤怒的群众围住方志超责问：谁受共产党利用？谁是共产党？我们没有饭吃，人都要饿死了，秧插不下去，你当县长的管不管？有的举起扁担大声呵斥，吓得方志超面如土色，惊慌地说：“你们派代表到政府来谈，一顿中饭可以考虑！”说完就爬下讲台逃回城去。不知谁喊了一声：“冲啊！到县政府

去找方志超！”全场一声响应，就往城里跑，直冲到县政府门前。方志超派出代表，假意和群众谈判，群众就把操场上发言热烈、最能代表他们利益的袁冠群（女）、吴载琴（女），费昭彦、费洪标等七人推为代表，在县政府大礼堂上和县政府代表进行谈判。方志超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出武装人员和大批特务在大礼堂内外监视袁冠群等人，并插到各区群众中打听带队人姓名。许多群众担心代表们的安全，手执扁担拥进了大礼堂，把谈判桌团团围住。由于情况突然变化，县委指挥部和杨思一同志就移回到城内吴公庙内。

县委和杨思一同志对变化了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东门操场上的一场斗争是成功的。群众组织严密，党员干部分散在群众中，群众掩护党员干部，党群团结一块，外来人插不进去，党的指示能迅速通过公开领导人传达给群众，群众用大量事实揭露奸商囤积居奇的罪行，要求合理，使方志超理屈词穷；方恶毒攻击共产党、离间党与群众的关系没有得逞。群众运动把袁冠群、吴载琴推到第一线，使她们代替两费成了运动主要的、公开的领导人，群众信赖她们，乐于接受她们的指挥。但是她们缺乏经验，在斗争紧要关头，当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情绪偏激的人，以极左的口号，把斗争主要矛头指向方志超并煽动群众离开东门操场，冲向城区拥进县政府时，她们未能坚持县委决定，说服群众留下，而是跟随群众一起进城。这就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七位代表被方志超的代表缠住，留在大礼堂上，广大群众分布在县府内外及几条街道上。大礼堂内外及各区群众中布满了军警特务，代表们的活动，党的活动受到了限制，县委指挥部与代表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指挥部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建立

指挥部与袁、吴等代表之间的联系；要告诉袁、吴等同志，坚持县委的战略部署和要求，不要把矛头指向方，不要转移斗争方向，要求方严惩奸商，按平价供应大米，并供应一顿中饭；要求各区领导人整顿好自己的队伍，不要让坏人插进来。杨思一同志指出，要争取民主进步人士向方做工作，争取斗争速战速决，久拖不利。关于吴载琴参加公开斗争的问题，杨和县委都认为是一个严重问题，吴是区委书记，为了党的利益，县委原决定她不参加此次公开的请愿活动。她不执行县委决定，不仅来了，而且站到第一线，成了主要的公开的领导人，这对于党的秘密工作是不利的。根据杨思一同志指示，我们查问了到城的党员干部，凡是区委主要领导同志，一律说服他们回去，留下的不得公开露面。

到下午三点，大礼堂的谈判仍然无结果。方志超的代表坚持说向外地采购的大米尚在途中，今天城里无米供应，并拒绝供给请愿群众一顿饭。他要求代表们把群众带回去。代表们根据县委原先的决定坚持斗争，袁冠群在大礼堂发表演说，揭露方志超不顾人民死活，拖延谈判，欺骗群众的丑恶嘴脸，鼓励群众要忍受旱热和饥饿，把斗争坚持到胜利。大礼堂内的情况迅速传达给了群众，广大饥民群众对方志超的顽固态度十分恼怒，但都遵守纪律，坚持原地不动，静候谈判的进一步消息。

另一条战线上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竺曾撰同志一直在党外中、上层人士邢尊谋（国民党员、时在抗日动员会工作）、汪正铤等人中进行工作，和他们建立了较好的联系。邢尊谋与方志超有矛盾，又是西乡人，对西乡饥民请愿运动抱同情支持态度。六月三日中午，在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刻，邢尊谋等人也在四出奔走，积极活动。他们找到了省粮管处

嵊县办事处主任刘福庆，要他拿出一批大米供应请愿群众。刘不允，汪正铤、汪正铤以星峰体育会的名义提出了向刘借二百石米的要求，并愿意负担因平糶出现的差额一千元。刘怕群众发现他的仓库，抢他的大米，表示同意，但说这二百石大米必须经过方志超批准才能调拨。下午，方志超召集汪正金、裘祝馨、赵雪珍等人开会，他们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认为此风不能开，拒绝了邢尊谋等人的方案。入晚，方志超又召开各机关团体紧急会议，据邢尊谋后来提供的情况说，汪正铤要他代表星峰体育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又一次提出了他们的方案，要求方志超批准，出席会议的其他机关团体的代表夏伯南、尹健吾、范左青等赞同这个方案。但是方志超的代表章暨阳又一次拒绝了这个方案，并责令各机关团体的代表动员群众回去。

下午六点左右，竺曾撰同志汇报说：城里确实有米，“公卖处”有，商家也有。但是有些商家认为一元钱买四升米要亏本，如果一元钱买二升米，他们愿意供应一些。根据杨思一同志指示，县委指挥部决定：责成城区区委组织力量迅速查明“公卖处”及少数奸商的囤粮地点，同时决定降低要求，将原来决定的每元买四升米降低为二升米，让饥民群众能够买到米回去，争取斗争的胜利。由于代表们被国民党军、警、特务监视在大礼堂，无法联系，无法向她们传达县委新的决定，县委就通过各区党员干部直接在群众中宣传，但是群众拒绝。他们坚持一元钱买四升米的要求，并且说：我们只听袁冠群指挥，没有她的命令，我们不听。有些人愤怒地用扁担敲打着地面说：方志超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不走。

晚上，大约十点钟光景，方志超调动国民自卫队及武装警察

对请愿群众开枪镇压。愤怒的群众冲进大礼堂，把几名代表引了出来。县委指挥部及杨思一同志来到县政府门口，会同各区负责同志领导群众撤退。与此同时，方志超下令县警察局长周敬之捣毁大礼堂，拍了照片，伪造了“异党暴动，捣毁公堂”的所谓罪证，于当天夜里逮捕了邢尊谋。四日又逮捕了吴载琴、费昭彦、费洪标及冯金圻，并张贴布告，通缉袁冠群。六月四日，省里又开来了一连宪兵把守四城门，不让农民进城，并挨街巡逻搜索，捉拿袁冠群。但是群众并没有吓倒，四日、五日两天，东乡、北乡、南乡又有约二千饥民群众到县城请愿，揭露方志超的反动面目。袁冠群也在群众掩护下，由周新娥、杨月影接引出来，化妆为病人，用轿子送出城门向诸暨转移。后来她转移到四明山参加武装斗争。

县委写了篇“事实真相”，揭露方志超勾结奸商武装走私、囤积居奇，伪造罪证，血腥镇压请愿群众的严重罪行，在县内外广为散发、周列平（斯民）用“李兵”的笔名写了篇“米荒在嵊县”，刊载在金华六月三十日出版的《浙江潮》上，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嘴脸。

吴载琴、费昭彦、费洪标、邢尊谋、冯金圻五人被关在金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营救，并将六月三日夜间的事实真相告诉她们。由于方志超、周敬之伪造罪证的罪行被揭露，国民党迫于舆论，不得不在一九四〇年底将她们五人解回嵊县交保释放。费洪标于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县长袁雄杰活埋牺牲。吴载琴一九四七年在诸暨被捕叛变。邢尊谋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县政府社会科长，解放后因罪被我政府判刑劳改。冯金圻平时与国民党人员有来往，政治上比较落后。六三斗争时，他

忽然表现积极，在东门运动场上杂在请愿群众中间，提出过激口号，冲在前面，成了“群众代表”，解放后因罪被我政府判刑劳改。

嵊县六三斗争在县内外引起很大反响，黄绍竑虽仍然包庇方志超，但迫于情势，也为了平息民愤，欺骗群众，不得不明令惩办勾结奸商、走私资敌、民愤太大的宁海县长白樑深和镇海县长江志航，并调拨一大批粮食供应灾区饥民。嵊县在六三斗争后，县政府的“粮食公卖处”及一部分米商包括裘祝馨在内也不得不以每担五十五元到六十元的价格供应了一部分大米。尽管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也使饥荒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

“六·三”斗争的总结

“六·三”斗争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广大的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实践，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面目，认识到抗战不能靠国民党、民主和改善生活也不能靠国民党。要抗战，要解放，只有靠共产党，靠自己。连一些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士，也把同情放在请愿群众一边。国民党把袁冠群污蔑为“异党分子”，通告缉拿归案，但人民却把她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是“六·三”斗争中的英雄，她就是在人民掩护下摆脱敌人布下罗网的。“六·三”斗争使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宣告破产，而我们党和人民却赢得了胜利，人民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但是，就县委领导这一请愿运动的要求来说，并没有达到。而是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镇压下失败了，人民付出了代价，党付出了代价，党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县委在杨思一同志参加下，以后又在绍属特委会议上对“六·三”斗争作了总结。杨思一同志说：“‘六·三’斗争揭露了敌人，锻炼了党，教育了群众，也暴露了我们自己。”所谓暴露了自己，一是暴露了我们的弱点，二是暴露了党的力量。总结中着重议论了形势问题。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批右，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清算了右倾观点。当时，我们对形势，主要是对浙江国民党省主席黄绍竑有错误认识。一九三八年，黄绍竑为了和浙江的C. C. 军统争夺领导权，使自己在浙江站稳脚跟，曾经一度与我党建立了较好的统一战线关系。在我党推动下，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宣布了抗战决心，表示要实行民主，允许成立工会、农会、妇女会，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了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的口号。为推行这个“纲领”，从省到县，成立了“政治工作队”，成立了国民抗敌自卫团，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在这形势下，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派遣的有一些县长、专员，确实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黄绍竑的反共面目有所暴露，但是还没有彻底暴露，我们党内包括我们这些同志，对他还有一定幻想。在粮荒严重时，我们相信了他在公开场合为解决粮荒和惩办奸商所作的一些诺言，认为他还有可能接受民意，指使方志超解决粮荒。对方志超，我们也有错误认识，他平时跟着黄绍竑讲一些欺骗人民的话，我们认为他在群众请愿期间，有可能跟随黄绍竑采取一些措施，接受群众要求，而实际上，他是浙江军统头目、国民党省保安处长宣铁吾的亲信，他从中学教师爬上县长宝座，就是走的宣铁吾的门路。他在嵊县一直代表着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奸商汪正金、赵雪珍、裘祝馨等人的利益，群众

说他是“裘祝馨的干儿子”。他自己就参与奸商活动，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当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黄绍竑就已经与C.C.军统一起走上了反共道路。他们在“六·三”斗争中武装镇压请愿群众，在人民中彻底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也批判了我们的错误思想。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了皖南事变以后，我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学习中，才知道我在浙江的错误认识，是受到了东南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王明）的影响。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党决定进一步转入地下，长期荫蔽，积蓄力量。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党在教育党员、巩固组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已经红了的党员干部调出嵊县，各区领导成员作了调整，许多知识分子党员深入农村，使党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发展。杨思一同志估计，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从萧山向整个浙东地区发动进攻，以打通浙赣线，国民党军队必将望风溃退，浙东大片河山，要靠我们共产党去保卫。这是我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好机会。他要县委在这方面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要掌握枪杆子。经过“六·三”斗争的实践，通过这次总结，我们对党在国统区的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胜利充满信心。

过河不忘搭桥人

——回忆上虞爱国民主人士杜婉容女士二、三事

金 乃 坚

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浙东根据地的，有武装部队，有地方工作者，有工农群众的坚决支援，也有党外人士的热心相助。杜婉容女士就是上虞县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当年，她帮助我们党和军队做过许多有益的事。

（一）

杜婉容女士是上虞五夫镇人，她虽然从小生活在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但平时喜看进步书刊，关心时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上虞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在共产党员的带领和影响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婉容热烈响应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热心爱国抗日，由政工队同志的具体帮助，在她家中首先办起了妇女识字班，动员附近农村妇女三十余人参加，办过三期。教育内容除教识字课外，着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战时防空、救护等常识。婉容还亲自讲抗日形势课，扩大了我党团结抗日的政治影响。

五夫镇是上虞县内南上山区、北下海边的中心点，交通方便。一九四二年夏，我上虞地下党为了便于在全县开展工作，得到婉容的支持，在她家中开设了一家所谓“香烟公司”。这个“公司”有五、六个人手卷土香烟，以此作为公开的职业掩护，并筹集一些活动经费，实际上就是上虞党组织在五夫的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站。杨思一、马青、朱学勉等党的领导同志曾到过这个联络站。经常在此处出入的还有当时上虞党的负责人傅丹、华俊、赵萍、周明、赵虞等同志，有时连续几天开会讨论党的工作，婉容女士除热情提供住宿、膳食外，还担负了掩护安全工作，并代为保管党的秘密文件。

一九四二年十月有一天，五夫伪镇公所介绍一位不速之客来婉容家里住宿，此人绰号叫“任麻皮”，带了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自称是国民党政府的“特派员”，其实是一个与敌伪勾结的国民党特务，他住在杜家，使我党地下联络站受到威胁。婉容及时将此情况告诉当时打入汪伪上虞县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何畏同志，何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派人来缴了“任麻皮”的一支手枪，把他抓了去，解除了联络站的危险。这个党的联络站，在婉容坚决保护下，连续工作活动三年多，从未出过问题或遭受破坏。

（二）

一九四一年浙东沦陷，五夫小学停办，学生深受沦陷失学之苦。一九四二年春，婉容在我党组织鼓励和支持下，筹划并出任五夫小学校长。同时，党组织还介绍共产党员金克文，进步青年

俞淑芬等数人担任教员。办校期间，婉容校长曾谈起她有一个亲生儿子潘炯乐（改名田原）一九三七年去延安工作，后在新四军二支队工作，一九四〇年夏在苏南地区执行任务时被日伪军抓走入狱。因此，对国民党和日伪军极为仇恨。她经常与教员谈论抗战形势，并充满胜利信心。这时，五夫镇上虽驻有伪军车希贤部队，但婉容仍支持在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教唱抗日爱国歌曲，向学生幼小的心灵里散播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火种。在解放前和解放初，先后有十余位同学入党和参军，为革命事业输送了新生力量。

这期间，上虞党组织负责人周明以及赵萍、郑春泉等同志常来校联系工作。五夫小学成为党组织的另一个联络站。不久，金克文、俞淑芬先后参加新四军浙东部队，虽教员易人，但仍为我党坚持了这块抗日进步的阵地。

一九四三年三月，日伪军时去虞北地区扫荡。有一次，我部队派金克文潜入五夫侦察敌情，金克文先到五夫小学，因镇上敌人封锁，不得进入，婉容自告奋勇，到敌伪据点里打听消息，把敌情告诉了金克文。临行时，还介绍她的一名亲戚黎沙同志参加新四军部队，表示对党和新四军的信任和支援。

（三）

五夫地处杭甬交通线上，沦陷后常有日伪军驻扎，已经成为敌人的一个军事据点。日伪军为保护其交通要道，并时而四出扫荡我抗日游击队，抢劫蹂躏附近的老百姓。

一九四四年冬天有一次，伪浙保大队驻在婉容家里，预备第

二天开到虞北海边去扫荡新四军。婉容头一天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叫魏阿二送情报到五车堰永兴小学我情报站。第二天，伪浙保大队出发到谢家塘附近，受到我在虞北一带活动的三五支队的伏击，敌被歼数十人，有个姓马的副大队长，跳河狼狈而逃，总算是保住了性命，事后，姓马的怀疑婉容通新四军，叫去严加追问。婉容很冷静地回答说：“我有财产，有田地、有房子，为什么要通新四军呢？”因查无实据，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抗战胜利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上虞县城解放后，正式成立上虞县人民政府。何畏同志担任梁湖区区长，邀请地方知名人士为人民代表前往梁湖商谈政府工作。当时，有的慑于敌顽势力，持观望态度，不敢赴会；婉容女士接通知后毅然赴会。事隔不久，国民党劫收上虞县，成立五夫镇公所，国民党企图利用婉容在地方人民中的声望和影响，委任她为副镇长，杜当即退还委任书，托辞拒绝，爱憎分明，不屑参与国民党的政事。

十月间，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原在纵队干部团的袁啸吟、吴正平同志因身体不好，化装老百姓，单独从上虞出发，经上海去苏北。途经五夫时被国民党军扣押至镇公所，袁知道婉容为人思想进步，对我党热心好助，即带信给五夫小学教员钱友甫并婉容女士。婉容虽不认识袁啸吟等同志，但她出于对党和新四军的拥护和热爱，积极设法营救，出具证明，保释了袁啸吟、吴正平同志，使他们得以顺利北撤，参加了新的斗争。

回忆婉容女士二、三事，说明一条简单的真理：我们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而且还要依靠众多的朋友，各方支持和帮助，依靠党的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毛泽东同志曾总结为

“三大法宝”之一。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敌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破坏统一战线，把朋友当敌人。文化大革命中，婉容女士遭受种种侮辱和折磨，直至双目失明；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三月抑郁去世。我们都是在多么崎岖曲折的道路上过来的，深感胜利来之不易。真是“同志诚可贵，朋友情亦深；若问过河时，不忘搭桥人。”杜婉容女士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的。

一九八〇年五月于上海

余上县特派员制的建立及其他

寿 静 涛

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我奉紧急命令从庵东盐场向余姚县委（余姚周行镇）报到。组织上关照我不要接触任何人，单独住在一间房间。五、六天后的一个夜里，约十点以后，有人通知我立即去浒山，有人要和我们谈话，同去的项耿、肖贻两同志。到浒山时已半夜，有人在等我们了。项耿、肖贻叫他黄政委，后来知道他是黄知真同志，黄知真同志和我们谈了约一小时，谈了当前形势和今后斗争。他说：浙东形势有极大变化，现在中央已决定我们浙东、浙西、浙南全部北撤，今后这个地区暂时将出现白色恐怖的局面，这是全局的需要，我们要绝对服从这个全局。为了坚持斗争，经请示中央同意，允许留有少量武器，为便于活动，留下一个武工队，留下你们三个同志。我们这几天将立即撤离完毕。今后没有县委、区委了，上级决定建立特派员制，临时成立余上县，项耿同志是余上县党务特派员，肖贻、寿俊安（即寿静涛）是副特派员。你们受四明特派员领导，县以下所属周行、临山、马渚、浒山、庵东、松夏六个区，建立区特派员，区以下不建立特派员，也不建支部，由区特派员直接与原支部书记联系，从上到下，采取直线联系，严格禁止发生横的关系，使全部党组织处于地下活动的状态。今后何时恢复委员会制，将会有上级对

你们作出指示，在未恢复委员会制前，你们将以特派员的身份处理一切问题，改变过去委员会集体领导方式，而是由各特派员根据斗争需要，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要时也可不必请示上级。当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是应当请示上级的，尤其是事后应当汇报的。

我是在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当时的党组织也是完全处于地下状态。所以对于党全部转入地下状态这一点我在思想上是容易接受的，但是对特派员制则是很不熟悉，从未有过这样大的权力，也未挑过这样重的担子。

黄知真同志还给我们三人作了具体分工，项耿、肖贻两同志负责武工队工作，我负责全县组织工作。黄知真同志又明确指出：由于项耿、肖贻两同志曾在该地区担任过公开职务，在坚持斗争时有一定困难，为避免不必要牺牲，你们自己认为有必要时，可随时决定撤离。寿同志未担任过公开职务，今后斗争不管如何艰难，必须坚持到底，决不能撤退。事后项、肖两同志所带领的武工队，大概只坚持二十天左右，就停止活动。项、肖两同志同一天撤离余上县。

当晚黄知真同志还谈了今后的斗争方针任务，大意是分散隐蔽，避免损失，积蓄力量，逐步壮大，伺机打击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迎接大军南下。这个斗争方针是比较原则的，如何正确领会及正确贯彻执行，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项、肖两同志撤离以后，只剩下我一个县副特派员，同上级又失去了联系，同时六个区，当时有联系的也只有周行、临山两个区（周行区副特派员徐尧炎、临山区副特派员谢松林），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肖贻同志从山东派一个姓谢的同志来帮助余上县与上级取得联系后，才把余

上县斗争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并请示上级对余上县加强和配备力量。当时我的上级是朱之光同志，朱同志同意了我的请求，于五月间派黄明同志来余上，任余上县副特派员。这时我已与松夏、马渚两个区取得了联系（松夏区特派员雷行，马渚区副特派员沈忠兴），洧山、庵东两区尔后虽然也开展活动，并发展了党员，但终因未能与区特派员取得联系，故党的组织未能迅速壮大，这一局面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浙东解放。

黄明同志来余上后，领导力量有了加强，对该地区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据形势的发展与上级的指示，我与黄明同志共同制订了建立县武工队的计划，但在筹划武工队的武器过程中，黄明同志于一九四七年三月被捕牺牲，使余上县革命工作受到极大损失，但整个浙东的革命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五月间，上级又派余先同志来余上，六月成立余上县委，余先为余上县委负责人，我和雷行为县委委员，县委立即研究并成立余上县武工队，不久又成立余上办事处，从此余上县重新有了革命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周行、临山、马渚、松夏各区也相继建立了区委和区武工队，干部队伍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发展，并取消了特派员制，特派员制的历史使命至此完成。我于七月调四明生产工作队。余上县武工队成立后不到二年时间，成了四明山区有名的“小钢铁”部队，参加了有名的上王战斗，一九四九年配合南下大军写下了光荣一页。

其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就是余上县有一部分同志，一九四五年未能北撤，又不能在余上立足，他们有的撤退到上海暂时隐蔽，有的在上海找到了社会职业，其中如钱田庄同志，他找到职业后，保护了一大批在上海隐蔽的同志，如周芳雄、黄裕

光、丁柏威等，长期吃住在钱的家里。这些同志和余上县的党组织经常取得联系，并接受余上党组织的指示和任务，他们在上海发展和动员革命青年，不断输送来浙东参军，壮大浙东的革命力量。还经常为浙东的部队输送医药用品、医务人员，报纸、杂志等学习资料，打破了敌人对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封锁，为浙东革命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当时姚凯同志担任过上海与余上的联络员，上海来浙东的革命青年多次由他护送，余上县也专门搞了接待站，当时的临山区黄家埠夏家曾承受了大量接待任务，夏辉同志成了夏家接待站“站长”。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钱田庄等同志，还曾经和上海的一个地方党组织发生了关系。因为北撤时浙东有一部分女同志由组织安排在上海工厂当女工，如徐英、徐槐英、虞鸣飞等同志，她们参加了一个工厂党支部，项耿同志撤离余上到了上海，找到了她们，后来项耿重新和我联系，我通过项耿认识了她们，钱田庄当时还不是党员，正积极要求入党，我把钱的关系介绍给她们，后来她们介绍钱入了党（周芳雄等虽是党员，但不能在上海发展党员），所以隐蔽在钱处的同志，也都和她们发生了关系。以后她们也逐步调到浙东。

这些情况，现在看来是不完全正常的，浙东党是不应该与上海党的基层组织发生关系，或在上海设立浙东党的基层组织，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只要对革命有利，我觉得是应当允许的，我当时作为一个党务特派员，大胆处理了这件事，事后向上级作了汇报，得到了上级的同意。

一九八〇年二月

我在海上工委一段回忆

洪 舒 江

抗战胜利后，大约是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我受党组织派遣，从杭州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在浙东临工委领导下成立海上工作委员会（又称“小海委”，以区别于苏北的海上工委），先由严式轮为书记，后以项耿为书记，林有用、孙敏儒和我是委员。组织上规定我们的任务有三项：一是采购和运送军需物资到解放区，如枪枝、子弹、收发报机等；二是联系苏北解放区和浙东游击区，使浙东游击区——上海敌占区——苏北解放区之间联络通道得以畅通；三是护送干部。

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投降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正积聚其军事、政治力量，竭尽全力地向我党和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扑。当时的敌占区，充满着白色恐怖，很多革命同志被逮捕、遭杀害，斗争是十分残酷的。我们要大量采购军用品，并且长途数百里运转这些军用品，有时还护送党的干部，这一切都得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这当然得冒着出生入死的风险。此外，要物色适当的船只，找可靠的船老大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还得筹集资金，要具备这些条件也不是容易的。

在上海和苏北之间，还横卧着浩浩长江，这个天然堑壕有利于反动派对我们的封锁，而给我们完成任务却带来了更大的困

事。上海到苏北的主要通道黄浦江、吴淞口一带，敌人配备了庞大的军警队伍，层层设卡，重兵把关。在我们进行工作前有不少革命群众和一些商人试图从上海经吴淞口去苏北，几乎全都出事。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感到如果沿着黄浦江出吴淞口的老路走，成功的希望是很小的，必须“避实击虚”，另找新路。于是考虑到经浦东出东海再北上的路线。在浦东，尤其是近海一带，有我党抗日战争时期开展游击战争打下的良好基础。早在一九四〇年，由中共浦委布置埋伏在伪军十三师五十团的五个支部，除一九四一年其大部分力量已拉出开辟浙东游击根据地外，其余继续坚持埋伏工作的有胡骏、储贵彬、刘路平、戚大钧等同志，他们在南汇大团镇搞起了自卫团，掌握了武装，控制了大团、小洼港一带沿海地区。我本人出生于南汇县城，对浦东一带地理、人情也是比较熟悉的。由小洼港入海，南渡可以上浙东，北航可以去苏北，但因地方远处上海之东，较为偏僻，这里成为上海到浙东和苏北的中转站，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上海是我们采购一切物资的基地，完成采购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胡骏同志。他早于一九四〇年在大学念书时，就由朱人俊同志按照中共浦委的指示，动员打入伪军内部，他对党的事业是十分忠诚的。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浦东南汇县尤有影响。我们在上海购买各种物品，大都通过他或他的亲戚朋友去设法。购货的资金，组织上一点也没有给我们，都是由胡骏同志设法筹借的，他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从苏北运回的基本上是棉花，由于当时美棉倾销，投机奸商压价，资金大量亏损，胡骏同志即将家中田地财产变卖，以抵亏空，从无二话。他还动员一些

原先跟他在伪军工作过的革命群众，如郁治平、沈福楨、钱宏、王浦、李潮声、张根泉等，为我们冒险工作，从未泄露过我们的秘密。此外与我们保持关系的还有茅铸九同志等。茅当时在上海交警队任中队长，曾用化零为整的办法，把数以万计的枪弹从交警队运回南市大东门警厅路二十五号自己家中，然后交给我。

除了利用这些关系外，我们在浦东还有很可靠的立脚点，那就是南汇县东门外的永和花厂和大团镇自卫队，大团镇自卫队用的是国民党的番号，实际上由我党戚大钧、刘路平同志所掌握，队伍的指挥者储贵彬、奚德祥两同志也完全按党组织的指示行事，因此这个自卫队是我党掌握下的一支革命队伍。有一次奚德祥同志带着好几名士兵以外出执行任务的名义到上海，把一批物资通过十六铺码头运出上海。那个地方敌人检查极严，因为奚德祥同志穿着军官服，一批士兵提的提、抬的抬，运走了大批箱笼，而敌人未予检查。他们以为这不过是普通的行李，那知此中是万发枪弹，七、八架收发报机，连同电池，还有白报纸等东西。

永和花厂是当时我们秘密工作的联络站，开办于一九四六年夏秋间，它兼营轧花、碾米、榨油，由胡骏同志任经理，我的哥哥洪长发同志任副经理。而我的公开身份是花米商人，这样来往，就极便利而不易暴露。虽然因我们的人不善经营，该厂经济日渐拮据，而它的存在，使我们在浦东有了可靠的存放货物，干部立脚与中转的基地。这乃是它实际的历史使命。

当然，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活动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地区，随时都有被敌人发觉和逮捕的可能。也因为如此，我们每次行动前都曾预先设想被敌人发觉后的应急措施。我的身份证备有三张，根据不同情况改变自己的身份，有时西装革履出入于洋

场；有时又穿旧布长袍到棚户贫民中间。但我经常的公开身份是花米行商，对于花米的行情变化是很熟悉的。有一次我因有任务从浦东新场镇到横沔途经瓦雪村时，被国民党驻军拘捕了，由区分队解至中队，由中队解到大队。在大队部，一个家伙凶相毕露的审问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花米商，他又问今天的米价、花价，前几天的米价、花价，我心中很镇定，对连珠炮般的发问，对答如流。那家伙见难不倒我，又问：“家住哪里？”我说：“住在周浦。”“周浦哪里？”我说：“周浦南八灶。”“南八灶哪里？”我说：“名中医孙叔伦家房子里。”他又问：“孙家客堂里有什么东西？”我说：“放着两口棺材。”他又问：“院子里有什么？”我说：“有一个葡萄棚。”其实那儿是洪长发同志的住处，我去过那里，因此我情况很了解。提审的家伙见找不出破绽，一时无话，说是明天还要拷问。当晚仍将我押回区分队，关押在一户老百姓家，叫我睡在里间的里床，叫一个老百姓睡在外床来看管我，并将房门锁了起来，而外间还住着国民党一班士兵。但到第二天，忽然又把我放了。敌人起初说我是共产党嫌疑分子，而后来认为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商人。这一次是因为没有带货，因此容易脱身。

回忆这三、四年间，我奔走于浙东、上海、浦东、苏北之间，有好多次几乎被敌人发觉逮捕，但却仍然化险为夷，脱于虎口。如有一次我离开四明山要到上海时，浙东临委领导临时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将二十五两黄金分别送给杭州的同志和上海地下党，但是如何才能通过敌人的搜查关卡呢？鄞西区委书记金声同志帮我作了具体设计，将毛笋挖出一大正块，然后将黄金塞进笋肚里，再把挖出的一大块盖在毛笋上，插上了竹签，并且把

四、五支毛笋用竹蔑紧扎在一起，这样既牢固又看不出破绽。当武工队同志划了条小船护送我到宁波西门外时已经天明，可是我一上岸，就遭到几个敌人的搜查，他们将我的行李和全身详细地搜查了一遍，但始终搜不出和看不到有任何可疑之处。他们万万发觉不到我手中提的那一扎毛笋中还藏有二十五两黄金呢？一路上还经过了同样的盘问和检查，却都能通过放行，从而如期把黄金带给了杭州的同志和上海地下党。

有一天，我在上海南市大南门靠陆家浜路的一个小楼上正与浙东党派来的刘路平同志一起研究工作，突然一阵阵尖锐的鸣号声，由远而近，冲来了三辆警车，停在附近，军警纷纷跳下。我们见这情况，迅速地把文件、图章等物藏好，一面匆匆地商议一下应付的办法，决定我先出去，但这时已经迟了，街上岗哨密布，把我拦了回来。我身边有一张身份证的，但证上姓周，楼下有一户老百姓却知道我姓洪，考虑到这一情况，我仍回到楼上。警察敲门进房后，我主动拿出身份证。刘则说自己是浦东来的（他一口浦东音），小学教师，因为跟老婆闹翻了，跑到上海来混几天。一边说着，我们两个都掏出美国香烟送过去，那两个警察就这样被哄了过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反动军警出动的目的并不在于我们，由于我们能沉着应付，没有暴露自己。

刘路平同志根据我人地两熟的情况，曾要我去劳尔东路（现在的襄阳北路）与我党有关系的徐大亚同志取得联系，可是当我一到徐家，徐的爱人王慧珍告诉我：“大亚已被捕，特务在此活动频繁，你快走，当心被盯梢。”我就机警地观察了四方，转了几次电车和公共汽车，安全地回到了住处。解放后，我才知道徐大亚由于被叛徒出卖后被捕的，就在上海解放时，国民党还来不及处

决，我解放军攻进了上海，从而使他幸免于牺牲。

我们工委及外围的同志能在敌人鼻子底下生存并胜利地开展
工作，是靠组织的力量，同时也靠周围群众的支持。有一次因叛
徒出卖，我几乎暴露，组织上及时通知我，我立即从霞飞路四明
里二号胡骏同志家转移住址，前脚刚走，国民党特务后脚就跟进，
但他们扑了个空。

一九四八年底，浙东四明山派来交通员孙大伯和蒋大姐（惠
菊），分别带着不少信件和二十二两黄金到上海，准备交我转给
上海党。蒋大姐到上海后先找到南市制造局路四三九号孙大伯的
大儿子孙弘卿同志家里（弘卿是酱油小贩，孙大伯即以此为他在
上海的立脚点）。蒋因与另一同志通电话，而该同志已被捕，结
果电话被特务接了去，蒋大姐与孙大伯遂均被捕。不仅如此，因
蒋大姐身上还有一个指示我将黄金转给上海党的字条，敌人搜到
这个字条后，又开始搜捕我。自蒋、孙两人被捕之日起，孙家楼
上一直守着两个特务，孙大伯的儿子、媳妇都被管制在房内不准下
楼，晚上特务还在楼梯口睡，凡亲友去探望的，都遭逮捕。但是
孙氏兄弟一直在关心着我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我迟早会到
他家接头的。他们通过邻居的说情，被准许有一人到楼下煮饭，
而正当孙大伯的小儿子弘章一次做饭时，我到了孙家，其时我已
上了楼梯，他用十分焦急的表情和激烈的手势招呼我赶紧下楼出
去。我立即会意，知道情况不对，也不说一句话，返身就走，那
两个特务竟没有发觉。后来我了解，蒋大姐和孙大伯在狱中的表
现都很坚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不露口风。直到敌人觉得
他们身上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榨，就把他们释放了。而孙大伯的
一个女婿却又过了一个月才出狱，看来敌人是把他当作要搜寻的

共产党了。在孙家楼上的两个特务守了一个月左右，只抓到几个实不相干的“嫌疑犯”，后来对邻居们作了一番威胁性的训话，也无可奈何地撤走了。由于两位交通员的忠诚不屈，也由于其他群众的保护，敌人要搜捕我的企图又没有得逞。

运转物资和干部到苏北去，除了在上海采购和运往浦东小洼港的这两个环节，出海以后，还另有一番斗争。根据一、二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我们感到物色可靠的船只和船老大是一个关键。当时我们向同情我们工作的王矮弟雇到了一条 300 担的“沙飞”海船和十分可靠的一个金阿妙老大，在我们驶往苏北期间，只吃饭不收费，遇到困难他们勇于出面抵挡，从未出过问题。我们通常使用的船，称作“沙飞”，是一种平底的小型帆船，吨位小，航速快，能在浅海航行，利于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有一次顾洪福等同志用了一艘只有上海到崇明的执照的船，行驶到佘山洋（在崇明东北）时，因机器发生故障，不得已抛锚，恰在这时驶来了一艘国民党的炮艇，被扣留检查，顾洪福等同志商议，让金老大一人出面应付。金当着反动军官的面主动拿出执照，又自己打开船让他们看，一面又递过两条骆驼牌的美烟。反动军官问：“你们是到崇明的，怎么开到了佘山洋来了？”金老大说是机器故障开不动，被风和潮水冲下来了。他的答话很对路，因为当时正刮西风而且落潮，机器也确实出了故障在修理。反动军官拿了烟，又觉无可疑之处，也没有向深仓翻查，就把炮艇开走了。其实仓底放着的都是枪弹、药品等东西。待到机器故障排除，他们架起帆蓬、启锚装着朝崇明方向行驶，在小炮艇不见时，突然开足马力往启东外海驶去，胜利地到了苏北。

又有一次，我们的船从苏北返回时，发觉已被一艘帆船跟踪，

直到浦东，又因退潮不能进港，该船却紧跟不放。我们毅然把船开往舟山，因为老大与那里的船工、行商很熟，而在白天，那里船只往返频繁，混迹在其中，难以辨认。追踪的敌船终于掉头往北去了。我们的船在舟山东沙角过了两天，把船开进浦东小洼港，顺利完成了任务。

回忆这三年间，我们在无数次的护送干部工作中，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都是按组织指示送到目的地的。向苏北解放区运送的物资，有子弹十万发，收发报机及可改装收发报机的收音机七、八十台，还有电子管，A、B电池，各种手术器械、药品，纸张，摩托车等，都是解放区无力生产的、极为急需的物资。每当我们护送的干部或货物胜利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心中就感到莫大的快慰，这是我党革命事业的胜利。

一九四八年四月，我向浙东临委汇报工作后，领导上指示发动浦东大团自卫队起义。我即返回浦东向有关同志作了传达，并根据领导决定，由方晓、胡骏、张帆、吴建功、储贵彬等同志组成了行动委员会，不久张任伟同志被派来浦东并在上海开了两次会议，作出了起义部署。起义成功后，沪杭两地报纸在显著版面上刊登了“大团镇长储贵彬率部投匪”的重大消息，国民党内部为此惊慌失措，相互指责，震动极大；而在我浦东和浙东人民的心目中，却是件十分振奋人心的大事。此后，我经由杭州到了浙东。由于工作需要，浙东临工委将我派回上海继续埋伏，直至解放。

一九八〇年元月

为炊事员祝寿

楼 春 阳

一九四七年年底，浙东临工委决定重建浙东主力部队，会稽地区的队伍在嵊县开元镇打了胜仗，缴获了六挺轻机枪、一百多条长短枪后，胜利来到四明山区，与兄弟部队会师。两支队伍刚会师，又在青岩打了一个胜仗，四明地区的“钢铁部队”，猛打猛冲，大显威风，打垮了尾巴翘得老高的浙保华松中队，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日造轻机枪。

不久，队伍来到姚南山区，这里原是抗日时期新四军浙东纵队的老根据地。

三月十五日那天，部队在官佩村宿营，这里离敌人据点龙坑只有六、七里地，因为群众基础好，队伍还是笃定住了下来。

村子坐落在四山环抱的山坑里面，山上茂盛的竹林、松树，把村子团团地裹在中间。村子有百来户人家，都是青砖白粉墙的瓦房。村前是一条石子大路，一湾清澈的小溪绕着村子流过，溪边的杨柳吐出嫩绿的新芽。

前几天，不知什么风把今天是炊事员阿康五十岁生日的消息，刮到首长的耳朵里去了。支队部决定今天要给阿康祝寿。官佩的群众听得子弟兵要给老同志祝寿，高兴极了，也办下了寿礼，准备参加祝寿。这事情就越弄越大，成了官爱兵，民拥军的政治

大高潮了。

会稽地区来的“坚强部队”，是办寿事的主人家，这天可忙极了。一早，担任指导员的我便集合队伍分派工作。那几个人负责招待，那几个负责演出节目。寿星阿康今天应该休息，要准备讲话。厨房里今天的任务又很重，寿酒要办好，由李排长派几个会烧菜的战士去帮忙。我还宣布：马政委、刘支队长都要亲自来给阿康拜寿。当地的群众还要送寿礼来呢！

同志们听了，欢声雷动。原来大家只打算自己连队里小搞一下，没想到首长会这样重视。有的同志主动要求下厨房，不会烧菜，也可以挑水，劈柴，烧火。许多战士围上了阿康，议论纷纷：“阿康同志福气真好，这么多人给你祝寿，在家里那里有这样排场。”

“革命队伍真是大家庭，革命同志比家里人还要亲。”

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直说得老阿康喜的合不拢嘴。

我接着对战士们介绍了阿康光荣历史：

“阿康是我们队伍里年岁最长，参加革命斗争最早的同志。一九三〇年我们党领导枫桥区农民进行暴动，农民们拿着锄头、铁铤、檀树火炮与反动派打仗。那时，阿康三十二岁当排长，暴动被敌人镇压下去了。阿康也被敌人关进监狱。他在狱里受了重刑，敌人用藤条抽、灌辣椒水，用绳子把他的四肢凌空吊起，身上压上一片百多斤重的石磨，我们的阿康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吐出一句口供。后来敌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交保释放了。一九四二年，金萧办事处成立，阿康同他二个弟弟又一起参了军。主力北撤时，他年龄大，被动员回家了。一九四七年五月，诸暨北乡有了武工队，他又出来了。这次出来，家里丢下了七十岁的母

亲、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阿康出来了，村里的保长经常去打骂他的娘和妻子，他离家才二、三个月，妻子熬不了苦日子，丢下婆婆和女儿走掉了。”

这时，同志们鸦雀无声，都以格外尊敬的眼光，注目着阿康同志。

阿康站在一旁，紫铜色的脸，结实的身躯，一双粗大而笨拙的手，他听着听着，激动得扑簌簌落下泪来。

阿康听说要上大会讲话，真急坏了，他满脸青筋暴涨，发急的说：“指导员，首长这样排场给我做生日，做梦也没有想过，我阿康活了这五十年，没有人给我做过生日，共产党比爹娘还亲，……”阿康说着说着，又动起感情来，眼眶里满含了感激的泪水，他接着说：

“同志们，我咀里含冰糖，甜在心里，说不出口来。我阿康不会说话，上不了台。”阿康说了话，转身想走，可是同志们上去把他拉住了，非叫他休息不行。

“啊！你们不要耽误事情，史副官一早来说了，早上杀猪，水还没有烧呢！”阿康心里一急，急性子脾气又上来了。

“人家还不能烧水吗？”

“啊哟！今天事情多着呢！你们尽管敲锣打鼓去好啦，厨房里有我阿康。”他大声说着，推开众人向厨房跑去。

下午，祝寿大会在一座宽敞的祠堂里举行。戏台前面，坐满了参加祝寿的当地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个眉开眼笑。自从主力北撤以后，四明山的群众，受尽了敌人的摧残和折磨，他们日里盼，夜里盼，盼望自己的子弟兵回来，今天自己的子弟兵终于回来了，又给自己的子弟兵祝寿，你说，该有多少

高兴呢！妇女们都象过节似的打扮得青花水绿，小孩子也穿上了红红绿绿的花衣裳。他们还敲锣打鼓的送来了丰盛的寿礼。寿礼摆在戏台上面，一担寿酒，四个红漆茶盘上满满的一盘寿桃百子馒头，一盘印糕，一个盘子上盛了一双直贡呢面子的布鞋，一双袜子，鞋袜上面还系了鲜艳艳的红绒绳。另一个盘子盛的是一件衬衣和一块围裙，另外还有一扛寿面。这样丰盛的寿礼，战士们看的都瞪眼咋舌。四明山的乡亲们啊，你们真是我们队伍的亲人。

戏台的两边，站的是“钢铁部队”、“坚强部队”、“胜利部队”、教导队、中共浙东临委机关和支队部机关的同志，还有当地的武工队。这天，部队首长和四明地区的领导同志都出场了。刘法清司令员，马青政委，张任伟参谋长，诸敏主任，陈布衣部长，朱之光同志，薛驹部长都来了。

戏台的影壁上贴了一幅红底描金的寿字。刘支队长、马政委、寿星阿康和当地群众代表，坐在戏台上面。阿康穿了一身干干净净的灰布棉军衣，红光满面，显得又激动又紧张。

大会开始了，司仪大声地喊道：“祝寿大会开始，奏乐鸣炮。”

顿时，台下几副锣鼓一齐敲打起来，门外点燃了爆竹，一时间锣鼓声、爆竹声和欢笑声响成一片。

鼓乐停止，马青政委讲话了。他首先指出这次大会的意义，这是人民军队官兵平等、军民一家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在革命队伍里，当炊事员一样是光荣的。司令员与炊事员一样，都是平等的同志。阿康同志多年来为革命事业，埋头苦干，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他简单的介绍了阿康的身世和革命经历以后，讲到了四

明山人民的英勇斗争，他代表部队感谢四明山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他激动地说：“敌人烧毁了四明山的长田村，回答敌人的是长田村人民组织了一支复仇部队，革命的队伍有了人民的支持，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要胜利，而且为期已经不远了！”

马政委说到这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末了，他代表浙东临委和三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向阿康同志拜寿。一霎时，台下的鼓乐和掌声齐鸣，马政委向阿康先敬礼后握手，弄得阿康又是敬礼又是鞠躬，手足无措。

接着官佩村的群众代表讲话。他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先代表官佩的全体群众向阿康拜寿，赠送了寿礼。接着说：“今天部队到阿拉村里来，为阿康同志祝寿，大家觉得十分难得，十分高兴，大家给阿康同志送了一点点寿礼，东西虽少，表表阿拉的情意。长田老百姓遭了灾，建立了一支复仇部队，阿拉官佩人也吓不倒，有共产党领导，什么也不怕，房子烧了将来造新的。四明山老百姓吓不倒，坐刀山，落油锅，永远跟着共产党。”代表的话一落，台下又是一阵掌声。

台上的司仪把手一摆，大声喊道：“大家欢迎阿康同志讲话！”“欢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有节奏的掌声。

刘司令员站起来请阿康讲话，阿康的脸涨得通红，再三推让着说：“我咀笨，实在不会说话，谢谢首长！谢谢大家！”

“欢迎寿星讲话！……”台下的呼声和掌声连成一片，此落彼起。

“不说几句不好，说上几句吧！”刘司令员连推带拉地把他拥上台前。

“我实在不会说话，”阿康显得很窘，想了想，终于大声说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样多的首长、同志们给我祝寿，这样排场做生日，活了五十岁我是第一遭。我没有功劳，心里很难为情。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感谢首长、同志们！我今年五十岁，老黄牛耕田，一犁犁到头，革命不成功，我阿康决不回家！”阿康说的几句话，洪钟似的，象有千斤重的份量。

顿时，鼓乐声，口号声，欢笑声，锣鼓声，在祠堂里久久地轰响不绝。

四明青山埋忠骨

——忆黄明烈士

张明



黄明烈士遗像

黄明同志原名金达，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生于余姚左溪乡金岙村。一九四一年姚城陷敌，他愤然从实获中学辍学回乡。一九四二年我党在四明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他即投身革命，同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余上边区民运政治工作、南山县联络站站长。一九四五年浙东纵队北撤时，黄明同志奉命留下，任沿江区特派员，在四明山地区坚持斗争。

坚持敌后 扎根群众

余上县位于现余姚、上虞二县北部，东靠慈溪，南濒姚江，西临曹娥江，北连杭州湾，全县一片平原，是浙东粮、棉、盐的

主要产地，也是我浙东抗日老根据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时，在余上县留下了少数党员干部和一支十余人的县武工队，转入地下，领导全县人民坚持斗争。蒋介石很快撕去假和平伪装，大肆进攻解放区，整个浙东天空乌云乱翻，人民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当时，我县武工队在临山区沿海活动，由于原马渚区常备队二战士投敌，我县武工队暴露，敌人到处“清剿”，县武工队转移去崧厦、浒山地区。此时我县地下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得不到及时的指示，敌人对我武工队进一步大规模所谓“清剿”，有的队员失散，所以，根据北撤时上级的指示：一部份担任过公开职务的领导继续撤向苏北，余下的进行分散隐蔽活动。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对蒋管区人民更加严密控制，残酷镇压。此时我们日夜盼望上级党委能来人给我们具体指示。不久，上级党派人来到了余上县临山区副特派员谢松林同志家中，与我县副特派员寿静涛同志取得了联系。从此我县与四明工委负责人朱之光同志接上了关系。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开辟余上县工作，同年六月四明工委派黄明同志任余上县特派员。

黄明同志来余上县时，打扮像个乡村小学教师。他头养西发，白净的脸，身材矮小，穿一套余姚土布衣服，脚穿线袜、布鞋，年龄二十零点，同志们和他接近后，都感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到任后，他首先抓恢复、发展、建立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在当时一片白色恐怖下，他带领大家千方百计找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地下党员接关系，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同时积极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壮大党的队伍。

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四明工委决定举办余上、姚南、上虞、

鄞西等六县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由黄明同志任班主任，共有三十一位同志参加。余上县参加的同志由黄明同志带领，从余上到党训班举办地点姚南桃花岭，一路上敌人层层布岗，搜查很严，黄明同志与同志们商讨随时应变的准备，告诉大家遇到敌人时要沉着、冷静、机智。会后他与杨枫同志化装成商人，手提网篮，内藏党训班用的钢板、蜡纸，大摇大摆从郎霞出发向姚城走去，住在岗哨林立的伪县政府附近的一爿商店里。他风趣地讲：“敌人是睁眼瞎子，他们做梦亦想不到在他们鼻子下面会有共产党。”在三十二天的学习期间，由于形势紧张，环境恶劣，黄明同志带领大家转移了十八个地方。他日夜辛苦，学习班上，他经常向学员讲形势与任务，社会发展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课后又自己刻钢板、印讲义，找同志们谈心。这次党训班虽然时间短、人数少，但为余上等六县培训了一批地下党的区级领导骨干，为日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

黄明同志回余上后，接着调整加强了临山、马渚、周巷、崧厦、浒山等区的领导力量。任章钦同志为临山区特派员，熊锐同志为马渚区特派员，徐尧炎同志为周巷区特派员，与崧厦区特派员雷行同志接上关系，派陆建平同志去浒山开辟工作，他自己亲自抓庵东区发展党组织工作，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庵东镇上发展了一批党员。从此，整个余上县地下党的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了。

为了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对广大群众进行形势教育，扩大党的影响。黄明同志与寿静涛等同志研究决定，以中共余上留守办事处的名义，出版了“余上简讯”。这本三十二开的小册子，宣传了我党的政策，揭露了国民党打内战的阴谋。我们通过邮寄，内线传递和到处张贴，很快与广大群众见面，鼓舞了大家斗

争的信心。同时我们还把简讯寄到伪县长、伪公安局长等人的手中，吓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千方百计搜查，结果到处扑空，好一付狼狈相。广大群众拍手欢笑，他们深切感到：共产党又回来了，有依靠了。

天华缴枪 智斗顽敌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所谓“清剿”，认为余上县的共产党被“消灭”了。但恰恰相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余上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了新的一页。这时，黄明同志派人四处侦察敌情，寻找机会，袭击敌人，开展武装斗争。经过一段时期的侦察活动，袭击目标选择了靠近四明山区的马渚区天华乡公所。当时考虑的因素是：一、该乡乡长是一个十分顽固的反动分子，对其打击可以打下敌人反动气焰；二、该乡自卫队武器比较好，有十多支步枪，还有一挺机枪，而自卫队员有一半人员平时都住在家中，守备松懈；三、通过该乡的地下党与乡自卫队里面的内线，我们能及时了解敌人的动静；四、进行袭击及撤退的行军路线比较方便。目标确定后，十一月中旬，黄明同志向四明工委负责人朱之光同志作了汇报，提出了突击进攻的方案。当时四明山党组织为了发展武装，急需武器，对黄明同志的汇报十分重视，并指示黄明同志要继续做好侦察，随时掌握敌人动向。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朱之光同志率领丁大章等十余位同志，冒着倾盆大雨，从四明山出发赶到沿江区夏巷村杨光同志家中，再次听取了黄明同志的详细汇报，确定了部队向天华进发的意见。二十九日，由黄

明同志带着朱之光等五位同志乘小划船向周巷圩堰桥“新新公司”（我县联络站的代号）驶去。朱之光、黄明及其警卫员三同志乔装成商人，肖东、罗爱芬二位女同志乔扮成眷属。一路上朱之光同志谈笑风生，颇有风趣的俏皮话，常常引起同船乘客大笑，但他们的长袍里都藏着打开保险的手枪。

第二批丁大章等五同志乔扮卖山货的客人，步行去姚北，他们有的衣服内佩带小手枪，有的在肩挑的饭篮里藏着手榴弹，先后到了郎霞镇上，在僻静的一家香烟店前歇了下来。店主人地下党员小杨同志连忙把他们接了进去，晚上在小杨同志的家里住下来。

第三批由杨光同志带领，撑了一只卖山柴的商船，摇到了八字桥，在当地一地下党员同志家中安顿下来，从柴中掏出了步枪，作好了准备。

这样，三批“客人”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离天华乡公所五公里附近的地方潜伏了下来。十二月一日是天华镇的集市日，东方刚泛起一层鱼肚白，赶集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地拥向天华镇。黄明同志化装成赶集、走亲戚的模样，带领了肩挑淘萝、饭篮和铁耙柄、扫帚等山货的一批“山货客人”混在赶集的群众之中进入天华镇，迅速而忙碌地侦察伪乡公所的内外地形和敌人动向。经过连续两天的侦察，摸清了敌情。十二月三日黄明同志向领导上汇报说：“乡长开会去了，自卫队队附、班长晚上也不住在里面，二十余个自卫队员，只有一半住在祠堂内。另外，近几天乡公所旁边做了三天戏，敌人因赌博和警卫，搞得很疲劳，以看戏消遣。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建议明晚立即行动，战斗结束后当即撤回四明山去。领导上当即同意黄明的意见，并任命黄明同志为

这次战斗行动的总指挥，布置了战斗任务和分工，以及撤回四明山的路线。第二天晚上八时正，黄明同志在八字桥对参加战斗的全体同志进行了动员，随即带领几个地方干部和全副武装的丁大章等十余位同志，一个紧跟一个地奔向天华街。布置丁大章等同志放好警戒、切断电话线，由老黄等同志埋伏在乡公所周围，自己带着老边和小杨直奔伪乡公所。小杨“嘭嘭”地敲门，敌人刚把门打开，紧贴着墙的老黄与小王两同志首先冲了进去，用手枪抵着这个前来开门，一手提灯，一手拿着一支快机的敌人胸膛说：“我们是三五支队，缴枪不杀！”说着，小王很快将敌人的枪支缴下了。这时，屋里正在打牌的敌人，听到外面急促的脚步声和“缴枪不杀”的喊话，顿时大乱，有的尖叫“有情况”，有的慌忙去取挂在墙上的枪支。但是已经晚了，同志们已冲进了大厅，包围了敌人营房，所有枪口对准了敌人，并向敌人喊话：“我们是三五支队，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缴枪，手榴弹丢进来了！”敌人不得不举起手来投降了，同志们把敌人赶到屋角，收集枪支的时候，发现机枪没有了。老黄威武地向敌人喝问道：“机枪在哪里？说！”敌人你看我，我看你，一声不响。过了一会，一个敌人说：“我们没有机枪。”小王一个箭步冲到那个敌人面前，一把抓住他的胸口，问：“到底有没有？”那个敌人冷笑地回答：“没有。”小王再也忍不住了，举起驳壳枪对准那人又问道：“究竟有没有？”这时，那个敌人慌了手脚，连忙说：“我说，我说，我是副班长，机枪班长藏起来了，班长今晚住在其姘头家中。”老黄说了声“走！”就和小王带了这个班副，赶到离伪乡公所一里外伪班长的姘头家。走到门口，老黄命令这个班副说：“把他叫起来！”敌人走上台阶，敲门叫道：“班长、班

长，开门！”里面有人问：“什么事情？”伪班副说：“乡里有公事，你开开门！”不一会儿门开了，伪班长的姘头探出身来，鬼头鬼脑地问：“什么事？”老黄手疾眼快，一手把她推开，一手举枪冲了进去，用枪指着正在起床的伪班长说：“要活命的，把枪交出来！”吓得伪班长牙齿直打颤，老黄很快在其枕下缴了他的驳壳枪并将他押到楼房，缴到了那挺机枪。战斗很快结束了。就这样，我们没化一颗子弹，没流一滴血，缴获了敌人一挺机枪，十三支步枪，二支驳壳枪，一支小手枪。

同志们满载而归地回四明山去，从夏港渡过姚江，到鸭塘湖才天亮。

当敌人知道天华乡被缴枪后，国民党第三专区专员兼四明山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郑小隐恼羞成怒，连忙命令周巷、郎霞、马渚等区戒严，挨户搜查。同时派出暗探、特务到处活动，妄图消灭我军。

五日晚上，当我们从鸭塘湖出发时，被敌人发现，他们派出警察大队追击。当队伍走到湖东岙时，前面又发现了敌人，敌人问口令：“哪一个？”老黄一面回答：“老百姓！”一面很快撤下溪沟，迅速转移，敌人开枪射击，恰好与后面追击我军的敌人碰上，双方都以为碰上我军，猛力开火，结果是狗咬狗，持续了半小时之久。敌人的互相残杀，为我们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余上县和整个四明山地区。这次战斗，是浙东新四军北撤后，四明山地区第一次比较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而且壮大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为以后浙东第二次建军打下了基础。

叛徒出卖 不幸被捕

一九四七年二月的一天，黄明、谢松林和我在临山区湖堤乡汪家岙谢松林同志家秘密开会，分析当时的形势。下午，我和黄明从谢松林家出发去周巷区。当时，黄明化装成一个小学教师模样，我化装象一个商人模样。为了防止路上发生意外，我们商量了合法身份和关系就出发了。翻过岗旗岭，全都是平原，经过郎霞镇，到了周巷区塘堰桥黄开增同志家。饭后，夕阳的余辉撒在大地上。黄明对我说：“走吧！”随后拿了一包书给我，说是教课书。他走前面，我走后面，一前一后走出了黄家，向北走去。走着走着，我看见北面有五、六个穿便衣的人向我们走来，我对黄明说：“前面有人来了。”这时黄明朝左右一看，都是田畈，就说：“向前走！”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与来人互相擦肩而过。

突然，那几个穿便衣的转身把我和黄明抓住，有一个人拿出一副手铐，把我的一只手和黄明的一只手铐在一起，并问：“哪个是黄明？”这时我们知道是碰上敌人了。我和黄明异口同声回答说：“没有黄明”。敌人夺去我手中的教课书，在我们身上乱摸一阵，没有搜到什么东西，就用手枪指着黄明的胸口盘问，接着又把枪口指向我盘问。我们按照原约好的口供回答，敌人再三盘问也看不出一点破绽，就蛮横地说：“你们都是土匪！”敌人盘问时，我思考着：敌人怎么会知道黄明的呢？忽然看见五、六个敌人中有一个人低着头，两手戴着手铐，顿时心中怒火万丈，原来是叛徒出卖了黄明同志。

这时又来了十多个敌人，留下了三个敌人看守我和黄明，其

余的往南八字桥方向窜去。这三个敌人各拿一支短枪，把我们俩继续往北押去，到塘堰桥三叉路口叫我们停下，并分三路看守我们。这时三路各有老百姓向我们走来，三个敌人分别举枪讯问：

“哪里来的？”老百姓答：“过路的。”老百姓越围越多。这时，黄明悄悄地对我说：“准备牺牲。”我低声答道：“好，你放心吧！”黄明又乘机用一只手伸向内衣口袋，摸出一本小本子甩在路旁。

正在这时，去八字桥的敌人又抓来一个头戴大帽，身穿长袍约三十余岁的男人，交给看管我们的敌人，接着向临山区的郎霞镇方向走去。

看管我们的那三个敌人，把我、黄明和那个男人押上公路，向周巷镇敌人据点走去。我们前面是一个敌人和那个男人，后面两个敌人用枪口顶着我和黄明的背。这时天色刚黑，敌人慌慌张张地催促我们快走。为了拖延时间，我说：“俩人铐在一起走不快。”再往前走，很快就要到达敌人据点了。黄明与我并肩走着，我用一只手向黄明的一只手摸去，他的手也被手铐铐得紧紧的。这时黄明用力拉了二下手铐，我知道这是暗示，决定与敌人搏斗，但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

我们越走越慢，敌人越催越急。恰好走到周巷镇西第三号桥时，（这桥早被我们破坏了，只有铁轨，没有铺板）前面一个敌人和那个男人从铁轨上走过河了，这时我想机会到了，就停下了脚步，敌人催说：“快过去！”我和黄明同声说：“不好走，给我们手铐打开。”敌人不肯，我们多次提出，敌人还是不同意，硬要我们过河，我们就坚持不走，敌人无奈，后面的两个敌人，只好一个走到黄明前面准备过桥，后面还有一个敌人逼着我们走

过桥去。为了便于和敌人搏斗，我一边借口说：“不好走，要跌下去的”，一边用一只手抓住我后面一个敌人肩上的棉衣，黄明前面的一个敌人过河了，我和黄明慢慢地向东移动，这时黄明猛力跳下河去，我用力向上一拉，手铐链条拉断了，我和黄明跌下河去。我当即向西岸游去，上岸时西岸的那个敌人抓住我肩上的棉衣，我即忙掉头，看到东岸两个敌人用两支手电筒照住黄明，因黄明穿的是棉长袍，又不会游泳，所以速度比我慢。在黄明即将上岸又要被东岸的两个敌人抓住时，为了转移敌人的目标，我用力向抓住我的敌人推去，敌人向前一冲，我就朝北方向跑去，敌人向我开枪时，我已过坟包，又游过了一条河，终于脱险了。黄明又被敌人抓住，押往周巷据点去了。

此时，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暗暗与黄明同志告别了。为了尽快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向党组织报告，我穿着湿衣服，戴着一只手铐，从周巷去临山镇城隍涂一地下同志家里。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我只好走田野和小路，跑了三十余里才到达目的地，由地下同志用一片竹箴给我打开手铐，换上衣服，即派他以赶集市为名，进临山城内通知章钦同志，要其立即报告上级党组织。当领导和地下同志及群众知道黄明同志被捕的不幸消息时，心情都十分沉痛。但大家坚信：黄明同志一定会坚持斗争的。

过了几天，我在临山镇牛大岙徐惠珍同志家，向朱之光和雷行同志详细作了汇报。组织上决定：一、雷行同志留在县里工作，调我去负责崧厦区的工作；二、要稳定地下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情绪；三、查清叛徒和逮捕黄明的敌人番号；四、尽快设法营救黄明同志。

狱中斗争 坚强不屈

经过了解，查出了叛徒，是周巷驿亭路洪士夏（即阿夏）。黄明曾做过阿夏的工作，动员他去四明山，因他怕艰苦，在逃回周巷老家的途中，被余姚县刑警队张毛弟逮捕而叛变。因此，带了敌人来抓他住过的塘堰桥的熊永鉴、八字桥的徐尧炎等同志，在路上偶然碰到黄明，也就出卖了黄明。

据事后得悉：当黄明同志穿着湿衣服，被押送到周巷当店内的敌刑警队队部时，敌人立即审讯他：“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黄明干脆地回答：“我叫陈金林，教书的。”敌人又问：“你参加哪个组织的？”黄明气昂昂地回答：“不知道，你没有资格问我，给我解上去好了。”敌人没有办法，只好派了两个敌人把黄明看守起来。黄明整整坐了一夜，第二天敌人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把黄明同志押送敌余姚县拘留所。

敌人又开始审讯了，要黄明招供四明山的地下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并要他说出天华乡的枪支弄到哪里去了。黄明说：“在四明山，你们有胆量去拿好了。”审了半天，敌人一点也得不到东西，就施展了残忍手段，给黄明同志上“老虎凳”，砖头一块一块地插进去，只见黄明头上冒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但他还是咬紧牙关，一字不吐。

敌人又给黄明升了一级刑罚，做“老鹰飞”，用铅丝把黄明的两只大拇指和两只大脚指头吊起，背上压一块大石头，用绳子往上拉，把他的手和脚拉长，黄明当时就痛得昏迷过去了。敌人还是不死心，再做什么“水漫金山”，将大量的冷水泼

在黄明身上，等黄明慢慢苏醒过来时，敌人又问黄明：“怎么样？”黄明坚定地回答：“你们能摧残我的肉体，但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一点东西。”

为了反抗敌人的残酷用刑，黄明决定开展绝食斗争。他不进一粒饭和一口水，三天后面如土色，呼吸微弱，敌人因没有在黄明口中得到所需的情报，害怕他死后，不好向上司交账，因此暂时停止了残酷的刑罚。然后采用软的办法审讯，把黄明叫到一个佛堂里，一个穿西装的人讲所谓“仁义道德”，劝黄明“反省”“回头”。还胡说什么国际上有美国支持国民党，共产党不适合国情，要被“国军”消灭的，你是“奸匪”，只要把四明山地下党组织名单交出来，就可以放你回去，等等。他要黄明讲话，黄明同志就趁机宣讲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

敌人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只好又把黄明押到梁弄国民党四明山区绥靖指挥部，关进地主庆余轩的庄屋左边的一间牢房里。

到敌指挥部后，敌人多次秘密审讯。有一次半夜里把黄明叫到一个法官房间里，法官对黄明说：“你把四明山地下党组织说出来，我放你回去。”黄明说：“我瞌睡未醒，叫我讲什么？”法官无奈，只好给黄明送脸水、茶。然后对黄明说：“你讲！”黄明说：“你要我讲，我就讲马列主义。”敌人此计未成，只好把他送回牢房。

另一次，敌人很早把黄明叫出去，用全副武装把他押送到审讯室。门口岗哨林立，两边敌人握着上了刺刀的枪对准黄明，逼他交出四明山区地下党组织。不管敌人气焰如何嚣张，黄明还是一字不讲。敌人又一次失败了。

这时，朱之光同志知道黄明已被转移的消息，就写信给梁弄镇地下党负责人罗家森同志，要他们时刻注意敌人的动静，保护黄明同志，设法营救黄明。地下党接到指示后，千方百计地展开斗争。

当时朱静珠的父亲、弟弟和爱人也被关在庆余轩地主庄屋里。朱静珠的丈夫是地下党员，其哥哥也是四明山区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党组织就利用朱去送饭之机，要她设法和黄明取得联系，朱想方设法终于和黄明接上了头。黄明暗示朱说：“朱姐姐，我从余姚来的，时间很长了，一时出不去。”地下党知道黄明被关的牢房后，立即叫黄明姐姐金惠珍同志给黄明送饭，敌人不让进去，她就叫八岁的外甥女信义送去，敌人不注意，给她送进了，后被敌人发现要打她，只好掉九岁的外甥女秋风去送，可是敌人搜查很严，难以与黄明联系。

梁弄地下党为了尽快营救黄明同志，一方面在敌据点周围张贴标语，让敌人知道“绥靖指挥部”周围有共产党的活动，另一方面用请客送礼等办法，争取敌人的警卫和看守人员，以便通过送茶、饭、衣服等方式，秘密和黄明取得联系。

黄明同志虽被敌人用脚镣手铐关在一个漆黑一团、只有一个铁门，约二十多平方米的小牢房里。人多监小，天气闷热，虱叮蚤咬，忍饥挨饿。但困难是吓不倒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黄明同志照样坚定地采用多种形式与敌人开展斗争。

由于四明山地下党的广泛开展活动，敌人到处进行所谓“清剿”。各地被敌人抓来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逐渐增多，有的难友因路远，没人送饭来，只好挨饿。黄明将难友看作自己的亲人，把自己的饭菜送给难友吃。因人多，饭菜不够，黄明又动员其他难

友捐献出饭菜，给饿肚子的难友吃；有的群众哭了，黄明就去做思想工作，问长问短地进行安慰；还帮难友代写保证书，然后写信给其家属，通知他们设法来保人，经黄明的帮助，有的难友被保出狱。

黄明还利用一切时机，在难友中进行形势教育，鼓舞大家的斗争勇气。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黄明同志不顾闷热牢房的折磨，以顽强的毅力开始写诗歌，抒发自己的感情，并在难友中进行教唱，激发难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共产党的热爱。

一天，家属送饭去，黄明送出一块手帕交给家属，家属刚要拿到手，却被看守发现夺了过去，手帕中的纸条掉在地上，恰好看守是个近视眼，没发觉，家属眼尖手快，拾起纸条就走，一口气送到了四明山党领导手里。这纸条的内容，就是诗歌和越狱计划。

接着梁弄地下党接到四明山党组织的指示，要他们配合黄明同志越狱。

为了越狱，黄明与同狱的地下党员黄维钊同志，研究了牢房内外的地形，决定掘洞的方向。同时黄明又通过其他难友，串通了一个没戴脚镣手铐、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掘洞。当洞掘到半公尺宽，人的身子坐起来还是堵不住洞口时，黄明宁可自己被蚊虫咬，把自己的被单盖在掘洞的人身上，堵住洞口。

一天夜里，墙洞快要掘通，敌人巡逻队通过牢房时，听到掘洞的声音，立即进牢门进行检查，看见有一个人坐着没有睡，敌人硬要他站起来，他不肯，敌人就揭开被单拖走了人，发现了一个大洞。

这下可惊动了整个敌人，外面岗哨林立，里面特务到处奔走，把所有牢房里的人赶到天井里，用吊打、枪毙等威胁，要大家讲出是谁为首掘洞的，一直逼到第二天上午，敌人还没有查出结果。

第二天，黄明家属送早饭去，知道掘洞已暴露，即去报告地下党，一切越狱的准备都落了空。

黄明同志又送给地下党一封信，说要吃荷包蛋和有锡箔纸的香烟。家属即送去两只荷包蛋和一包香烟，黄明又将一只荷包蛋送了回去，并做了暗示。家属回家后，即刻轻轻地拨开荷包蛋，发现蛋内有用锡箔纸包好的一张纸条，其内容是：掘洞失败，过一星期晚上来救我。梁弄地下党向四明山党组织作了汇报。

有一位经常给黄明送信的姓金的看守，黄明做他的工作，要他在某天晚上值班时，将牢门打开，并给大家打开手铐和脚镣，一起参加暴动，吃掉一个警卫班，冲出梁弄，带着武器上四明山。

过了两天，姓金的看守因胆小，私自逃走，结果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怀疑这事和黄明有关，因此，国民党“第三专区专员兼四明山地区绥靖指挥部指挥官郑小隐来梁弄，亲自审讯黄明同志。

郑小隐是个心狠毒辣的刽子手，难友们知道黄明同志要遭殃了，当黄明被提审后，大家都急着问黄明“姓郑的对你要下毒手了吧？”黄明回答：“他们是永远不会得到什么东西的，我要穿‘红背搭’了。”

第二天，朱静珠去送饭时，黄明暗示朱说：“昨天郑小隐来了，又要死人了，不知是什么人。”同时，敌人警卫班由一个增加到三个，岗哨从一道增加到三道，家属送饭检查更严了，也不能

和家属见面，还禁止了黄明同志的放风。

光荣就义 永生长存

一九四七年七月廿四日，国民党反动派对黄明同志施用了各种手段和刑罚，经过多次审讯，始终捞不到半点材料，最后只好对黄明同志提早下毒手。

这天，太阳过西，夕阳透过铁窗，射进黑暗的牢房。突然，有四个穿便衣的刽子手闯进牢房，杀气腾腾地叫黄明同志出去。黄明同志镇定自如地站了起来，穿上他姐姐送的一双新布鞋，整理了一下身上穿的一件短布衫，眼睛向难友们扫了一下，微微一笑，然后挥起手向难友们作最后告别。这时，难友们一齐拥向牢房门口，大家都淌着热泪，依依不舍地送别黄明同志。

黄明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牢房，在院子里看到一群敌人围着五位和他一样带了脚镣手铐的难友。敌人把他们一起押出敌指挥部庆余轩墙门，向晓林街走去。因敌人唯恐消息透露出去，四明山的游击队来劫法场，所以除了指挥部警卫班的敌人外，还布置了全副武装的一个特务营、一个保警中队和一部分余姚县的自卫大队和特务，站满了梁弄周围的山头和梁弄镇的大街小巷。

黄明和五位难友，被一群刽子手押上晓林街向东走去，两边含着眼泪的男女老少群众注视着黄明同志。黄明知道自己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他挺起胸膛，抬头看望四明山的群众，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吓得敌人心惊肉跳，催促黄明等难友赶路。走出晓林街，穿过田野，到了前面山脚下的刑场，山上是敌人的炮楼，周围都是岗哨。太阳快接近山顶时，传

来一片“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接着是一阵枪响，党的好儿子，我们的黄明同志倒在血泊里了。

敌人退走后，梁弄镇地下党员罗家森、孙芬茂带领积极分子张炎林等人在前面山脚下、刑场周围的坟包中隐蔽着，准备等天黑后枪救黄明同志。

这是由于地下党事先得知郑小隐要杀害黄明同志的消息，就想方设法挽救他，叫黄明同志的家属出面，买通了执行枪决黄明的刽子手，叫他在打枪时不要打死黄明。因此，刽子手只对黄明同志的头顶和肩部各打了一枪，黄明同志虽然倒下了，但心脏并没有停止跳动。

等到太阳下山时，庆余轩地主家有一个儿子，到刑场地挑稻草，看到黄明还在动，惊叫了一声，结果被敌人发现了，又派了一个敌人连打两枪，黄明同志就这样光荣牺牲了！

解放后，四明山人民为了永远悼念黄明烈士，把黄明同志的遗体从前面山迁到梁弄东门寺桥头，并修造了黄明烈士墓，他的家乡也被命名为黄明乡，以后又改名为黄明公社。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前往扫墓，纪念烈士的英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编者按：本文提到的黄明同志与革命史料特辑一、二期发表文章的黄明同志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

强攻泰顺城 巧歼增援敌

蔡 存 辉

一九四九年初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我人民解放军正准备乘胜渡江，解放江南，蒋家王朝面临着覆灭的绝境。这时，浙江蒋军调集了伪浙保主力三个团和大量便衣特务，加紧搜刮民脂民膏，继续抓丁派款，向我浙南根据地进行了扰乱破坏。根据地乡亲们迫切期望铲除包围游击区的蒋伪政权。

为了配合大军南下，我浙南游击纵队，在中共浙南特委领导下，由农村根据地展开进攻。

泰顺县地处闽浙边，是敌人军事薄弱点，而且该县伪自卫大队曾在泰东北和太东南先后遭到我浙纵第二县队（青、景、丽）和第三县队（闽浙边区）严重打击，只得龟缩在县城内。它是我鼎（福鼎）平（平阳）泰（泰顺）、以泰顺为中心县委的根据地，也是浙南青（青田）景（景宁）丽（丽水）县委根据地的结合部。为了发展浙南地区的大好形势，我们根据当时的有利条件，决定攻取这个县城。这个县城守敌为县自卫大队两个中队和警察一个排的兵力，县城在泰顺罗阳镇，四周有城墙，墙高三丈多，宽丈余，依山而筑，蜿蜒一圈约五华里，城高地有碉堡三座（有的讲六座），墙上有垛，并有射孔，在重要地段筑有临时性小碉堡数座，四城门很小，不易突进，整个地形易守难攻。

担负这次战斗任务的是浙纵第一支队，一、三中队，闽浙边区第三县队，青、景、丽第二县队，约四百余人，统一由纵队副司令郑丹甫、一支队长余龙贵和刘正法同志指挥。战前为具体摸清敌情，派出一个侦察小组由张金发同志带领，化装成群众，入城侦察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还画了地形图。根据掌握到的敌情，研究了攻城基本战术，即决定利用夜幕偷袭，采取架云梯，组织突击队攀越登城。确定支队三中队和第三县队主攻西门，一中队和第二县队主攻东门，集中优势兵力两面夹攻。临战前各参战部队陆续集中于泰顺东北部小院村等地（共分三个点）进行准备。小院村是个小山村，临泰顺北部重镇百丈口到泰顺县城的大道上，四面环山，有几十户人家，离县城七十多华里。部队在这个山村进行了紧张的训练，来克服缺乏攻坚战的经验和没有重武器的困难，并进行充分的动员。各部队都表示了决心，要担负最困难的任务，一定要攻下罗阳镇。在表决心的基础上确定了第三县队选调三十多人组织攻城突击队，由林瑞敏、陶家瑞同志担任正副队长。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指战员们日夜苦练攀墙、登云梯（整根毛竹制成二十三个阶梯担架），要求每五分钟通过全付武装一百人，经过几天训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战前准备完毕后，于古历正月十九日傍晚，部队离开小院村，向县城方向移动了三十多华里。驻在大背岗村（现卑碑公社）休息了一天。廿日下午，部队提前开饭，五时左右部队集中，由余龙贵等同志作临战前的动员，提出了要求，传达了“为民”口令，大家左臂还扎上白毛巾。当部队一下达出发命令，整个部队就向罗阳镇挺进，一路上个个精神饱满，为临战前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笼罩着，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攻下泰顺县城，打响浙南解放县城第一

炮。九点左右，部队到达县城外围，攻东门部队被敌人发现，随着就打来了几枪，我部没有理他，继续前进，进入了预定阵地。这时敌人已发觉我攻城的行动，紧闭城门，加强了城里巡逻警，城上之敌和城四周碉堡还全面射击。当主攻西门部队将接近城墙时，敌人又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射击。我部受阻俯伏在城外凹部地带。但为在天亮之前攻进城内，突击队选择了城西北偏西方向敌之薄弱点作为突破口，集中火力，压制敌人的火力，突击队扛上云梯迅速登城，三中队在黄忠民同志带领下，也同时登上城墙，占领了西门和西北方向一大段城墙，打开了城门，并迅速向城里发展。敌人在我军冲击下，吓破了胆，有的不知所措乱跑乱窜，有的逃进碉堡。我突击队分成两路，分别占领伪县政府、伪警察局和敌之队部。在城里警戒之敌搞不清情况下，我军以左臂白毛巾为标志，凡是没有者都予以缴械，当夜就俘虏和击毙一些敌人，缴获了一部分枪枝弹药。至下半夜二时左右，我军占领了整个县城，战斗基本结束，但伪县长和几个反动头目、残兵等还龟缩在碉堡里进行了负隅顽抗，并急电温州伪保安司令部求援。

攻取泰顺县城的战斗震惊了温州伪保安司令部，他们匆匆严令伪浙保第三团驰援泰顺，该团派出第二营（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作为先头部队向泰顺行进。这些敌人知道去泰顺县城，要途经游击区，这段路程虽是二百多华里，但是敌人是非常畏惧的。当地群众听说敌军来了早就坚壁清野，敌经过之地，抢不到一粒粮食，遇不到一个老百姓，而且经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使敌人胆颤心惊，草木皆兵。一天只敢走三十余里，迟出发、早宿营，既怕受到夜袭，又怕遭到伏击。因此他们每通过一个山头或山谷，总是先派出部队搜索或打枪试探，然后占领制高点再通过，

走一段看一段，行军速度真比乌龟爬行还慢。

我军得到敌保安主力三团增援泰顺情报后，即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于廿一日晚下令攻城部队迅速撤出泰顺县城，放弃消灭已被包围在孤立碉堡里的敌人，挥师东进，迎击来援之敌。为进一步摸清敌情，选择有利地形和避免与强敌遭遇，二十二日下午我战地指挥部命令王烈评同志率领第三县队，埋伏在该县莒江西边岭头阻击敌人。可是狡猾的敌人到达莒江村后，却按兵不动，就地宿营，并挨家挨户进行搜查，见鸡抓鸡，见猪杀猪，见人抓人。（因群众已转移到山上，只有一个裁缝工人来不及走，被抓枪杀。）我第三县队当夜露宿在阵地灌木林和草丛中，等待敌人前来。可是这一夜未见敌人行动，这时我军分析敌人可能不走这条山路，而走洪口村，因此天亮之前，即令第三县队转移到洪口村集中，当时为不惊动村内群众，全部队伍就地在路旁露宿；第二天在洪口一带埋伏，可是该敌又不走洪口大路，而沿山区小道行进。同志们不顾连日行军作战的劳累，个个斗志旺盛，去迎接新的战斗。至二十四日下半夜，迅速出发登上大坪山顶（现小村区葛洋公社），天刚亮，支队长余龙贵同志发现对面山敌人投网而至，他们象一条长蛇，顺着下山的小道走来，这时我部在敌军的右侧山上，根据敌人所在位置，要进泰顺县城两条路可走：一条走小路过洪溪经岭头村，离城三、四十华里；另一条大道要多走三十多华里左右。我部作了分析，判断敌人会选择近路，必经岭头村，当机立断作出了在岭头村歼灭敌人的决定；但我部要赶到岭头村行程还有十五华里，而敌人也只有十多华里。为了不失战机，我部指挥员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岭头村。我军急跨洪溪，抢先占领了岭头村（现是罗阳区南山公社南春大队）。这个村庄离县

城约二十五华里，是个只有五十来户分散的山村，山下到岭头的一条路越走越陡，两旁都是山岗，山谷是条深溪，陡峻的地形，十分有利于我们伏击。当我部到达岭头村后，刚派出一个小分队埋伏在岭头右侧小山头上，其他部队正在待命时，敌人已尾随迫近，其尖兵分队已同我小分队接上火，我部当即击毙敌数人。这时我部立即顺山岭拉开，进入阵地，敌人也同时摆开战斗队形，我们占领了有利地形，离敌只有几十米、百来米远，因其前头部队被击溃，而后面敌人靠着优势的兵力和装备，进行猛烈的反扑，而我部居高临下予以坚决还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由于同敌人近战，敌每发炮弹都远远落在我们后面，战斗持续了二个多小时，敌人无法突破我阵地，又组织轻、重机枪和炮，以集中火力向我第三县队一分队阵地（在岭左下侧凹部高地）发起进攻，我一分队在三中队的支援下，连续击退了敌人数次冲锋，固守了阵地，使敌人不但没有占领一寸阵地，而且每次还遭受大量杀伤。这时敌人再也无力组织冲锋，我部乘敌之虚，一分队长苏廷居和三中队长黄忠民同志带领全体指战员发起反冲击，人人象老虎下山冲向敌群，刹时我军全线发起冲锋，杀声回震山谷，敌人全军溃败。一分队顾不得收缴武器，乘胜追击逃跑之敌。经过三小时左右的战斗，消灭和俘虏了大部分敌人，当场缴获轻机枪二十二挺，重机枪一挺和一部份步枪弹药；敌营长腿部负伤被我生俘，四个连长被我击毙两个，生俘两个。还有一部份残敌分成数股逃窜，无吃无喝，狼狈不堪，但他们总是逃不出浙南根据地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当晚在我军追击下，分别被民兵包围在吴山村等地被迫缴械，至此，该营除跑掉一名副营长外全部被歼。

泰顺这一攻城打援的战斗，历时五天时间，共歼敌五百余人，

计缴获六〇炮两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二十四挺（在战场上缴获二十二挺，后在民兵、群众中收回两挺），长、短枪三百多枝，电台一部和大量弹药装备。这一仗曾获中共中央华东局电贺表扬。这一战斗是在我军兵力、装备处于劣势之下取得胜利的，从而更加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心，震惊了敌人。浙纵永（嘉）乐（清）部队，在瓯北一带，也向敌人展开了进攻。这些战斗为解放温州和浙南十几个县城，迎接大军南下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篇泰顺战斗的材料，在写前虽作了些了解和核对，但都是凭借回忆。因时隔三十余年，在回忆中可能有不够准确之处，请同志们提出补充、修改、指正。

一九七九年七月

从鸡鸣社到金肖报

——解放战争时期路西地区敌后宣传工作回忆

杨 光

大明速印机的风险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二日，我的老家——诸暨草塔樟树下的地下党员杨绍田同志找到了我，他汇报说：上海送到一架印书的机器，已经在村里打埋伏九天了。五里路外的上司坂，新开到保安队一个中队，天天有谣言说要来突击搜村，地方同志很着急，要求赶快派武装去把机器接出来。

这架机器一定是大明速印机了。这还是两个多月前托隐蔽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杨歉同志买的。但是几次回复说，四马路文具店周围常有便衣特务监视，不久前就有个苏北来的采购人员因买速印机在店门口被捕了，一时无法买到。而这次是他托在邮局工作的妹夫穿了邮递员制服买来的，也是他妹夫靠了这套邮递员制服的掩护，混上火车，混过敌人的据点，送到村里的。鸡鸣社多么需要这架速印机啊，决不能出事情。可是，自从上个月我们打下高城头据点以后，敌人组织了所谓“五县围剿”，我军主力远去，我身边只有一名短枪人员，怎么办呢？我一面叫绍田同志

回去做好准备工作，约定今晚赶不到，明晚一定到村。一面派出联络，调武工队员。一直到午夜以后，才调到方克浩、杨清章等四名武工队人员，立即出发。但赶到离我村一里多路的邻村清潭时，天已快亮了，不能再行动，只好临时决定在清潭村后山上露宿。

雨后初晴的阳光分外灼热，初夏的日子特别漫长，我们在隐蔽处猜测着这架印书机的大小，工作起来有没有声音，我还在盘算着放在那里最为安全。

天一黑我们就赶到村西头一所大院子里，跨进门，就看到装在担子一头上的一只黑色长方铁壳箱子，我蹲下身用电筒一照，一块小小的方形克罗米牌子上，果然写着“大明速印机”几个字。我压不住心头的喜悦，说了一句“终于到手了！”

我和杨清章同志去村东头我家大院子伯母家里，刚坐下来在楼窗瞭望的伯母，从半扶梯里急促而轻声地叫着：“兵！兵！不少兵！”我意识到被包围了，急忙向与另一所大院子连接的西北小门撤。正要开门，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敌兵的嘈杂声，赶忙折回来从东南门突围，冲出门来就遭遇敌人，我打出了一梭子弹，趁着敌兵混乱的瞬间，在暗处隐蔽下来，从随身带着的饭包装袋里摸出一本鸡鸣社的文件底稿簿，埋入水稻根下。这里是我从小生长的家园，每一个田缺，每一块石板都熟悉。月光下，在周围搜索的敌兵，身影看得很清楚。终于，当敌兵稍稍远去时，我从他们的隙缝里绕到包围圈外。

第二天傍晚，我在山上会着了杨清章同志，他也仗着本村人路熟安全突围，那架大明速印机安然无恙。为了防雨淋，已由挑运的地方同志陈凤高（陈克）用蓑衣包裹着隐蔽在草丛里了。原

来听到枪声时，绍田同志绕到村外上了山，但他还以为我们不知道情况，返回来进入我家大院子想通知我时，撞进了正在搜索我们的敌兵群，因而被捕了。

背包里的印刷公司

隔了一天，我赶到鸡鸣社的驻地，杨絮同志已经按照大明速印机的使用说明书在试用了。机器一摇，发出“嘶——格达”一声轻轻的、有节奏的声音，就印出一张，还会自动显出印张的数字来，字又清楚，真是又快又好。我们这些山沟里长大的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过机器，居然用上了这架速印机，心里多么乐滋滋啊。一直在认真地观察着机器工作的房东——一个不识字但却很能干的中年农民，敲了敲潮烟管，忽然迸发出一句话来：“嗨，你有无线电啦。”房东的话虽然说得不准确，却说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多么想有无线电收报机啊，今天没有，明天一定会有。不是吗，主力北撤后，我们的第一张传单，就是我们所谓“背包里的印刷公司”印出来的。现在不是有了这架大明速印机了吗？明天，我们会有铅字印刷机了。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啊！

抗日战争末期，金萧支队为迎接浙西新四军东进，开辟了路西地区。先后成立了路西办事处和路西县政府。基本活动区域是浙赣路以西，富春江以东的诸暨，浦江，萧山，富阳，桐庐等县交接地区。一九四五年九月底，浙东新四军全军北撤，路西地区也和其他北撤的根据地一样，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直到年底，北撤时留下坚持的金萧地区特派员马青同志，带着三十余名

自卫武装来到路西地区，寻找失散人员。但是，只活动了半个多月，就被“浙保”一个大队紧紧钉上了，不得不重返会稽山。留下了蒋明达同志带着一个精悍的短枪组，以“路西人民自卫队”名义坚持。我在主力北撤前，任路西县大西区区委书记，金萧支队北撤时与上级失去联系，直到这时才由组织找到，参加了坚持斗争。

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失散的同志，积蓄革命力量，重建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但是，我们这七、八条枪，只能在五泄山周围几个乡的偏僻地区活动，面临着百余倍的敌军，只好白天隐蔽在深山老林，晚上下山来通过自己的亲友和北撤人员家属，逐个地寻找失散的同志，建立游击活动关系。虽然白色恐怖如此严重，但自从出现了我军活动之后，特别是镇压了几个最反动的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后，气氛逐渐变化了。我军刚北撤时曾带领过敌军上门来抓我们家属的一些伪保长、保丁，遇到参加过我军的同志也改变调子了，说什么：“我们是弄点饭吃吃的啊，上司差遣没有办法。”有的群众还绘声绘形地说他晚上在某地亲眼看到金萧支队几十个人走过去了。群众情绪活跃起来了。我想，如果我们能印些传单进行宣传，那影响就更扩大了。但是，在这穷山僻壤，钢板铁笔只有伪乡公所或乡中心小学才有，这些地方亦都驻有敌军，怎么搞得到呢？这时，我自己找到的党员寿肖霞同志告诉我，她从渎溪乡校的学生里打听到，这个学校有个梅先生，上课时常对学生讲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道理，思想很进步，对我军家属的学生特别关心。蒋明达同志分手时曾告诉过我，北撤前，原渎溪乡（这时已并为五泄乡）保存了两个秘密党支部，因为名单不在他手里，没法联系寻找这两个党支部，正是

他交给我的任务。地下党时期，渎溪乡校就是我党的一个据点，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几十个人参加了革命。这个梅先生原名杨美瑛，恰好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她会不会是荫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呢？于是，我写了一张条子，以向她借钢板的由头进行试探。杨美瑛同志收到条子，立即以看望学生的名义与我秘密会见了。她不但带来了钢板、铁笔、蜡纸、油墨等油印工具，并且激动地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几个教师郭慎敏、蔡志贤等都是秘密党员，北撤前我军大发展的时候，他们向党组织一再要求参加公开工作，组织上交代他们，这一带敌我交错，叫他们一定要保护好合法身份。主力北撤与党失去联系后，他们仍然定期过组织生活，正在想方设法寻找我们时，接到我的条子。同时，她又详细告诉我，这个乡还有哪些和他们发生关系的秘密党员的姓名、地点，这样，另一个秘密党支部和分散的秘密党员也很快地找到了。

隔了几天，老蒋通知我们到他的老家——草塔霞度村会合。他把我安排在蒋焕章家里（解放后知道焕章北撤后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与他住在一起。我汇报了半个月来的工作情况，重点汇报了找到了杨美瑛等一批秘密党员，借到了刻印工具以及她告诉我政协会议正在召开，停战令已经颁布，以及各阶层的动态。并建议我们也象地下党时那样，印发一些传单宣传品。老蒋说他也会有这个打算，已经各方面布置了，估计安全没问题，准备在这里住几天。我们打破了每晚换宿营地的惯例，在蒋妈妈家住了三天。我贪婪地阅读了蒋明达同志带来的所有《文汇报》和《民主》、《文萃》等进步刊物。为了印发宣传品，由老蒋口述大意，我执笔，起草了一份署名“路西人民自卫队”的《我们的呼吁》。起草好之后，没有纸张，正好过旧历年，只有十二岁的焕

章的弟弟机灵地用扎兔灯的名义买来了彩色油光纸，没有油印的刷子，向蒋妈妈要来了旧棉絮用手指揩印，这样印了几百份传单，布置我们已找到的地方同志秘密张贴、投寄，还分别邮寄到上海的一些民主进步刊物去。

自从出现了我军的传单后，愚蠢的敌人十分惊慌，那里出现传单就到那里去搜村。晚上在附近要道上打埋伏，这样闹闹嚷嚷，倒给我们作了义务宣传员。这时，正是农历正月，群众中有走亲戚的习惯，相互间纷纷传说那里到了“金萧支队”。敌人的活动倒启发我们一条指挥敌人的方法，我们从甲地到乙地活动了，就预先布置甲地和丙地的地方同志，约定时日张贴传单、标语，把敌军吸引到那边去，我们就可以相对安全地在乙地开展行动了。开始时，这办法很灵验。老蒋常指指这些传单和派款通知说：“这是指挥保安队的‘命令’。”

不久，我们看到上海出版的第20期《文萃》周刊上的《政治逆流在汇合起来》一篇特约专稿中，有这么一段话，反映了我们寄去的传单上的内容：“我们知道，江南各地的新四军主力，曾于去年冬天奉命撤往长江以北，但在江浙各地还有少数工作人员及武装部队遗留下来，浙江的诸暨人民自卫队，是一向由新四军领导和接济的人民武装，自从他们和主力部队失掉联系以后，一直受着国军的层层包围，惨遭攻击。并且，也有许多人民被无辜株连而丧失生命、财产。类此情形，我们相信决不止浙江一地为然。”想不到我们在穷乡僻壤的革命活动，竟得到了上海这样大城市刊物的支持和声援，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不久，我们这个称之为“背包里的印刷公司”就结束了。我们在读溪乡连续找到了曾在金肖支队《简讯》社（北撤前金肖地

区出过一种油印版报纸《时事简讯》，这一机构称为简讯社。）搞过刻印工作的杨春潮、杨纪忠、杨纪华、杨奎法、寿奎根等同志，他们能刻能印，杨春潮和寿奎根同志还冒险远到八十多里外的诸暨姚公埠取回了他们打埋伏的一块日本产钢板，在杨春潮教书的寿廊坞小学（也就是我们找到的另一个秘密党支部所在的村子）设了秘密油印点，刻印工作都交给他们去做了。这时，为了配合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形势，我们停止了“路西人民自卫队”名义的武装活动。工作重点转到了整理地方党组织，开展对党员、以及与党有联系的革命群众的教育活动，誊印任务也转为内部学习资料了。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以后，我们重新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组织了一支几十人的武装——“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设在寿廊坞小学的秘密油印机构的主要任务，又转为“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刻印标语、传单等宣传品了。

鸡 鸣 报 晓

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在诸暨枫桥成立了“会稽山剿匪指挥部”，调来了在浙南括苍山地区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吴万玉任指挥官，统一指挥会稽山八个县进行所谓军政清剿。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我活动在金肖铁路线西侧的革命武装，统编为“会稽山抗暴游击队”，成立了“会稽山抗暴游击司令部”，彭林（原金肖支队支队长，已北撤，挂名）、蒋忠为正副司令员，马青、蒋明达为正副政委。由山东派回来的张任伟同志任参谋长兼大队长，原“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编为我军主力抗

暴游击队的一部分，重上会稽山活动。

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原来以地方党员兼做后勤、联络等工作，已经不能适应斗争需要了，组织上决定调郭慎敏同志在他的老家——浦江、诸暨交界的养元坑村筹建秘密联络总站和收报、出版油印机构，并筹备后勤供应工作。

郭慎敏同志人如其名，真是又谨慎又敏捷。他一向当小学教师，身份合法。四七年上学期，党命他和蔡志贤二同志打入浦江中余兴仁乡中心小学做地下工作，任务是摸清镇上敌军动态。不久，他派他爱人陈芝英送情报，我军不费一弹缴获了该乡全部任务队的枪枝，事后敌人没有怀疑到他。他的老家养元坑，只有二十多户贫苦农民，他已发展了五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他还创建了一所小学。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的老父亲被敌人追捕无处可去，也安置到这深山僻村很少外人到的小学里教书，这样更便于联络人员进出。老郭在这小小山村里是唯一的读书人了，很受村人尊敬，在几个党员的掩护下，一般群众对他家人来人往，只当作教书朋友，没有引起怀疑。在老郭的教育下，他的爱人陈芝英入了党，父母、几个妹妹都同情支持革命，他的老父亲还长途远出送联络（不幸的是这位可敬的老阿爸，在我们进城以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遭匪特杀害了）。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养元坑成了我们的秘密后勤宣传工作的基地。

老郭真是多才多艺，游击队的关防、铃记、长戳、签名章都是他一手刻的。他还会写仿宋体美术字，也会刻楷书钢板字。

八月间，上级指示恢复路西县政府，“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编入主力以后，我们留下来的人枪不过二十，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仍然只能夜间活动，不用说成立县区政权，即使一

个保政权也没有。但是我理解这是为了壮大声势迷惑敌人、鼓舞群众斗志的需要，因此成立布告内容气魄一定要大，形式一定要大方。我们用长48公分、阔35公分景方纸印，临时调来已任区特派员杨春潮同志，用仿宋字体磨刻了二张蜡纸拼印，老郭赶刻了一颗“路西县政府”方印和两颗县长、副县长签名章，盖上了朱红色方印和蓝色签名章，倒确有些象布告的样子了。

这时，油印任务日渐繁重，原来能做刻印工作的地方同志，大多调到部队去了。老郭工作又多，人手不够，正好我们设在草塔敌人据点以文具店为掩护的秘密联络站被叛徒出卖暴露了，联络员寿肖霞同志摆脱了敌人的尾追，直奔养元坑，组织上决定她专做刻写工作。又调来了原在诸北简讯社搞过油印工作的杨絮（杨纪华）同志专做油印工作，还找到了一位北撤时留下已失散多时的报务员杨雷搞收报工作，这样有三个专职人员了。开始时大家笼统地叫印刷社或习惯地叫简讯社，总感到不大相称，得起一个名字啊。大家看到北撤前遗留下来的油印出版物上有播种社、拓荒社出版等字样，现在全国大反攻已经开始，革命形势再不是“播种”、“拓荒”阶段了，可是敌后坚持斗争还有一段艰苦的时间，正处在鸡鸣报晓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于是取名为鸡鸣社。寿肖霞同志还从一本报头图案集中，挑了一幅昂首高啼的公鸡图案，作为鸡鸣社的特有标志——这就是鸡鸣社名称的由来。

鸡鸣社成立后某个深夜，杨雷的收音机里收到了一次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声音很低，内容是报导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取得辉煌战果。这是我军北上后路西地区第一次收到新华社的广播，多么高兴啊。同志们立即动手印了号外，送到部队里去。可是仅仅这么一次，再也收不到了。后来杨雷同志去上海采

购收音器材，一去没有再回来。（解放后才知道他去沪不久就被捕了。）报纸出不成了，这时，我们赖以了解全国形势、了解战局的一些上海进步报刊大都被反动派摧残殆尽，只剩下《世界知识》以及当时苏商出版的《时代日报》等寥寥数种了。但老蒋同志又从派往上海的钱絮春同志以及荫蔽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虞继（上海解放前夕被毛森杀害了）、杨歉等同志处弄来了香港出版的《华商报》、《正报》、《群众》周刊等，内容丰富极了。大量材料来不及翻印，又调来了几位女同志，日日夜夜刻写。杨絮同志还设法用彩色套印封面，他又要切纸、装订，工作更是繁重。开始用刷子印，后来虽然有了滚筒，但效率仍然低，多么需要有更高效率的速印机啊。现在有了这架“大明速印机”了，印出千把张，蜡纸还没有破，又快又好，出版物的印数增加几倍，无怪杨絮整天笑咪咪了。

鸡鸣社同志们日日夜夜工作，主要是翻印党中央、毛主席的文告，新华社的社论、评论，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土地法大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等；其次是北撤前遗留下来的革命读物，如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选印）以及《整风文献》、《根据地建设问题》（选印）、《新党章读本》、《中国共产党党章》等等；再次是路西地区党政军的文件、布告、训令、公函、派款通知、捷报、标语、工作总结、战斗总结等等，这方面刻印数量较多，布告大都是磨字，如最大的一张金萧支队一号布告，是仿照抗日战争末期苏浙军区四纵队布告的形式，六字一句，共540字，对开白报纸大，刻了七张蜡纸拼印，供金萧支队外线

出击到国民党统治区时张贴。

此外，还刻印了我们自编或改编的革命读物，如战局报道、《战士读本》、《我们的出路》、《新山歌》等等。



鸡鸣社出版的书刊

这些宣传品通过张贴，投寄，武工队专送等途径，也送到敌人和上层人士手中；有的低层敌方人员、伪保长，还偷偷地向我们索讨党中央、毛主席的文告。浚溪乡有一个从东北回乡的国民党团级军官，开始时肆无忌惮地大吹“东北国军固若金汤”，当有人告诉他这里也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时，他不屑地说：“这些是流落在地方上弄点饭吃吃的‘土共’，朱、毛也不会承认的。”但是看了我们送去的战局报道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文告后，他才悄悄对人说：他们有电台的，他们是真共产党，有的东西我也没见过呢。态度有所收敛了。

有的战士还把《我们的出路》、《新山歌》作为学习文化课本抄写，如我埋在水稻根下以后又找回来的那本鸡鸣社文件底稿本，原是周达烈士用过几页的学习本子。一九四七年夏天，周达同志和我分手时遗忘在我处的。周达同志是枫桥一个小饭店里的“饭店司务”，入党较早，很用心学文化，有时露宿山上，也把本子放在石头上抄《我们的出路》。原来不识字，这时钢笔字却练得很秀丽了。不幸，这么一位好同志，死在我们分手后不久。一九四七年八月间，在枫桥附近虞村被敌人包围，突围时伤了脚，弹尽被俘，被吴万玉在会稽山区八个县的乡镇长会议上割下耳朵，割断脚筋，又困在门板上在烈日下折磨牺牲。

鸡鸣社先后刻了几十种小册子，工作是紧张的，有时为了赶突击任务，同志们连续几个晚上不睡，而工作条件又很差。开始时，较好的基本工具就是一块“掘井”钢板，要轮换着使用。油墨接不上，就掸烟囱煤灰，筛细了用青油调了代替。游击队的经济首先要保证部队供应和扩大部队，非武装人员除了伙食外，没有什么津贴费，穿的衣服，是从家里带来的。杨絮的头发长得可打辫子了，阿大同志又用剪刀替代发剪，剪得象老鼠啃了一般，几个女同志抿着嘴笑，可又不敢笑出声来。这样的生活过惯了，倒并不觉得有什么苦，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根据地，没有武装保护。鸡鸣社成立后的一年里，完全是躲在可靠的关系楼上做“老鼠”，或做“闺阁千金”来进行工作的。男女同志生活、工作在一间楼上，走路要赤脚板，大家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平时爱说、爱笑、爱唱歌，这一年中，咳嗽也得熬住。特别是炎热的暑天，太阳直射在薄薄的黑色瓦片上，低得碰头的农村楼房，热得象蒸笼一般，刻写时一面抹汗，一面在蜡纸上盖上一方手帕或一张

纸，防止融化。窗子又不能开大，便桶内壁上的蛆虫爬上去又跌下来，散发出一阵阵臭气。为了安全，一个地方不能住得太久，就是这样，还受过几场虚惊。有一次在养元坑，突然窜来了保安队，几个敌兵窜进了鸡鸣社所在的楼下，大声地喝问：“楼上有‘奸匪’吗？”这时，房主人爱香阿太（她的丈夫、大儿子都是党员）正在烤玉米饼，听到人声一看是敌兵，知道已无法通知了，只好不露声色回答了一句：“没人。”眼睛不再看敌兵一眼，只顾自己翻着玉米饼，敌兵看看她那镇静的样子，又看看黑洞洞的楼梯，破破烂烂的房屋，大概以为穷得没有油水可捞，吆喝几句回出门去了。敌兵出村后，爱香阿太到楼上告诉了肖霞和杨絮，刚才发生的险事，他们正在赶印标语，印好的红绿标语纸摊满楼板上晾干，一些也没有觉察到呢。为防敌人又返回来搜查，这一个晚上，他俩和隐蔽在隔壁另一家楼上的杨雷到后山露宿到天明。

一九四八年春天采茶时节，鸡鸣社同志隐蔽在朱宅村党员沈萌楼上工作。突然，草塔报警队进村了，沈萌带着几位女同志各带一只采茶壳斗从后门上了山。郭慎敏同志来不及走，到了隔壁开明士绅中医杨春惠先生家里，春惠师母赶快叫他躺在床上蒙上被头，装着是来看病的。几个敌兵进来了，春惠师母赶忙泡茶、烧点心，敌兵喝着茶问：“你们这里有‘奸匪’吗？”春惠师母装着不懂地回答：“我们村里没有陌生人。”敌兵又问：“后面山上的什么人？”春惠师母沉着地回答：“噢，是村里教书的先生和几位女同学一起上山玩的。”这样就混过去了。接着就听到几声枪响，原来敌人并没有目标，是押解一个被俘的我军战士到村前面新凉亭枪杀，横进朱宅村来的。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鸡鸣社的同志一直发扬不怕危险、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同志都是较长期受党的教育，北撤前入伍、入党的。我军北撤后，又亲身饱受反动派的迫害，个人的命运和革命的胜利血肉相连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秋天，敌人窜扰更加频繁，最可靠的秘密后勤基地养元坑被破坏了。草塔报警队捉去了隐蔽在村里做军衣的共产党员我军军属王大木师傅和军属郭有才，并把他们枪杀了。郭慎敏家被洗劫，全家过流亡生活。九月初某天，鸡鸣社隐蔽在浚溪乡桥头村杨秀木先生家里工作，突然，一里多路外的杨焕沈家进驻了保安队一个大队。全体同志紧急撤到后山上，第二天从山上看下去，满村都是穿黄军衣的敌人，只好分别疏散。这时，郭慎敏同志奉调去支队部任后勤部主任，不久，鸡鸣社的全体同志到了桐庐、浦江交界的四管乡大山里建立起来的后勤新基地工作了。

鸡鸣社的“师傅”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调到支队部后，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鸡鸣社的师傅杨小余同志，在浦江西南乡墩头市（现属兰溪县）战斗中光荣牺牲了。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五日傍晚，小余同志从支队部带了批准这一战斗计划的指示回到八大队，部队就准备出发了，领导上因小余同志去支队部往返赶了百多里路，太辛苦了，叫他休息，但他坚决要参战。他调到八大队后任短枪队队长，领导就批准他带领突击队，战斗在六日五时打响，他带头冲进敌营房时中弹牺牲了。这次战斗从五时打到七时半，全歼敌

浦江县常备队一个中队和打掉敌方浦江县政府墩头办事处。

消息传到鸡鸣社，几位女同志都哭得眼睛象核桃那样，尤其是小余同志的“徒弟”寿肖霞同志哭得最为伤心。

是的，杨小余同志是鸡鸣社创立人之一，是传授刻写技术的“师傅”。

寿肖霞同志虽然写得一手秀丽的钢笔字，却从来没有刻过钢板，组织上决定临时抽调路西武工队员杨小余同志去传授刻写技术，小余同志很热心，手把手地教肖霞同志用三角板刻仿宋体字，磨大仿宋体字，还把他珍藏的旧时简讯社印刷品上剪贴的报头图案，花边，大小各类报头字集子和几支铁笔送给她。以后，路过时也几次到鸡鸣社来指导，每当来时，肖霞同志就亲热地叫着“师傅”来了，她从小余同志处学到了刻写技术，以后又传授给调来刻写的新手。有些后来的同志，虽然没有见过小余同志的面，也知道有这么一位“师傅”。

我又回忆起第一次与小余同志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们秘密宿营在老简讯社工作人员杨纪忠同志家里，纪忠同志告诉我，有这么一个老简讯社一同工作过的同志，常常同在一个田界劳动，成天埋头干活，碰见只笑笑，不说一句话，听说他的父亲管的很严。纪忠同志又说他能刻一手好钢板字，工作态度很认真，老简讯社的同志反映很好。这样，我便叫纪忠同志去接近他，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如果有把握了，便告诉他我们在秘密活动。不久，我们又去纪忠家宿营，纪忠同志说，已和奎法接触过几次了，当告诉他我们在秘密活动时，他非常高兴，话也多了，还再三说我们来时一定要去通知他。于是我便叫纪忠同志去叫他来和我们见面，奎法同志来了，一见面就紧紧握住我的

手，连连说：“想煞你们了！”说不上几句话，就要求参加武装。于是我便和他谈了政治协商会议后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形势。我们正在精简武装人员，准备可能到来的合法斗争。当前每个革命同志，要努力学习，团结群众等等。然后，我交给他任务，搞秘密刻写学习资料工作，还交给他几本上海出版的《时代》、《文萃》等进步刊物学习。他恋恋不舍地放下了一直在摆弄着我的那支六寸手枪，一面说了一句：“真闷死了啊！有工作做就好了！”欣然接受了任务。

以后听说他瞒着他父亲，刻写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快。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我们重新组织了武装，他是第一批参加路西武工队的。

一九四七年夏天，路西工委决定办一个定名《火花》的党刊，调奎法同志去刻写。九月间，工委负责同志蒋明达在诸暨县城附近大侣乡郇家湾正在召开《火花》编辑部会议时，被敌人一个中队包围了，与会同志分三路突围。奎法同志是从水稻田里爬出险区的，当晚和蒋明达同志会合时满身烂泥，可是，手里一支短枪和随身背着的一块钢板却保护得干干净净。《火花》流产了，奎法同志又回到武工队。

奎法同志参加武工队后没有改名（当时不改名，家庭易受破坏）。那时有位徐荷亭同志，是个老党员，任路西县政府秘书，也是奎法同志读初小时的老师。他把徐字拆开，化名余人，大家叫他余秘书。余人同志为人幽默乐观，不知是那位同志第一个说，奎法同志的动作很象余人，于是便叫他小余人了。后来，又叫他小余，叫顺了，奎法同志加上了自己的姓，改名为“杨小余”。

一九四八年五月，余人同志和方克浩等几名短枪人员，在寿廊坞山顶村被草塔报警队包围分散突围时，其余同志脱了险，余人同志体弱，遭遇敌人时，不愿作俘虏，用手枪自杀壮烈牺牲。

不久，鸡鸣社同志转交我一件杨小余烈士的遗物——一本上海时代社出版的西蒙诺夫著的《日日夜夜》。这本书是小余同志从寿肖霞同志处借的，已经被鸡鸣社的同志看得破烂了。半本书浸透了小余烈士的鲜血，书首题着“献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牺牲者”的扉页上，写着一篇八大队教导员李铁峰同志写的扣人心弦的感言。它详细地叙述了小余同志背着这本书冲锋陷阵的经过。旁边注着几行小余烈士的同村人杨阿大同志写的小字：“杨小余烈士，原名杨奎法，现年23岁，渎溪乡相对倪宅人，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

“天 亮 了”

鸡鸣社的同志来到桐庐四管乡大山里的天堂、雪水、山桑坞、山桑尖、蟒潭顶等的新后勤基地里，生活更艰苦了。这里人迹罕至，供给全靠外边挑进去。有时断盐几天，菜吃不上，只好挖野菜吃，但是精神更痛快了，再也不做“老鼠”了。在和煦的太阳光下可以大声唱歌。这时，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正在胜利地进行，金萧地区也面临大发展的形势，沪杭各地奔赴游击队的知识青年日益增多，为了供给他们的精神食粮，鸡鸣社赶印了几本革命读物，一本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除本文外，还收有刘少奇同志《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部分；一本是《土改与整党》收有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

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重印《左派的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和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报告；第三本是《怎样搞通我们的思想》，收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主席《论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的群众路线问题》等，这几本书为以后金萧工委举办的三期知识青年短训班提供了基本教材。

自我解放大军大举反攻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但仍在报刊上大吹大擂，对活跃在敌后的人民游击队，也连篇累牍地造谣诬蔑。不仅如此，敌人还伪造我浙东出版的《四明简报》，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基本活动地区，妄图迷惑我军民。如特务伪造的一期所谓十一号《四明简报》，时间是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头版头条刊登“会稽山人民抗日游击副司令、浙东行政公署路西县县长蒋忠同志殉难”的消息，牺牲的时间、地点都是真的，但却又造谣说：“又传为内讧被暗杀。”这些伪造的报道中还塞进了“敌人凶狂冲击，蒋军突入边区山地，消息传到四明山，使全党同志引起极度不安，感到生命无保障而表示消极”等等字句。更为恶毒的是敌特还精心泡制了一篇所谓《蒋忠同志没有死》的“短评”，说什么蒋忠同志“站在山顶高呼，同志们，反动势力已经全面攻击我们了，而且进攻到我们心脏了。同志们，我们的队伍之中有奸细，看起来布尔塞维克的信徒，其实是‘国特’，我们死于自己同志的手里，报仇！报仇！向自己队伍中去找仇人。”妄图挑起我内部猜疑，制造混乱。当然，敌人这种处处露了马脚的拙劣伎俩，明眼人很易识破，但想不到他们的卑劣手法，却在解放十多年后被林彪、“四人帮”全部继承下来

一九四八年九月，路西工委改为金萧工委；路西地区革命武装主力，也改编为金萧支队。部队的活动地区迅速扩大，游击基地逐渐形成根据地，针对敌人种种反革命宣传，我们多么需要有自己的报纸啊。但自从杨雷去沪不返后，我们一直想方设法搞收报、收音器材，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才弄到一架三灯直流超短波收音机和一位报务员。收到新华通讯社《活捉黄维》、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告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书》等等，立即印了号外。于是，金萧工委决定出报纸，定名为《金萧报》。派原在杭州任《东南日报》编辑因地下工作暴露逃来部队的方福仁同志任副社长，由上海美专来的施律和吴天任编辑。

The image is a collection of 16 political cartoon panels arranged in a 4x4 grid. The top row features a large title '報國圖全' (Complete National Service Pictures) and a date '1944年11月' (November 1944). The panels depict various scen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entary:

- Panel 1 (Top Left):** A man is being carried on a stretcher by two others. A large figure, possibly a deity or a powerful official, is seated on the stretcher. Text: '看這地來' (Look at this land), '官生' (Official's son), '百姓' (Common people).
- Panel 2 (Top Right):** A man is being carried on a pole by two others. Text: '看這地來' (Look at this land), '官生' (Official's son), '百姓' (Common people).
- Panel 3 (Second Row Left):** A man is being carried on a pole by two others. Text: '看這地來' (Look at this land), '官生' (Official's son), '百姓' (Common people).
- Panel 4 (Second Row Right):** A man is being carried on a pole by two others. Text: '看這地來' (Look at this land), '官生' (Official's son), '百姓' (Common people).
- Panel 5 (Third Row Left):** A man is being carried on a pole by two others. Text: '看這地來' (Look at this land), '官生' (Official's son), '百姓' (Common people).
- Panel 6 (Third Row Right):** A man is being carried on a pole by two others. Text: '看這地來' (Look at this land), '官生' (Official's son), '百姓' (Common people).
- Panel 7 (Bottom Row Left):** A man is being carried on a pole by two others. Text: '看這地來' (Look at this land), '官生' (Official's son), '百姓' (Common people).
- Panel 8 (Bottom Row Right):** A man is being carried on a pole by two others. Text: '看這地來' (Look at this land), '官生' (Official's son), '百姓' (Common people).

• 211 •

约出了四十期左右，每三天一期，开始时每期八开二版，以后经常出四版，有时亦出六版，基本上刊登新华社电讯。地方新闻有一版，由于根据地初创，报导的多数是军事消息，也登载一些金萧工委领导指导性的文章。每期发行一千多份。同时，出一种十六开的《金萧画报》，共出了十多期，还出过七期通俗的《群众报》。

《金萧报》出版后，鸡鸣社改称金萧报社。但仍用鸡鸣社名义出版书籍。如《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领导》、连环画《王贵与李香香》等。同时，继续担任金萧工委、金萧支队、浙东行署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文件布告印刷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金萧报社人员也增加到三十多人，二月份浙东临工委派来了李文彪同志任电台台长，将译电人员增至五人。报社建立了党支部，李文彪、寿肖霞分任支部正副书记，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一九四九年后，金萧地区敌据点除县城铁路线外，大都被我军拔掉，但敌人又几次以正规军大规模地向我根据地“扫荡”，初创的根据地仍在动荡中。特别是四月中旬，敌二〇三师约三千人由师长金式率领自金华、浦江出发，向我四管乡等中心地区进犯，所过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设在深山的后勤部被服厂、修械所均遭破坏，金萧报社同志在山上露宿了二天三夜，后从敌排哨下撤出到富阳某一小村。四月二十二日晨两点钟，李文彪同志正值班收报，收到了我大军渡江的消息，他乘收报间歇大叫一声：“大军渡江了！”正在篾席上熟睡的几十个同志，霍然而起，大家一齐欢呼起来：“天亮了！天亮了！”立即动手刻蜡纸，印号外，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正在富阳李家的支队部去。号外

送到那里，那里便欢声雷动。许多同志自动地跳起秧歌舞来，山村在一片欢腾中。这次反扫荡战斗中，我们虽然打了胜仗，俘虏了二〇三师连长以下四十余人，缴获机枪六挺，步机枪十支，但敌人都是美械装备，缴获的子弹我们的枪不能用，此时我军每支枪只剩下几发子弹了，又加春荒时节，山村缺粮，北有富春江，南有敌人二〇三师，领导上正在紧急派人四出收集弹药，征集粮食。也正在这困难时刻，电讯里传来了一个又一个大军渡江的胜利捷报，深入我根据地的二〇三师和其它敌军，都纷纷回窜。第二天晚上，支队部召开了庆祝解放军渡江的军民联欢大会，人们又一次噙着泪花欢呼：“胜利了！”“大军渡江了！”

五月上旬，金萧支队与二野大军在桐庐县城会师。不久，又和南下干部会师。奉省委指示，金萧支队分别由政委张凡率领去临安地委；支队长蒋明达率领去建德地委，金萧报社也分别去这两个专署。编辑、电台人员去《浙江日报》社。这架大明速印机随着杨絮、寿肖霞、黄一萍等同志进了临安专署文印室，完成了它为敌后游击战争服务的历史使命。

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三）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内部发行）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50,000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11103.44

定 价：0.63元

(内部发行)

统一书号：11103·44

定 价： 0.63 元